

版权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编辑部

主 编 郑水平 田子渝

副主编 宋 健 李福珍 文道贵 张秋实 张 军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俊 王 玲 王文全 刘桂芳 孙 勤
杜学勋 李 云 杨志权 肖 俊 何利平
沈泉晓 张志宏 陈 磊 易山伟 周 薇
钟贤超 袁 刚 袁 琳 夏伟平 高万娥
喻建设 傅 俊 戴定凯

总策划 郑水平 张民仰 徐迎春

《日出江城》

编写组

编写组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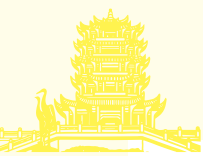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刘士明 刘邦民 刘桂芳

孙 勐 李冰璇 何利平

宋 健

目 录

001	和成银行来了个阔老板	/ 刘桂芳
010	义顺泰油行和汉昌肥皂厂的能工巧匠	/ 宋 健
014	红色商人和老板的红人	/ 刘桂芳
019	武汉行营成了铁扇公主	
	——记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刘实情报小组	/ 刘士明
027	特殊的救济	/ 宋 健
032	不倒的红旗	/ 宋 健
037	校花也是共产党	/ 宋 健
042	武汉大学六一惨案	/ 李冰璇
052	一一·七血案与武汉被服厂罢工斗争	/ 孙 劲
064	汉阳武工队解体之谜	/ 宋 健
068	血染战旗旗更红	
	——华中分局三工委、湘鄂特委、武汉中心小组英烈谱	/ 刘士明
085	化险为夷——武昌红十字补习学校事件	/ 宋 健
089	江汉风起潇湘潮	
	——长沙特别支部的战斗历程	/ 刘士明
112	特种刑事法庭内外的斗争	/ 宋 健



116	变国民党的报纸为共产党的喉舌	/ 刘桂芳
122	真和平还是假和平	/ 刘桂芳
128	“八仙过海”与“无孔不入”	/ 宋 健
134	斗智斗勇 迎接黎明	
	——武汉解放前夕反迁移、反破坏和“保产、护厂、 护校”斗争	/ 何利平
143	看不见的战线	/ 宋 健
152	特殊家教	/ 刘邦民
155	攻心记	/ 刘邦民 孙 勤
162	金口响起起义的枪声	
	——张轸兵团起义始末	/ 孙 勤
170	飞向光明	
	——策动王家墩机场部分国民党空军人员起义始末	
		/ 孙 勤
178	洞庭举义 游龙归汉	
	——国民党海军汉口巡防处舰艇水兵暴动	/ 孙 勤
185	血泪洒染雨花红	
	——记武汉地下斗争牺牲的三位烈士	/ 何利平
192	江汉关升起第一面红旗	/ 刘桂芳
196	武汉上演“空城记” 江城黎明静悄悄	
	——武汉“真空”期迎接解放的斗争	/ 何利平
206	后 记	

和成银行来了个阔老板

◆ 刘桂芳

1945年的武汉，因沦陷时期日伪长期摧残，党的力量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武汉这块“沙漠”，急需垦荒队员去开垦，把根深深地扎下去。如何重建武汉党组织？如何重新开辟武汉的城市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这位电视剧《风筝》中女部长的原型，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深思熟虑之后，她走出了第一招棋，起用长期潜伏的地下党员赵忍安，派他到武汉去打前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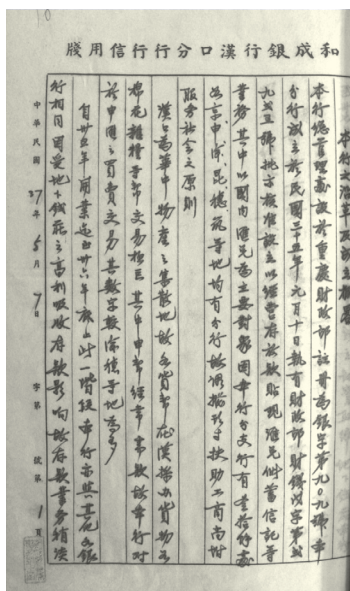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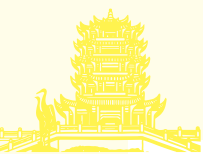
和成银行当经理

赵忍安是个极有悟性的金融奇才，四年前在重庆化龙桥区担任区委领导成员时，南方局就把他的关系转过去，不让他与别人联系，潜伏在重庆和成银行。在和成银行，他业务纯熟，稳重可靠，几年间便由总务主任升为襄理。

和成银行总经理吴晋航看到抗战已经胜利，想把和成银行从地方银行扩充为全国性的银行，到上海、广州、长沙、汉口、南京设分行。吴晋航最初的拟议是，派赵忍安到上海去任分行副经理或到其他地方筹建分行。赵忍安立即向党组织请示：“不知道党组织需要我到哪个地方去，请组织决定，我是可以争取去的。”南方局组织



钱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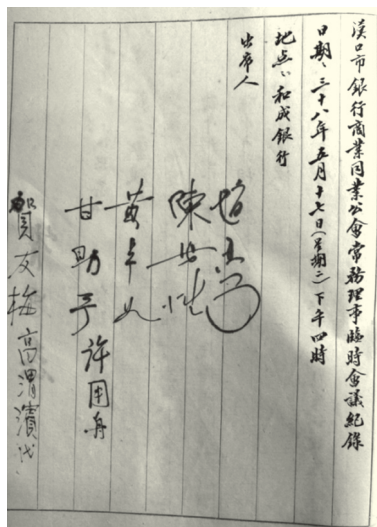


和成銀行漢口分行沿革及成立概略 千万注意。”

赵忍安接受党组织决定后，立即向吴晋航表示愿意去汉口。吴晋航正在为去汉口的人选踌躇，闻言十分高兴，当即决定派他去汉口筹建分行，并承诺分行建成后让其出任经理。赵忍安立即把这个消息转告了钱瑛，并询问还有什么其他指示。在他动身前两天，钱瑛派人传来口信：“你去了之后，可能在两三个月之后，市委的负责同志才能到汉口，用孙建业的名字作为联系暗号，以后你的工作就由孙建业同志领导。”得到指示，赵忍安很快动身。

1945年10月25日，赵忍安乘轮船离渝赴汉。翁和新因孩子小，交通不便，次年初才到汉口，她赴汉之前，也到红岩村接受了钱瑛的指示。赵忍安到汉口以后，立即着手筹建和成银行汉口分行。他一方面想使和成银行汉口分行尽快建立，提高

部长钱瑛指示：“你争取到汉口去，上海在敌伪占领时期，地下党不但保存下来，而且还有很大发展，将来还有重庆许多同志要复原到上海；而汉口在敌伪占领时期，没有再建立党的组织。你有这样的条件，先去把银行工作搞好，将来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一个重要交通站，由你和翁和新同志（注：赵忍安夫人）共同负责。所以要把银行工作做好，使吴晋航对你更加信任。”又说：“最重要的还是不能暴露，当银行经理就要像个银行经理的样子，要更加隐蔽。这是党交给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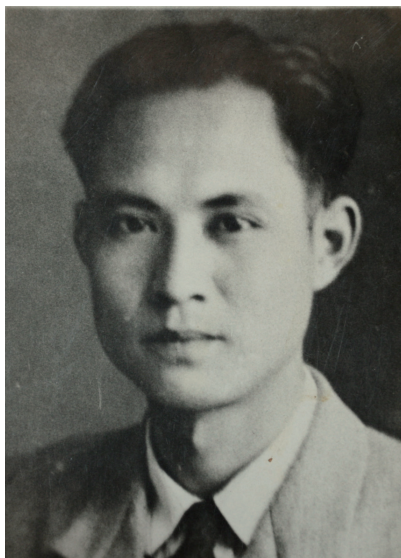
赵忍安在汉口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会议记录上的签名

在武汉金融界的地位，以取得总行的信任；另一方面积极准备迎接孙建业同志的到来。筹建工作虽然辛苦，但凭借他的精明才干，进展十分顺利。1946年1月3日，和成银行汉口分行在胜利街25号开业，赵忍安出任经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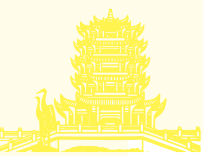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为“亲戚”安排工作

1946年2月，一封转孙建业收的信送到了赵忍安手上，他知道，这是组织上通知他，孙建业同志要来了。3月初的一天，银行传达室的人到经理室报告，有一个叫孙建业的人要找赵经理。赵忍安大喜过望，日盼夜盼，可把人给盼来了，连忙说：“是我的亲戚，快请进来！”来人孙建业正是钱瑛说的市委负责同志，本名曾惇。赵忍安把信交给曾惇，领他到楼上的寝室密谈。曾惇说：“我来两天了，已经有了住处，现在没有身份证，首先要解决一个社会工作，才能得到身份证，请你帮忙设法解决。”

曾惇到来前，赵忍安就已经开始为他物色工作了。凭借着银行阔老板的身份，武汉各色人等都想结交他，甚至有求于他，谋一个职位对赵忍安来说并非难事。震寰纱厂经理刘梅生要向和成银行借一大笔款，用于把抗战初期迁到重庆的纱锭迁回来。赵答应借款的同时，提出了一个要求：安排一个亲戚在纱厂工作。刘梅生说：“厂子尚未开工，用人很少，蔡处长刚介绍一位姓王的，我无法拒绝。你的亲戚可否等纱厂开工再来？”这个蔡处长，赵忍安也认识，叫蔡立民，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武汉行辕第二处副处长。武汉沦陷时，被刘梅生的父亲救过，后逃到重庆，抗战胜利又回了武汉。因为有过救命交情，刘梅生为了自己生意方便，时常与蔡来往。有一次刘请蔡吃饭，让赵忍安作陪，于是蔡赵两人也认识了。赵忍安为工作



中共湖北省工委书记、武汉市
委书记曾惇



方便，借着同乡之谊，经常请蔡吃饭，并且刻意与他泡在一起，在其他特务爪牙面前做出和蔡是至交好友的假象。当听说蔡立民要介绍一个姓王的进厂，赵忍安立刻警觉起来，这恐怕是蔡安插进去的一个特务。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对刘梅生说：“无论如何还请你安排一下。”刘梅生想着银行那一大笔借款，也就答应了。

赵忍安把情况向曾惇做了汇报，曾惇说：“这正是一个了解敌特情况的好机会，就去那里上班！”曾惇到纱厂上班后，发现姓王的特务就坐在他对面办公，这实在是太巧了。敌在明我在暗，监视这个特务更方便了。而姓王的特务觉着赵忍安和蔡处长是好友，自己和曾惇是靠他们的关系进来的，也不是外人，对自己的活动并未刻意隐瞒。曾惇借此掌握了很多敌特活动的情况和线索，对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防止特务破坏，起了不小的作用。

1946年底，钱瑛从上海给翁和新来信说：“孙表哥住在武昌做生意很不方便，汉口交通方便，做生意容易发展，住在武昌要失掉很多做生意的机会，请你和表妹夫设法在汉口给他找个门面。”这是党组织用暗语指示赵忍安夫妇：曾惇现在不宜继续留在武昌工作，需要重新在汉口安排职业作为掩护。

经过赵忍安精心安排，曾惇又顺利“跳槽”转移到汉口一个私人钱庄当文书。因为这家私人钱庄的经理想要赵在资金寸头上帮忙，赵忍安顺势提出安排一个“亲戚”到他钱庄上工作。曾惇到钱庄当了文书后，深得老板器重和信任，靠这个职业作掩护，很好地潜伏下来。

省政府主席的座上宾

1946年，原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万耀煌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万与和成银行总经理吴晋航很有交情，连万在成都的公馆都是吴晋航借给他的。万来鄂之前，吴晋航在重庆设宴招待万耀煌夫妇，再三拜托他们对和成银行汉口分行给予照顾。吴晋航也写信给赵忍安，说万到任后务必去拜望他们。万耀煌夫妇到汉后，赵忍安和翁和新以银行经理与夫人的身份登门拜访，万非常热情，说如果和成银行有什么困难，他们一定帮忙。

接着，赵忍安夫妇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请了汉口商会负责人、银行公会负责人和民生轮船公司经理李肇基等作陪。彼时，武汉工、商、金融界都想宴请新任省主席，为他举办宴会，都被一一谢绝，唯独和成银行的赵老板得了这个面子，大大出人意料，一时都对赵忍安刮目相看。

有一次，汉口银行公会理事长、交通银行经理邹安众设宴招待万耀煌，只上了头道菜，万就借口有事走了。万径直驱车到赵忍安家，说：“宴会应酬太疲倦，我到这儿来搞点小吃。”交通银行与和成银行在同一条街上，万的这一行动，更让人觉得万、赵关系密切，非比寻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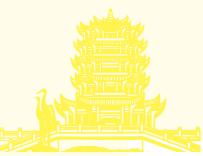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赵利用与万的来往，迅速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为在工、商、金融界开展统战工作打开了大门。万到鄂不久，赵忍安就被选为汉口银行同业公会常务理事，1947年又被选为全国银行公会候补理事，广泛活动于工、商、金融界的上层。

1947年底，万耀煌调走，张笃伦继任湖北省主席。张与吴晋航的关系更为密切，是几十年的朋友，张还是和成银行的董事。吴晋航来汉口时，张笃伦请他吃饭，赵忍安夫妇作陪，作陪的还有武汉市政府的主任秘书孙际旦及夫人。张笃伦特意对孙说：“以后对和成银行要尽力帮助。”孙受宠若惊，满口应承。当时白崇禧为筹集军费，经常要市政府出面向各银行摊派，弄得银行公会和工商界人士压力很大，纷纷求赵忍安出面，去找孙际旦疏通。结果确实有效，捐款先摊个数目，拖个一月左右，等金圆券大大贬值了再交上去。

1948年4、5月间，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路过汉口去襄阳，孙际旦在家设宴招待，请湖北省主席张笃伦夫妇、汉口市长徐会之夫妇，由赵忍安夫妇作陪。赵忍安十分厌恶



徐会之



1948年7月，襄樊战役中康泽被
解放军俘虏

特务头子康泽，不愿前往。他把这个情况汇报给曾惇，曾惇觉得这倒是个探听军情的好机会，鼓励他前去。果然，康泽喝了几杯酒后，谈到中原战局就吹嘘起来了：襄阳、樊城国军兵力很强，有四个旅和另两个团；即使樊城失守，襄阳前有河，后有山，精兵布防，固若金汤；襄阳城四个角都筑了堡垒，设了重防，城内司令部筑了大碉堡，四周还有四个碉堡护卫。康泽把布防情况讲得很详细。宴会之后，赵忍安夫妇回家一夜未眠，把脑子里记的情况互相比对，第二天一大早就向曾惇做了汇报。其后不到2个月，襄阳、樊城被我军占领，康泽被俘。

广交朋友的“智多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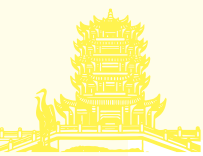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为了在武汉工、商、金融界开展活动，赵忍安广交朋友，于1946年同唐午园、李肇基等工商界巨头发起组织了“星期五聚餐会”。这个“聚餐会”开始是“四川帮”的银行界、实业界人士参加。后来，随着赵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提高，当选为汉口银行同业公会常务理事和全国金融界公会候补常务理事，“聚餐会”的人员逐步扩大到武汉的工商、银行界，最后发展成为有五十几个工商企业、银行经理、厂长参加的社交组织。申福新厂的总经理李国伟、经理章剑慧、厉无咎，市商会主席贺衡夫以及刘梅生、周兹柏（恒顺机器厂经理）等武汉工商界的头面人物都成了“聚餐会”的座上客。

这种“聚餐会”的形式很适合当时工商、金融界上层人士的社会习俗和需要，有些人借机了解各地市场行情和信息，有些人是打牌娱乐，有些

人则喜欢闲谈聊天，在闲聊中往往涉及时政问题。例如，有次闲聊中谈到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引起了一场争论。李肇基、唐午园、厉无咎等人赞成苏联支持中共，主张中苏合作；也有少数人鼓吹美帝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政策。这样，通过“聚餐会”，既广泛结识了各界人士，又借此了解了他们的政治态度，有助于贯彻党“发展进步，争取中间，孤立右翼”的统一战线政策。例如：四川汇通银行经理杨某是青年党中央委员，当时来武汉秘密发展组织，经过金融小组讨论，决定赵忍安出面在工商、金融界人士中揭穿他的面目。有次，杨某在聚餐会上大放厥词，赵忍安抓住这一机会，通过唐午园在会上揭露了杨的身份，弄得杨十分狼狈，不久就灰溜溜地跑回重庆去了。

为了进一步团结武汉工商界的朋友，赵忍安还利用汉口银行同业公会常务理事和全国金融公会候补常务理事的合法身份，通过对汉口市工业会和银行公会的合法活动，巧妙地开展了对官僚资本集团的斗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打内战，扩军费，滥发纸币，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美帝大量倾销剩余物资，美国货充斥市场，形成垄断局面。在官僚资本的压迫和排挤下，1947年间，武汉不少民营工厂发不出工资，生产难以为继，有的濒临倒闭。很多中小工业资本家纷纷向汉口市工业会求援，要求银行贷款，解燃眉之急。而以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家银行为代表的官僚买办集团害怕火烧到自己头上，就要了一个花招，名为“救济工业”，却要民营商业银行成立贷款银团，并要工业会主持登记，自己却分文不拿，妄图把这一矛盾转嫁到民族金融业头上。

面对这一形势，赵忍安考虑到私营工业绝大多数是民族资产阶级，维持民营工业生产是个大问题，必须设法解决，否则就会造成不少民营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但当时民营商业银行自顾不暇，无力贷款。为此，赵以银行公会常务理事的身份，向银行公会出了个主意，即由民营商业银行答应贷款，但要中央银行“贴现”。所谓“贴现”，就是由民营工厂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由商业银行开出本票，再由中央银行垫



款贴现，按照规定的期限（如半年），由商业银行负责归还中央银行。这个“贴现”的办法很巧妙，如果中央银行同意“贴现”，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到偿还垫款时，币值已一落千丈；如果中央银行不“贴现”，那么工业界人士、工人、社会舆论都会责难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也就摆脱了困境。这个主意立即得到几十家商业银行的拥护，工业会的所有工厂厂长都表示赞同。

在工业会开会前，赵忍安又找工业会厂务理事孙葆基、厉无咎谈了这个想法，要双方（银行公会和工业会）共同“将中央银行的军”。会议开得十分顺利，先由孙葆基代表工业会提出要求银行同业公会联合贷款。赵忍安则代表银行公会表示支持，但说明商业银行当前的处境，要求中央银行贴现。开始中央银行副经理刘望岳表示不同意，但在工业会和银行公会双方集中向中央银行开火后，中央银行被迫答应下来。这样，在武汉临近解放的几个月中，各民营工厂靠贷款渡过了难关，维持了工人生活，并用贷款储备了一些黄金、银元和粮食，维持到武汉解放。赵忍安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进一步提高了他在金融界、工业界的声望，巩固了他在银行同业公会和工业会的地位。

筹集银元送瘟神

1949年5月12日晚，赵忍安接到地下市委的电话，说白崇禧派了一连人把电信局包围了，要进行破坏。赵忍安赶紧乘小汽车赶往电信局，到那儿一看，电信局果然被敌兵包围了。赵大模大样地递了一张司令部孟处长的名片，门岗就放他进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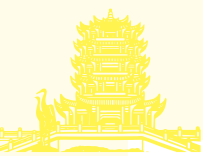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赵忍安径直走进局长办公室，尤局长和祝总工程师正在里面商量，苦无对策。一见赵忍安进来，两人大吃一惊：“这里乱得很，你来干什么？”他说：“受中共地下市委的委托，找你们商量如何防止国民党破坏电信局。”两人听这话，更吃惊了：赵忍安这个阔老板什么时候受地下市委领导了？三人共同研究之后，决定找敌兵的连长来谈判，花些钱试试。经过谈判，

敌连长同意给二百块银元就撤兵。加上外面疯传“共产党已进市区了”，敌连长也十分害怕，急忙拿着钱把一连人撤走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曾惇会见了张难先和李书城两位老先生，他们得知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要破坏工厂和轮船码头，建议党组织动员工商界给鲁道源送点钱去。曾惇立即派赵忍安、华煜卿于5月15日下午赶到市商会和工商界人士赵厚甫商量，后来凑了6000银元送到汉口永利银行大楼鲁道源守备司令部。当晚，鲁道源就从江汉关撤兵。



张难先



义顺泰油行和汉昌肥皂厂的能工巧匠

◆ 宋 健

1945 年底，武汉的冬天似乎格外阴冷，长江边码头上的声声汽笛更增添了几分凄清气氛。一个身穿工装的年轻人从重庆来的轮船上下船，匆匆忙忙消失在武汉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这个不起眼的青年工人，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派遣到武汉来开辟城市工作的地下党员刘实。

孤身一人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武汉，刘实一下船，看着繁华的都市，不禁有点茫然。虽然他身上带着两封党组织通过进步人士关系写的介绍信，但要想在这座城市落脚并开展工作，并非易事。武汉当时作为国民党当局统治的中心城市，军警林立，特务横行，党的组织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开辟城市工作异常艰难、危险。如果没有一个职业身份做掩护，是无法立足的，开展地下工作极容易暴露。因此，刘实决定首先要找到一份工作。



刘实

拿着介绍信，刘实找到了联系人，在武汉总算有了落脚点。随后，他又陆续联系上了几个重庆来的工人，积极在武汉各工厂、码头寻找工作机会。当时的武汉百业凋敝，要找到一份工作并非易事。刘实等克服重重困难，通过民族工商业者陈经畬的儿子陈元直的关系，终于在陈经畬开设的义顺泰油行找到了工作，做包工和临时工，负责安装设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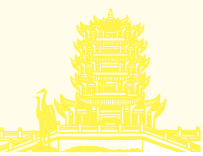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为了在武汉尽快扎根，刘实与几

个技术工人搭伙组成团队，虽然他们大多数人都是钳工和车工，只有一个干过冷作的工人，但他们团结一心，改行干起了冷作活，承包了修理锅炉等工作。他们住在炼油厂楼梯下低矮的小屋，吃着极其简单的饭菜，但彼此之间互相了解，亲密无间。身处工人群众中，刘实不再感到势单力孤。不久，刘实又进入汉昌肥皂厂，找到一份修理工的工作。他与陆续从重庆来到武汉的十几名工人民主工作队员建立了联系，大家分头在武汉找工作作为职业掩护。他们当中有人在武汉大学旁边开起了饭馆，有人不惜花银元给工头送礼，当上了码头工人。有一位来自西北师范学院的学生、教授的女儿张瑾格，按照刘实的要求放弃去解放区的机会，志愿从事女工工作。她毅然脱下旗袍，穿上纺织女工服，断绝与所有熟人的关系，进入第一纱厂当上了纺织女工。在纱厂中，她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工人姐妹交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学习纺织技术。不久，心灵手巧的她不仅熟练地掌握了纺织技术，还学会说一口流利的武汉方言，组织女工争取自身权益，开展怠工、罢工斗争，打开了女工工作的局面。

在武汉找到立足点后，刘实等人遵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一党的城市工作方针，按照南方局青年组刘光同志的叮嘱，先站稳脚跟，暂时不发展党员，不以党的名义开展工作，采用稳扎稳打、逐步渗透的方式，连点成线、连线成网，将地下党员、工人运动骨干逐渐分散进入各工矿企业，找到职业掩护身份。这些“能工巧匠”们犹如一颗颗种子，在工人群众中扎根、发芽，逐渐打开了武汉城市工作局面。

在汉昌肥皂厂工作期间，尽管生活艰苦、工作紧张、劳动繁重，但刘实等人还是挤出时间学习，并秘密油印发行《工人的话》和《中原青年》，交流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的信息。

刘实等人在武汉开辟城市工作的同时，受刘实派遣，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员杨福潮也主动找到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派往湖北接收电力工业的大员黄文治，洽商找工作之事。黄文治知道杨福潮原来是宜宾电厂的特级技工，手艺出众，不仅爽快地同意录用他，还要求杨福潮多找几个



人一起干活。

杨福潮来到武汉与刘实领导的第一纱厂地下党员侯杰接上头后，按照刘实的要求由黄文治把他分配到黄石的大冶电厂当技工。1946年2月，刘实来到黄石实地考察大冶电厂、华中钢铁公司、华新水泥厂、源华煤矿、利华煤矿等企业后，指示杨福潮：“这里是工矿区，大有可为，你要长期待下去。”为了加强地下工作力量，刘实又派遣地下党员张维明和工人民主工作队员熊延华来到黄石，由杨福潮分别介绍到大冶电厂和华中钢铁公司当钳工和车工，成立了由张维明为领导的三人小组。刘实则装扮成医生、商人或工人，每季度来黄石一次指导地下工作。不久，刘实又把在华中钢铁公司做工的地下党员张兆潜和在灿华煤矿当会计的地下党员谢速航介绍给张维明，由张维明单线联系。党的城市工作由此从武汉逐渐延伸到黄石、大冶等周边地区。后来随着党员队伍发展壮大，先后成立了中共大冶县委和黄石工矿特区工委等党组织。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工矿企业的统治是十分严密的，各厂矿不仅有警备队对工人进行武装镇压，还有工头、特务和帮会分子混进工人队伍，监视工人活动。大冶电厂、华中钢铁公司等单位还成立了由厂方控制的黄色工会——员工励进会，对工人进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地下工作、成立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工会是非常困难的。刘实指导黄石、大冶等地的地下党员们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按照党组织提出的“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要求，干一行、专一行，真正成为掌握工艺技术的能工巧匠，取得职业身份掩护。同时坚持“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原则，深入工人群众中，与工人谈心交友，了解群众疾苦，关心群众生活，启发工人觉悟，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和打内战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以成立互助会、兄弟会、伙食管理委员会、合作社、工人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组织工人维护和争取自身权益，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开展秘密宣传和怠工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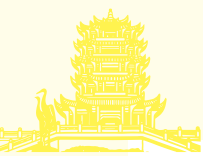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为了打入厂方控制的黄色工会——员工励进会，张维明、杨福潮等人组织一批工运积极分子参加各种文体活动，成立篮球队、足球队、歌咏队，

还组织登山、春游等活动。张维明、杨福潮因积极组织和参加文体活动，被选聘担任了员工励进会文体干事，获得了公开合法身份组织群众开展活动。他们把歌咏队取名为“海燕”，经常组织工人演唱《黄河大合唱》《毕业歌》等进步歌曲，后来又成立了演剧队，演出《反正》《钦差大臣》《王大娘补缸》等进步话剧，起到了良好的宣传、组织、教育工人群众的作用。

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刘实等地下工作者在武汉、黄石等地逐渐站稳了脚跟。他们在江岸机车厂、第一纱厂、下新河电厂、联勤总部武汉被服总厂、三十兵工厂、海军工厂、鄂南电力公司、大冶电厂、华中钢铁公司等单位都发展了一批进步力量和工运骨干，为随后武汉的爱国民主运动兴起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此外，刘实还向湖南衡阳派出了几位党员去开展地下工作，后来建立了衡阳直属支部，直属中共武汉市委领导。

随着武汉城市工作的开辟，如何解决党的活动经费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当时党组织并没有专门的活动经费发给地下工作者，只是在接头的时候给些路费。因此，这些找到工作的能工巧匠们只能“各显神通”，不仅要靠自己的手艺挣钱生活，还要缴纳党费，收入高的还要多上交经费给党组织。如在汉口中国石油公司当职员的张敬先除留下生活费外，几乎将自己的薪水都上交党组织，甚至还变卖沙市的房产，将钱上交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地下党员邓祥也卖掉父亲遗留的房屋，将钱全部上交党组织。

这些潜伏在武汉及周边地区的地下党员和工运骨干，犹如流淌在地底的清泉，悄无声息地滋润着江城大地，为这座华中重镇带来了春天的气息。



红色商人和老板的红人

◆ 刘桂芳

抗战胜利后，为把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的武汉党组织恢复起来，南方局陆续向武汉派出了几支地下力量。一支支红色力量通过各种渠道悄悄潜入武汉，分布于闹市之中，渗透在各行各业，迅速在这个城市扎根，发展壮大。

红色商人陈克东

陈克东和党员骨干张敬先、司光绣是几支红色力量中的重要一支。1945 年底，他们受南方局派遣，由重庆到武汉，任务是：重建、壮大武汉地下党组织，建立武汉交通联络站，为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策反国民党反动派在武汉的党、政、军、警上层，收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武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情报送到解放区。

为稳妥起见，陈克东派张敬先和司光绣先到武汉，站稳脚跟之后，自己再进武汉。陈克东领导的大部分是湖北人，对湖北很熟悉，与各方面都有联系，他们以做小买卖和跑单帮为掩护，来往于武汉与沙市之间。为了在时间短、资金少的情况下尽快建立交通站，解决地下党活动经费，大家集思广益想了很多办法，有的同志建议开公司，有的建议开工厂，有的建议开餐馆。张敬先建议开一家中型绸缎布庄，兼营批发棉纱业务。因为做过绸缎庄主管，开绸缎布庄对张敬先来说是轻车熟路。陈克东同意张敬先的建议，决定在武汉开一家中型的绸缎布庄。开店需要资金，陈克东除向上级组织申请一部分经费外，还动员共产党员筹集资金，吴裕煜一个人就凑了几百块银元。

在店址的选择上，他们也颇费了一些周折。在汉口做绸布生意，热闹的地方不利于建交通站，偏僻的地方利于建交通站，但生意不好做，找了几处都不合意。正在着急的时候，张敬先以前认识的布匹批发商告诉他，六渡桥附近有一家门面房要出租。张敬先和司光绣赶到出租屋，仔细观察房子环境、布局、结构，谈好租金后与房东签下协议，租下了整套房子。这套房子单门独户，上下两层，还有后门。一楼门市做零售生意，二楼做批发业务，后面可做仓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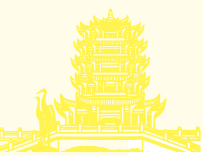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陈克东

很适合建交通站。陈克东非常满意，指示马上装修进货，店名为“泰新绸缎布庄”。两人立即行动，司光绣联系租借、制作柜台、货柜，粉刷门面，翻新招牌。张敬先凭借熟悉的进货渠道，开始挑选各种花色绸缎布匹。

陈克东在绸缎布庄开张前赶到武汉，作为“泰新绸缎布庄”的经理，他身穿长袍马褂，神采奕奕，迎来送往，俨然是一位老练的商人。张敬先安排鞭炮、锣鼓，布匹批发商前来祝贺，店前店后，里里外外照顾很周到。司光绣负责财务，暗中担负看守机关任务。没有人会想到这家中规中矩、地地道道的绸布庄，居然是共产党人的地下交通站。

绸缎布庄能在短时间内开张，让陈克东对张敬先和司光绣的工作很满意。布庄主营布匹，兼营棉纱，因为物美价廉、服务热情周到，生意十分兴隆。做生意既掩护了自己，又为革命筹集了经费，可谓一举两得。陈克东领导的绸缎布庄为筹集武汉地下党活动经费作了重要贡献。

“泰新绸缎布庄”开张后，武汉地下党交通站也建起来了，除张敬先和司光绣先到武汉外，陆续到汉的还有朱康侯、李曼农、李昌伦、韩永年、祝敏鑫、吴明勋、吴君毅、汪圣荣、祁承焕、黄燕萍、赵华运、余金堂等。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陈克东要求交通站和策反小组成员尽快开展各



项工作：建立传递情报的秘密交通线；侦察国民党反动派兵力布防、火炮配备等军事情报；找内线了解国民党反动派的党、政、军、警要员的情况，做好策反、统战工作，分化、瓦解、打击敌人。

1947年4月，陈克东奉组织指示派吴君毅以布店店员身份作掩护，在上海建立了交通站，负责钱瑛与武汉之间的联络。后钱瑛转道去香港，吴君毅、张敬先均去港执行过联络任务。陈克东这一支党的力量还掌握一条从武汉经沙市到江汉解放区的秘密交通线。

老板的红人曾惇

1946年3月的一天，武汉关码头上，一艘从常德开来的小火轮上走下一对小夫妻，男的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斯斯文文，像刚毕业的大学生；女的长着一张娃娃脸，娇美可爱。男的叫曾惇，29岁，原中共湘鄂边特委、下川东特委书记，此次受南方局派遣，负责武汉地下组织的重建工作。女的叫王一南，24岁，此前是延安中央医院医生，专门随丈夫曾惇南下武汉，以夫妻身份做掩护。

离渝赴汉前夕，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多次找曾惇谈话，她强调指出：武汉是华中重镇，南北交通的要冲，做好武汉工作对全国都有影响。武汉是个光荣的革命城市，党在武汉的影响很深，但武汉在日寇占领时期，没有再建立党的组织，你们的任务是首先要在那里能扎下根，把党组织重建起来。特别要注意隐蔽，把根子深深扎在群众之中。不久，钱瑛通知他说：“去武汉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有两批同志已经出发了。为你到武汉做准备工作的赵忍安夫妇和李声簧已经在武汉扎下了根。我已经去信通知赵忍安，说你不久就要到武汉去，你就准备动身吧。”于是，曾惇辞别山城来到江城，夫人王一南和徐远随行。

到武汉后，李声簧立即安排他们住进了伯父李书城随从周辉林的家里。不久，他们又通过周辉林的关系搬到后长街居住。李书城时任湖北通史馆馆长。曾惇通过李声簧认识了李书城，自然也就认识了张难先。结识这两位地方元老，为以后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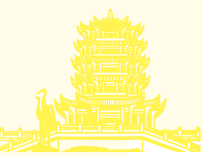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解决了住处，还需要合法身份作掩护。3月初的一天，曾惇乔装打扮了一下，到和成银行去见另一位打前站的重要同志——赵忍安。到了银行传达室，他自称孙建业，是赵经理的亲戚。传达室的人赶忙去传，很快便转了回来，说经理有请。来到经理室，曾惇见到一位西装革履、相貌堂堂的中年人，正是武汉金融界新星赵忍安。见到曾惇来访，赵忍安难掩激动，赶忙领他到楼上的寝室密谈。都是自己的同志，曾惇也无需客套，直接说：“我来两天了，已经有了住处，现在没有身份证，首先要解决一个社会工作，才能得到身份证，请你帮忙设法解决。”

曾惇到来之前，赵忍安已经开始为他谋划职业，很快把他安排进震寰纱厂当技术员。在他办公桌对面，坐着一个姓王的同事，此人其实是个特务，赵忍安曾私下跟曾惇说过。曾惇表面与姓王的交好，暗中观察他的行踪，收集情报。而此人想着，自己的介绍人与曾惇的介绍人是至交好友，自己与曾惇就不算外人，所以并未刻意隐藏自己的行踪。这恰恰为曾惇监视他、收集情报提供了便利。

曾惇在纱厂做技术员，为了长期潜伏不暴露身份，只得下苦功夫钻研技术。有一次，厂方要他设计一座转梯，这下可给曾惇出了个大难题！没办法，他只好赶鸭子上架，临时抱佛脚，跑到书店买回一大堆土木建筑方面的技术书籍和资料，按书上的比例套着画，最后居然成功地设计出了一座转梯，还很适用。纱厂老板非常满意，厂里的工人们也都称他为“工程师”。

1946年底，不少地下党员陆续到汉，曾惇住在武昌下新河纱厂里开展工作不太方便。于是，曾惇按照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辞掉纱厂工作，由赵忍安介绍到汉口一家钱庄做文书。钱庄老板看他字写得好，工作又尽职，便干脆把私人信函等统统交由他处理。这样一来，每天工作时间变长，不便开展党的工作。他向钱庄老板提出辞职。老板以为他嫌钱少，再三表示要增加薪水，坚决不答应他辞职。曾惇见钱庄老板会错了意，请辞不掉，只好让赵忍安出面。赵说曾惇家中确有急事要办，钱庄老板这才万分可惜地放他走。

离开钱庄后，由司光绣同志掩护，曾惇住到了汉口汉剧院斜对面，才



得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党的工作。直到1949年初，中共武汉市委的郭治澄、童式一等人开办了一家“华中经济通讯社”后，他们给曾惇一张空头聘书和一枚证章作职业掩护。曾惇在汉口珞珈山街建立了秘密办公机关，在黄兴路租了住房，并在汉阳建立了预备机关，做到了“狡兔三窟”。这种以公开的社会职业作掩护，把住宅、办公地点和预备机关分开的做法，大大增加了地下工作的安全性。

到1947年初，曾惇及与他分头先来武汉开展工作的陈克东、刘实向钱瑛、刘宁一汇报了有关地下党前段在武汉扎根的情况。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及武汉地下斗争发展情况，钱瑛和刘宁一指示说武汉地下党的同志应马上统一和行动起来，积极领导武汉地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这样的形势下，首先是曾惇与陈克东在吴邦彦家碰了头，接着由黎智带来了刘实等党员的组织关系。以后，其他的一些关系也陆续交到了曾惇手中。党派到武汉的几支秘密工作力量终于汇合起来了。他们于1947年10月在武汉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和武汉市工作委员会两个地下党领导机构，由曾惇和刘实分别担任省、市工委书记。

武汉行营成了铁扇公主

——记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刘实情报小组

◆ 刘士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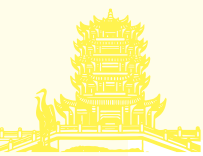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牛羊肥壮驼铃响，远处的工厂冒青烟。”20世纪50年代，一曲《我骑着马儿过草原》唱遍大江南北，并风靡苏联和东欧各国。这首歌的词作者是缅甸归国华侨马寒冰。今日的人们，已很难将这优美的歌与70年前发生在武汉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国共情报战联系在一起。

70年前的中原突围打响了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枪，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令人惊讶的是：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部队为什么会精确地知道国民党军发动全面内战的时间，抢在国民党军发起总攻前的4天突然分路突围？这其中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调兵聚中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集团开始调兵遣将，妄图发动全面内战，其攻击目标直指在武汉外围坚持了七年敌后游击战争的新四军第五师。

为加强中原军区力量，中央军委急电从陕甘宁边区出发、此时已前进到粤北打算建立广东五岭抗日根据地、由王震和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359旅（又称八路军南下支队和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北返；令八路军王树声嵩岳军区部队和王定烈冀鲁豫水西8团从豫北南下驰援。10月24日，八路军、新四军四大主力在河南桐柏地区胜利会师，组成有六万余人的中原军区部



队。10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也开始派遣干部到武汉，重建经过7年日伪统治后几乎成为空白状态的地下党组织。到1946年4月止，南方局先后派遣曾惇、陈克东、刘实分别率领的几批党员干部和秘密外围组织成员到武汉开辟工作，史称“三路人马进武汉”。但曾、陈、刘相互之间并没有横向联系，各自为战。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将驻扎在恩施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调往武汉，还调集30余万精锐主力，构筑6000多座碉堡，将中原部队逐步压缩围困在方圆仅二百里狭小的宣化店地区，中原大战一触即发！

虎穴获情报

1945年8月，刘绵等4位进步青年学生受南方局青年组的朱语今派遣，正行进在从重庆到湖北江汉解放区的路上。当他们乘船赶到湖北巴东地下联络点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该联络点已经撤换了，无法找到联络人。进退两难的刘绵突然想起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在附近的恩施城，司令官孙蔚如与他父亲有世谊关系。几人一合计，盘缠不够，又没有联络员接应，解放区一时去不成了，先到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落下脚再说。

这一偶然情况和临时决定，恰好为后来中原部队胜利突围埋下了伏笔。



1946年的刘绵

凭借着父亲与孙蔚如过去的交情，刘绵顺利进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由于他有名牌大学朝阳法学院的学历，又有特殊关系，长官部特意安排他担任机要室总收发，并授军委二阶（相当于中尉）军衔。日本投降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开进武汉受降，1945年底，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基础上组建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不久改名为武汉行辕），程潜为主任，孙蔚如为副主

任。刘绵随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进入武汉行营，并改任监印官。行营一切文件都要由他过目并登记在册，盖印后再分送给有关长官批阅。

不久，朱语今派老红军谢速航（吴平）与刘绵取得联系，将他的关系转给刘实。此时，刘绵还没有入党。刘实指示刘绵：“你已经潜伏在敌人华中数省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机要部门，必须坚决留下为党工作。利用职务方便获取各种有价值的情报，摸清敌首脑机关的活动规律和动态。只能与我单线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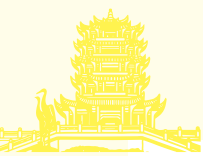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与党组织接上关系的刘绵，就这样鬼使神差般地成了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

1946年初，武汉行营开始部署围攻中原军区部队，并特别成立了专门反谍的行营二处，由军统特务重点监视内部人员，防止泄密。

没有任何专业拍摄设备的刘绵，先是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获取情报，下班后再在宿舍默写下来。由于情报实在太多，光靠死记硬背也记不了多少，刘绵决定冒险。他将机密文件悄悄带到宿舍，暗中抄录在小纸片上，然后在电影院将情报交给刘实，不料受到刘实的批评。刘实严厉地对他说：“带机密文件回宿舍是非常危险的，宁愿不要情报也要保护你这只‘孙悟空’。”

此时，敌人也加强了控制，机密文件专人专送，校对文件时特务就站在旁边监视，校对完盖上公章后立即拿走。遇到重要文件，刘绵只能故意拖延时间，以便记牢。有一次，站在旁边的特务对他起了疑心，质问说：“不就是盖个印吗？这样认真看，想干什么？”刘绵机智地答道：“这是重要文件，要做到一字不错，必须多校对几遍才靠得住。万一出了差错，上峰怪罪下来担当不起。”久而久之，特务也见怪不怪了，还称赞他办事认真哩！

就这样，刘绵以小学生背书的方式收集了敌军兵力分布、武器装备、防区划分、作战计划、团以上军官名单、随军特务名单等大量准备围攻中原军区的绝密情报，晚上回到宿舍再默写在纸上，按约定时间转给刘实。



机智送情报

就在刘绵打入虎穴的同时，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派去新四军五师工作、由于情况变化又回到武汉的岳健中也与刘实接上关系。刘实将情报交给岳健中，岳再抄录成蝇头小字藏起来。

当时，湖北省工委和武汉市工委都还没有成立，刘实是外地人，对当地情况也不甚熟悉。刘实根据情报，了解到敌人正在密谋围攻中原军区，心急如焚，但怎样才能安全送出情报成了大难题。于是，他急召岳健中和打入汉口美国新闻处图片部的地下党员陈枫开会商量办法。陈枫告诉刘实：“听说应城附近有我军在活动。”经过仔细商量，他们最后决定由陈枫设法开一张美新处的路条，以到应城县接洽放映电影和办图片展览为由，派岳健中到应城去送情报。遇到敌兵盘查，就说陈枫是他的顶头上司，叫他们打电话向陈枫核实身份。

岳健中把情报抄在薄纸上，用小塑料袋和香烟锡箔层层密封以防潮，然后钉在皮鞋后跟夹层里。他还借了一套符合美国新闻处工作人员身份的旧西装，配上一副太阳镜，单枪匹马带着路条搭长途汽车出发了。

一身记者打扮、洋气十足的岳健中一路过关闯卡赶往应城，发现靠北面岗哨越来越密，国民党军警对路人盘查也十分严格，但他凭着美国新闻处的路条，让国民党军警见了都不敢多问，顺利闯关找到了新四军前线部队。部队首长当即派一个交通排护送他把情报送到了中原军区司令部。中原军区首长这才知道刘绵已成功打入敌要害机关，当即指示：“情报非常重要，请你立即回武汉继续工作。经费如有困难，组织上可帮助解决。今后联络办法，可先留下联络地址，在联络新址未确定前，武汉的情报无论如何得想办法直送宣化店中原军区司令部。”岳答复说：“今后可到汉口美国新闻处图片部找陈枫同志，经费问题我们自己解决，情报直接送宣化店的问题回去再想办法。”双方约定由美国新闻处陈枫为军队和地方党组织联络人。岳健中十几天后顺利返回武汉，首送情报成功。

首闯德明饭店

随着刘绵收集到的情报越来越多，再靠岳健中步行穿越敌人封锁线输送情报到宣化店的方式显然困难重重。

此时，中原大战一触即发，大量情报积压手中，焦急的陈枫和岳健中不顾个人安危，决定通过时任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驻宣化店办事处主任的中共秘密党员吴显忠向宣化店输送情报。吴显忠建议：“武汉到宣化店路途较远，风险很大。不如我利用合法身份，到德明饭店直接交给办理救济物资的中共驻汉代表吴德峰，既安全又快捷。”陈枫和岳健中别无他法，只得将情报交给吴。当天，吴显忠直闯戒备森严的德明饭店，将折成一个小纸包的珍贵情报送给了公开身份是军调处中共方面秘书的吴德峰。吴显忠向岳健中转告了吴德峰的口信：情报极其重要，地下党的同志一定要坚持做好情报收集工作。下一步怎么传递，通过陈枫转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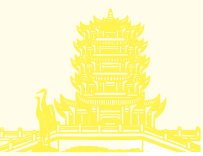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美国新闻处情报站

1946年4月，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人士组成的意在调停国共中原冲突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处）第9执行小组抵达武汉，也进驻德明饭店。

几天后，汉口美国新闻处福斯德处长通知陈枫：军调小组中共代表今天中午在岳飞街四川味腴餐厅二楼宴请美新处有关人员，请你按时出席。大喜过望的陈枫赶到时，穿一套深色西装、打领带、戴黑边眼镜的中共代表郑绍文和吴德峰早已在座。席间，一位穿草绿色军装、挂军官斜皮带、蓄平头的三十岁的年轻军官，用流利的英语意味深长地向陈枫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共代表团参谋马寒冰，日后定当拜访贵处。”陈枫心领神会地答道：“欢迎你来。”



军调处徽章



马寒冰

马寒冰在美国人的眼皮底下与陈枫接上了头。至此，刘实 5 人情报小组正式形成，吴德峰是实际领导人。根据吴德峰的指示，设在胜利街隆茂洋行内的美国新闻处图片部成了中共的秘密情报站，陈枫也成了钻进洋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

再闯德明饭店

几天后，陈枫接到亚细亚大楼那边美国新闻处处长的女秘书电话通知：“军调小组中共代表拜访了处长，想要点图片资料宣传品，处长交代说要你们尽量提供给他，请你接待一下。”两人见面后，马寒冰通知陈枫：“情况紧急，请你立即通知岳健中，今晚八时一定要到德明饭店东二楼某号房间，吴德峰同志有急事找他。”马还特别叮嘱：中共代表团住在里面，敌特封锁监视极严，来时要化装，利用一定的合法身份。要高度警惕，东二楼穿白衣的茶房等服务员都是特务。岳健中进去后行动要果断。

岳健中借了一套西装和一个记者证，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当晚再闯德明饭店时，茶房果然拦住盘问。岳健中一边神气十足地说“报社的，奉上峰命令采访”，一边推开茶房快步直闯房间。

吴德峰详细询问了情报收集和传递情况后指示：“由你们把情报直接送宣化店司令部困难大、危险也大且不及时。还是由你们把情报送到图片部，马寒冰负责找陈枫取情报，取回交由军调处中共电台发往中原军区司令部。”

从此以后，先由刘绵将情报交给刘实，刘实交给岳健中，岳健中用绘图钢笔将情报抄在邮票大小的薄纸上，然后一张张卷起藏在红金牌香烟里交给陈枫。陈枫将红金牌特殊香烟同前门牌普通香烟一起装在烟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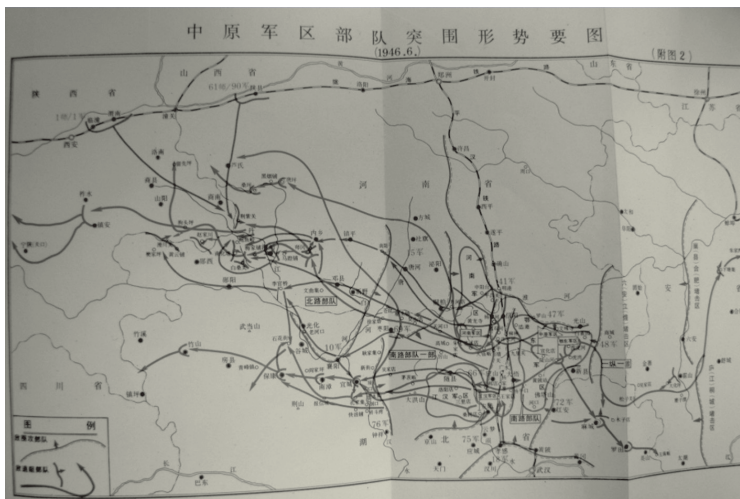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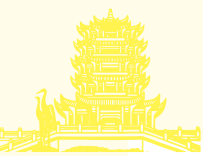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里，马寒冰来时，当着美国人的面，递过烟盒请他抽烟，马寒冰只从烟盒中拿红金牌特殊香烟，点火抽了两口后说：“口太干了，等会儿再抽。”把烟灭了装在自己的烟盒里。有时，陈枫将情报藏在火柴盒的夹层里。马寒冰抽烟时向陈借火柴，他擦一根火柴后顺手把火柴盒收到口袋里。办公室没有人时，马寒冰拿到装有情报的红金香烟，就直接装入自己的烟盒里。陈枫还将中原军区急需的药品捆在一扎美新处的图书里，由马寒冰取走。

有一次差点出了事。马寒冰见办公室无人，将一封信交陈枫时，福斯德处长突然推门进来，马寒冰慌忙地把信塞在陈枫屁股下。无论福斯德叽里呱啦说什么，陈枫就是坐着不起身，马寒冰也装着与陈枫在商量工作的样子。福斯德只得悻悻然走了。不久，吴德峰调离，由郑绍文接替指挥情报小组。

最后的战斗

1946年6月，国民党武汉行辕内气氛肃杀。敌人一边部署军事“围剿”行动，一边加强内部控制，实行十人连坐法，一人出事九人连坐，机关里人人必须签字画押，参加所谓“防奸保密小组”，互相监督，告发“不轨”言论和行动。处境日益险恶、下班后曾遭到特务跟踪的刘绵仍坚持战斗在敌人心里。14日，一叠绝密文件送到办公室，刘绵看了标题后大吃一惊。原来，这是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最终作战计划！其中有7月1日发起攻击的准确时间和兵力部署。刘绵见事关重大，一边机警地将作战计划压在文件堆最下面，一边冒着生命危险偷着摘抄，下班后紧急送出。

马寒冰急匆匆赶到美国新闻处图片部，将包括敌军数量、番号、兵种、武器装备情况、驻防地点、作战计划、军用电报密码、随军特务名单、抓捕地下党员黑名单、军运计划等最新作战计划绝密情报取走。军调处中共电台迅速将敌军作战计划传出，为中央军委命令我中原部队在敌军总攻前4天先敌突围提供了决策依据，为李先念司令员作出分路突围的具体部署提供了参考。



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形势要图

随着 1946 年 6 月 26 日夜中原突围大战打响，军调处第 9 执行小组宣布调停失败而撤销，中共代表团撤离武汉，美新处图片部情报站至此完成了历史使命。经过对敌斗争考验的刘绵于 1947 年 12 月经刘实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党组织安排，随由武汉行辕改编的长沙绥靖公署南下长沙，在地下党长沙特别支部从事策反工作。岳健中在汉阳武工队事件后改名张立武，也转移到长沙特支，担任负责统战策反工作的委员。刘绵和张立武一直战斗到长沙和平解放。1947 年 10 月，中共湖北省工委成立，刘实任委员兼武汉市工委书记，他和陈枫一直战斗到武汉解放。马寒冰加入 359 旅参加中原突围，后随王震部解放新疆。这些地下工作者用自己的勇敢、智慧和忠诚，谱写了一页中共情报战线的传奇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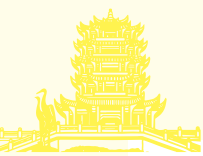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特殊的救济

◆ 宋 健

1946年春，内战阴云笼罩中原大地。国民党军以30余万精锐之师，对中原解放区形成严密包围，企图挑起内战，消灭中原军区部队。在国民党军不断侵袭、蚕食和封锁围困下，中原解放区军民面临着缺衣少食的严重困难。

就在这万分危急关头，一列挂着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标志的火车从平汉铁路呼啸南下，停靠在离中原解放区首脑机关所在地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仅几十公里的应山县杨家寨车站，从车上卸下的980余吨优质面粉被迅速转运到中原解放区。由美国人和国民党当局控制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华机构为什么会冲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将大量面粉送到中原解放区军民手中？这一“雪中送炭”的奇迹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要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华救济工作说起。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是一个帮助在二战中受害严重且无力复兴的同盟国统筹重建的福利机构，主要负责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害盟国的善后救济工作，帮助盟国救济难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和平家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上海设有分署，将各国捐赠的物资运送到中国，帮助中国战后建设。国民党当局设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并在湖北设有分署，负责接受和分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的救济物资，分署工作主要由爱国进步人士周苍柏、杨显东等负责。于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中原行政公署的负责人根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出的“不分政治、不分地域、不分宗教”和“只要有难，就要帮助”救济原则，积极向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署长周苍柏、副署长杨显东、顾问李范一等进步人士开展



统战工作。

1946年2月，中原军区参谋长王震将军在武汉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期间，就拜访了周苍柏、杨显东等人，洽谈有关中原解放区军民救济事宜。中原行政公署主席许子威也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汉口分署署长沙克诺夫、湖北分署副署长杨显东进行会谈，商议在宣化店设立善后救济分署办事处事宜。

1946年3月的一天，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来了一位贵客，受到了分署顾问李范一热情接待。这位客人就是中原行政公署副秘书长李实。他请李范一设法调运粮食，以缓解中原解放区在国民党军严密封锁下的粮荒问题。为了不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经过磋商，他们想出了一个“远水解近渴”的妙计，将善后救济总署运往上海的一船面粉作为救济物资，装上火车沿津浦铁路到南京渡江，经徐州转道陇海线到郑州，再沿平汉铁路南下，运抵中原解放区附近的应山县杨家寨车站，在此卸车转运到中原解放区。这一计划得到了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署长、爱国进步人士周苍柏的支持和批准。于是，980吨面粉就这样以合法方式运送到了中原解放区，缓解了中原解放区军民的燃眉之急。

在这些爱国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下，中原解放区和重庆局还派遣了一些地下党员进入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工作。如1946年4月，重庆局派遣地下党员汪德彰来到武汉，找到在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的联系人、地下党员李寿慈，由李寿慈出面将他介绍给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副署长杨显东。杨显东当即表示：分署正需要人，一定尽快推荐安排。不久，汪德彰便被湖北分署任命为专员，出任武昌难民招待所主任。

1946年6月，中原局城工部副部长顾大椿派遣秘密党员吴显忠来到武汉，经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署长周苍柏同意，被任命为分署专员和宣化店办事处主任。吴显忠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在周苍柏、杨显东、李范一等人支持下，千方百计地将争取来的一批又一批善后救济物资装上卡车，一次又一次地冲破国民党军封锁线运往中原解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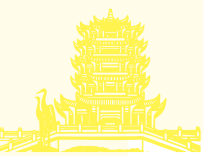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担任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专员和武昌难民招待所主任的汪德彰在这

一时期的工作同样也不轻松。他的任务主要是负责接送和帮助抗战中从沦陷区逃往大后方的难民返回家乡。在这个联合国主办的善后救济机构中，国民党当局的控制也是相当严密的，难民招待所内驻扎有宪兵和保安队，戒备森严，难民出入、就餐都有军警监视，夜间还有宪兵和保安队通宵巡逻。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汪德彰却接到了党组织交给的一项艰巨任务：利用难民招待所转移中原解放区的党员干部。

将解放区的同志化装成难民，从难民招待所转移，既安全隐蔽，又解决了食宿问题，还可以得到救济物资，能免费乘车乘船到达目的地，这确实是一条安全快捷的“绿色通道”。但要在国民党当局严密监控下做到万无一失，也并非易事。正在汪德彰着急之时，又有七位青年手持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宣化店办事处主任吴显忠的介绍信，说是经过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副署长杨显东批准，来难民招待所报到当雇员的。经过接头联络，汪德彰确定了这七个人的真实身份，他们分别是蔡云岭、吴学思（又名吴垠）、余迈行（又名余珍）、周紫文、吴克元、熊荒陵、孙振华，都是解放区派来协助他工作的干部和地下党员，是自己可以信赖的同志。

这七个人来到难民招待所的当天晚上，汪德彰等所有职员都下班后，把这七个同志请到办公室开会，详细向他们介绍了所里的复杂情况。大家经过商议分析，认为要完成帮助中原解放区的党员干部合法转移的任务，必须把三个要害部门掌握在自己人手中。

第一是掌握难民登记。因为从大后方来的难民都要凭原始难民证到登记处，经审核登记后，才能领到新的难民证，然后才能解决食宿、领到救济物资和解决车船问题。从解放区来的党员干部全都没有原始难民证，往往都是找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的内线关系写介绍便条，来所里找汪德彰开难民证。然而这种做法只能解决少数干部转移问题，人数多了容易出现漏洞，引起敌人怀疑和注意。经过讨论，大家决定由余迈行、吴克元两人管理难民登记工作。他们将登记收回的原始难民证中抽出一些不予注销，留给转移到难民招待所的党员干部使用，让来的同志装扮成难民模样，拿着截留下来没有销毁的原始难民证来登记，这样就取得了合法身份掩护。



第二是掌握救济物资保管与发放。自己的同志来到难民招待所，如果缺少路费，可以多发给他们一点救济物资，或者将救济物资变卖，作为地下工作经费。这项工作由周紫文具体负责。

第三是掌握难民接送和管理。其余四位同志负责将解放区的党员干部混杂到难民中，护送他们通过敌人的监视和盘查。汪德彰则以难民招待所主任的身份，在上层进行周旋、掩护。

汪德彰与这七位同志并不直接联系，而是通过联络人间接转达信息。这样，武昌难民招待所就被改造成了一个中原解放区党员干部秘密中转站，在敌人严密封锁下开辟了一条安全便捷转移党员干部的“绿色通道”。

正当这项工作顺利开展之时，一个意外情况突然发生了。1946年9月初的一个下午，汪德彰收到了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发来的一份紧急公文，说收到武汉警备司令部密令，据可靠密报，难民中隐藏着“异党”分子，有的还随身携带武器，接头暗号是袜底有一种特殊花纹。密令要求难民招待所主任率领全体职员协助军警当晚在难民中进行彻底搜查。

看到这份杀气腾腾而又言之凿凿的公函，汪德彰不禁暗暗吃惊：是内部出了叛徒？还是敌人发现了破绽？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仔细分析。凭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深知通过国民党统治区和封锁线转移的党员干部绝不会随身携带武器，接头联络也是凭暗语对话，根本不会用什么袜底花纹做暗号标记，由此他判断敌人要么是虚张声势，敲山震虎，要么就是得到了假情报！他立即通过联络员通知在招待所工作的各位同志做好思想准备，千万不要紧张。同时通知难民中等候转移的干部做好准备，如果随身携带文件，立即销毁，晚饭后不要离开招待所，敌人搜查时一定要沉住气，处之泰然，不要紧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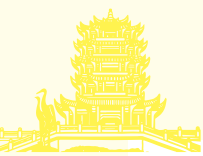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晚饭后，汪德彰通知全体职员集中，公布了紧急公文的内容，要求大家协助配合警备司令部军警的搜查行动，他还故意叮嘱大家保密，不得走漏风声，以保持搜查行动的“突然性”。

晚上9时许，几个国民党军官带领宪兵、警察荷枪实弹包围了难民宿舍，并在空地上架设了几挺机关枪。随后，如狼似虎的军警开始对难民进行逐

一搜查。他们一面查看难民证，打开难民行李检查，一面对宿舍内外进行严密搜查，认为可疑的还要进行盘问。汪德彰和同志们不动声色，还假意帮忙进行搜查。

国民党军警的这次搜查行动一直持续到黎明，然而，他们除了查出几名无家可归的难民长期住在招待所“逾期未归”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异党”分子，最终只好悻悻撤离。武昌难民招待所这个地下中转站有惊无险，安然无恙。

经过几个月秘密斗争，汪德彰和他的同志们圆满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陆续离开难民招待所，开始迎接新的战斗。



不倒的红旗

◆ 宋 健

1947年6月30日夜晩，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余人强渡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到10月初，刘邓大军总部和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进驻黄安七里坪一带，黄陂、新洲相继被刘邓大军攻占，成为鄂豫解放区的组成部分。

为了巩固新解放区，刘邓大军抽调大批党员干部和一部分主力部队到地方工作，于1947年10月在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共黄陂县委和县军事指挥部，12月在双河集成立黄陂县爱国民主政府，县委书记、县长分别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19旅56团政委赵前和57团团长刘振歧担任，黄陂县地方武装县大队则直接由56团3营改编组成。10月中旬，中共鄂豫第四地委决定将黄冈西乡分离出来，成立一个新的县——新洲县。县委书记由鄂豫第四地委组织部长汪进先担任，县长由随刘邓大军南下的干部张若谷担任，年底由刘天元接任。新洲县军事指挥部和县大队由晋冀鲁豫野战

军第6纵队抽调一个连改编而成。

刘邓大军的到来，使大别山区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在人民群众支持下，刘邓大军如秋风扫落叶，横扫武汉外围的国民党军和反动地方武装据点。



1947年8月下旬，刘邓大军胜利抵达大别山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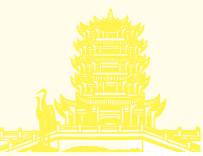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10月8日，新洲县柳子港徐王家湾的祠堂里，住进了两位有浓重四川口音、和蔼可亲的解放军首长。当地民众并不知道，这就是威震敌胆的刘邓大军统帅刘伯承与邓小平。他们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进驻新洲，是为了就近指挥战斗。

10月10日，刘邓大军第1纵队第1旅在中原独立旅配合下，向盘踞新洲李家集的国民党第52师99团一个营发起猛攻，用重炮轰开李家集东门，全歼守敌。在鄂东麻城和皖西张家店，刘邓大军也取得了歼灭敌军两个旅的重大胜利，中共中央特地发来贺电庆祝。

刘邓大军的南下和武汉周边各解放区的建立，让国民党武汉当局陷入极度恐慌之中。武汉行辕、武汉警备司令部急忙在武汉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拼凑散兵游勇成立汉口保安旅，并大量征用劳力、物资，在市区和郊区大兴土木，修建所谓“国防工事”，并对武汉外围新解放区进行严密经济封锁，企图将刘邓大军困死在大别山中。蒋介石在对陕北、山东“重点进攻”接连受挫后，又眼看中原地区“后院起火”，急忙拼凑14个整编师共33个旅的兵力，由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指挥，从11月开始向大别山区刘邓大军展开围攻，采取军事与政治、围攻与“清剿”相结合的所谓“总体战”，一面以正规军主力分进合击，企图寻找刘邓大军主力决战，一面利用地主恶霸组织“还乡团”、保安团、自卫队等反动地方武装，进入解放区烧杀抢掠，摧毁新生的解放区的地方党组织、人民政权和革命武装，配合正规军进攻。

面对严峻形势，刘邓大军采取了内线坚持与分兵向外，内外配合，寻歼弱敌的方针来粉碎敌军围攻，除留下一部分兵力在内线坚守大别山区，主力于1948年春陆续转移到淮西、桐柏、江汉地区，转入外线作战，开辟新解放区。

刘邓大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后，武汉周边各解放区面对疯狂反扑的国民党正规军和反动地方武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黄陂，敌175师警卫营进犯长轩岭西南的村庄，黄陂县长刘振歧提前得到情报，带领县大队一个连和县、区手枪队采取突然袭击方式伏击敌军，击毙敌营长，俘



敌排长以下官兵 10 余人，缴获重机枪 2 挺、步枪 10 余支、弹药 10 余箱，将这股敌军全部击溃。陈民选带领 1 个连到黄陂姚集、十棵松之间公路上伏击敌军，击毙敌少将参议一名，并俘获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战地视察少将参议周心怡，取得了敌军重要军事情报，震撼了敌军围攻大别山的军事指挥机关。黄陂县、区地方武装还对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和乡保人员进行有力打击。

在新洲县，“围剿”与反“围剿”斗争进行得尤为残酷、激烈。国民党军第 172 师、48 师、28 师各一个团，加上反动地方武装，对黄冈、新洲、罗田等地连续进行“清剿”。敌军以新洲县城和钱家寨为据点，四处搜捕中共地方党员干部，杀害贫农团员，破坏土地改革和新生革命政权。中共新洲县委和县大队、区干队等地方武装则采取“积极消灭地方反动武装，进行内线坚持，消耗与分散敌人，配合主力作战”的方针，与敌军展开浴血斗争。他们把反击目标首先瞄准了反动地方武装的老巢——钱家寨。

1947 年 12 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新洲县军事指挥部指挥长陈炳森根据事先侦察的情况，率领县大队和四分区两个连的队伍，兵分两路，迂回包围钱家寨。

钱家寨分为上、下两个寨子，上寨四面环水，仅一条通道与下寨相连，称为水寨；下寨半边环水，半边是旱地，称为旱寨。两个寨子外围有护寨壕围护，周边是一马平川，白天无法隐蔽接近。因此，陈炳森率领部队利用夜色掩护，冒雨行军，悄然包围了钱家寨。他根据地形情况和敌情，决定将攻击重点放在下寨，并集中 4 挺机枪封锁水寨与旱寨的通道口，准备“瓮中捉鳖”。

战斗打响后，从睡梦中惊醒的乡保队队员乱成一团，被消灭不少。但随后敌军却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寨墙负隅顽抗。手枪队队长余良贵和几名战士潜伏到寨墙边向敌人喊话劝降，乡保队却拒不投降，并以猛烈火力反击。作战参谋刘华山急中生智，下令战士收集稻草浇上煤油，对寨门进行火攻。不一会儿，熊熊烈火就映红了钱家寨的夜空。在浓烟烈火熏烤和县大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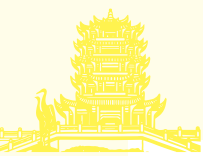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猛烈攻击下，敌军支撑不住，只得挂出白旗投降。被包围在水寨的敌军眼看旱寨失守，无路可逃，也不得不缴械投降。这次战斗端掉了新洲反动地方武装的一个老巢，击毙敌军 10 余人，俘敌 100 余人，缴获枪支 100 余支。国民党举东乡乡长兼乡保队大队长赵耀华被吓死。随后，县大队又在五区区干队配合下，奇袭盘踞新洲镇的国民党县保安队洪范部，歼灭保安队一个班。12 月 23 日，县大队再次出击，奇袭新洲境内国民党三个乡公所，并一举收复新洲县城。

接连受到打击的国民党军随即开始疯狂反扑，采取一系列毒辣手段对解放区进行“清剿”。一是大力扶植地方反动势力，成立“联防指挥部”“保安大队”等反动地方武装，配合正规军大修碉堡，广设据点，分区“围剿”；二是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联坐”，每五户共一个门牌，一人“通共”，五家同罪；三是强行筑寨并村，将群众集中驱赶到坚固寨子和据点控制区内，辅以政治诱骗和反动宣传，企图割断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四是用“反复合围”“捕捉奇袭”等战术，大肆搜捕共产党地方干部，追击、伏击党领导的地方武装。

在这种极其恶劣险峻的形势下，中共新洲县委决定将地方党政军干部全部实行军事化，将地方工作的干部全部编入县、区武装中，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在内线袭扰敌军，配合解放军主力作战。在两个多月残酷激烈的拉锯战中，新洲党政军力量付出了巨大而惨烈的牺牲。

1948 年 4 月 11 日，新洲县长刘天元在何家湾参加县委会议时遭国民党军包围被捕。面对敌人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刘天元始终坚贞不屈，丧心病狂的敌人最终居然用“车裂”的酷刑，以两部汽车将刘天元活活肢解。新洲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金震在将军山遭敌围困，在战斗中受重伤被捕。敌人劝降不成，便残忍地杀害了他，并将其头颅砍下挂在刺刀上游走示众。在此期间，新洲先后有 7 名县委委员壮烈牺牲，县游击大队和区干队也由 640 人锐减到 85 人。

敌人的疯狂“清剿”和血腥屠杀并没有吓倒共产党人。新洲第五区区委书记孙耘带领区委和区干队，巧妙利用熟悉的山区地形，顽强坚持与敌



人斗争。他们昼伏夜出，采取分散隐蔽、宣传群众、集中打击、惩恶除奸的方式，让敌人始终不得安宁。他们以暗中袭击方式，击毙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和保长，有力地震慑了反动分子。

为了铲除对区县干部威胁极大的绰号叫廖狗子的叛徒，孙耘根据敌人心怯多疑的特点，决定巧施“反间计”。他们故意给叛徒廖狗子写密信，嘱廖“按时将国民党四区区长汪铁夫活动情况报来”，假装不慎让信件被敌人截获，号称“汪屠夫”的敌区长汪铁夫得到信件后，误以为廖狗子是假投降、真坐探，立即下令处死了这个叛徒。

在人民解放军转战大别山期间，武汉外围地区党组织领导新开辟的解放区军民经受了严酷考验，开展了浴血斗争，始终让革命红旗在这片土地上高高飘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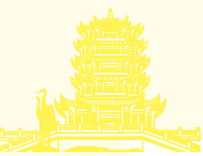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校花也是共产党

◆ 宋 健

位于东湖之滨、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山清水秀，风光如画。抗战期间，这所名校曾饱受日军铁蹄强占蹂躏。抗战胜利后，武汉大学从四川乐山迁回珞珈山，这所美丽的校园内再次响起了琅琅书声。然而，内战的隆隆炮声很快又打断了琅琅书声，内战造成了国民党统治区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的反对。1946年底，北平发生了驻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事件，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反美爱国斗争浪潮。

1947年元旦，武汉大学学生没有举行庆祝新年活动，而是以斋舍为单位，自发推选学生代表，成立了以卢明华为主席的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第二天，刚刚诞生的学生自治会就邀请华中大学、省医学院、省农学院等专科以上高等院校学生代表，在武汉大学学生宿舍平台中间的亭子间秘密召开会议，商讨在全市举行抗暴示威游行，并宣布全校罢课三天，提出“侵华美军滚出去”的口号。当天下午，学生自治会在体育馆召开全校规模的时事座谈会，同学们在发言中愤怒谴责美军暴行，指出：“国民党政府奴颜婢膝的可耻行径，是与蒋介石坚持内战、实行卖国的政策分不开的。”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十几位教授，有五位教授先后在会上发言，抗议美军暴行，谴责国民党反动政府卖国行为，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

1947年1月5日，武汉大学1300余名学生从珞珈山出发，会合华中大学、武昌艺专、省医学院等学校的学生，浩浩荡荡来到位于武昌平阅路的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请愿，随后过江到汉口国民党武汉行辕游行请愿。一路上学生们呼口号、贴标语，散发《告全国同胞书》，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请愿，



抗议美军暴行。当游行队伍转到天津路江边美国领事馆时，学生们群情激愤，齐声高呼英语口号：“美军滚出中国去”“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不是你们的殖民地”。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反击，国民党军在前线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为维护反动统治，在国民党统治区横征暴敛，加紧压迫剥削人民，引起人民更强烈的愤慨与不满。全国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随之高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武汉大学师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呼声也日益强烈。

中共中央南京局审时度势，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将几股单线联系的武汉地下党力量联合起来，积极领导武汉地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以配合支援人民解放军在前线的战斗。根据南京局党的组织工作负责人钱瑛的指示，曾惇、陈克东、刘实等三支武汉地下工作力量的负责人在地下党员吴邦彦家中会面，他们经过认真研究讨论，决定把武汉城市工作的重点放在学生运动方面，然后逐步把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武汉大学这座名校则成为了开展学生运动的重点院校。

早在抗战后期，南方局就派人在武汉大学的学生中建立了秘密核心小组。1946年10月武大从四川乐山迁回武汉，完成了新老交替的校内秘密核心小组也来到了珞珈山，其主要成员有1946年6月在成都入党的中共党员王尔杰和赵萌兰，还有夏雨亭等人，他们把校内进步社团骨干组织起来，形成了半公开的社团联合会，以此来影响推动学生联合会的工作。

鉴于武汉大学具有开展学生运动的良好基础，1947年3月，武汉地下党组织派徐远来武汉大学，与核心小组成员夏雨亭取得了联络。接着，武汉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刘实和另一位地下党员刘绵也来武汉大学找到他们的同学贾道桓和同乡袁宽寿，与武汉大学进步学生社团取得联系。武汉大学的学生运动得到党组织指导，更加蓬勃发展。

为了集中进步力量，团结更多的学生参加进步活动，王尔杰、赵萌兰、夏雨亭、孟兰生等人商议决定把武汉大学的学生进步社团联合起来，由“海燕社”的余际云、王伯谦，“文谈社”的郭书盛，“风雨谈社”的丁应瑞，“课余谈社”秦锡文等10人组成半公开的“社团联席会”，成为秘密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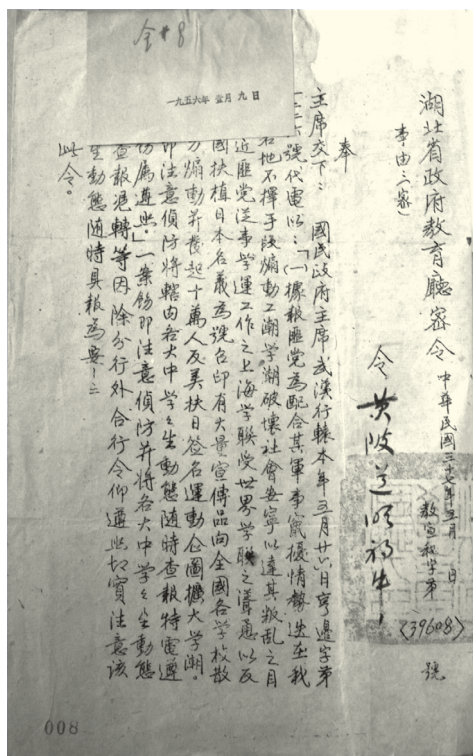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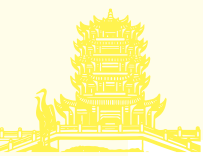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小组的外围组织，以此推动学生自治会的工作，领导发动校内各种斗争。这种组织形式，既有利于隐蔽学生运动骨干，贯彻执行党的领导，又有利于放手发动群众，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

这些学生社团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各社团还以女生为重点，积极组织反美抗暴游行活动。女地下党员赵萌兰和进步女学生、有“武大校花”之称的王云从等同学都积极参加社团组织的活动，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



王云从与陈荷夫

1947年5月，随着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彻底失败，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国统区人民为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爱国民主运动。为了防范学生运动，武汉行辕、汉口市政府、武汉警备司令部接连颁布禁止罢课、罢工和游行的禁令。5月17日晚，武汉大学学生“社团联席会”成员丁应瑞在体育馆张贴反内战标语，遭到特务围攻毒打。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又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格限制学生运动。武汉大学学生在学运核心小组领导下，由学生自治会出面，上千名学生签名同意，决定从5月19日起罢课三天。5月20日，南京发生了国民党宪兵警察血腥镇压游行学生的五二〇血案，正在酝酿罢课斗争的武大师生闻讯后义愤填膺，学生自治会立即请省农学院、省医学院、华中大学、武昌艺专等校学生自治会代表开会，决定5月22日联合举行示威游行，成立游行总指挥



国民党湖北省教育厅转达武汉行辕密令：
防范和破坏学生运动

部，由武汉大学担任总指挥，统一领导这次行动。

5月22日清晨，武大1700余名学生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旗帜，冲破国民党军以演习为名布置的机枪阵地，来到江边准备去汉口游行。不料国民党当局已事先下令封航，封闭了所有渡口和码头。愤怒的学生来到武昌湖北省政府请愿，要求恢复通航。游行队伍冲入省政府，写下了“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等大量标语，并画上“官肥民瘦”的漫画，表达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广大人民的心声。

这场席卷武汉和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得到了中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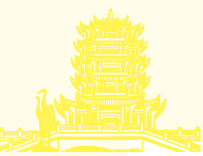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领袖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就在武汉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后的第7天，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评论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与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1947年6月1日深夜，国民党当局悍然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军队、警察、宪兵和特务，严密包围武汉大学，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在男生宿舍，从睡梦中被惊醒的学生们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以脸盆、冷水、板凳作武器抵挡敌人的殴打与袭击。他们包围了最后一辆囚车，赶走警卫，砸碎玻璃，将已被五花大绑的核心小组成员夏雨亭和鲍汝麟、索俊杰等同学救出。在女生宿舍，经常参加进步社团活动的王云从成为敌人重点搜捕对象。当特务们企图逮捕王云从、宋怀玉、余明清等女生时，女地下党员

赵萌兰带领刘诗秀、陈谋慧等女生，勇敢地与敌人进行斗争。130多名女生中许多都是进步社团成员，她们将特务团团围住，拼死夺回了被捕同学。这时，男生宿舍方向响起枪声，敌人开始了血腥镇压，当场打死3名学生，重伤3人，轻伤16人，逮捕师生员工22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武汉大学六一惨案。

六一惨案发生后，武汉地下党负责人刘实、陈克东和地下党员徐远、刘绵等人立即赶到武汉大学，与秘密核心小组成员联系，地下党员王尔杰召开了学生“社团联席会”紧急会议，成立六一惨案处理委员会，与国民党当局开展更加声势浩大的斗争。

六一惨案的枪声，不仅没有摧毁学生爱国运动，反而成为唤起民众的号角。在党的领导下，以武汉大学为核心的武汉地区学生运动不断高涨。六一惨案发生两三个月后，经过斗争考验成长起来的武汉大学进步学生骨干崔明三、余际云、王云从、王伯谦、刘诗秀等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10月，武汉大学成立了党支部，王云从这位清秀美丽的女大学生担任了党支部书记，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武汉大学六一惨案

◆ 李冰璇

1946年10月，武汉大学校址从四川乐山迁回武昌珞珈山。抗战终于结束，武大师生本以为从此能在湖光山色、绿树苍翠的珞珈山上安心教学、专心读书，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饥饿、贫困、内战与迫害。蒋介石撕毁国共和谈协定，坚持要打内战，紧缩教育经费用以维持庞大的军政开支。

1947年3月24日，周鲠生校长报告全校师生：“政府拨给武大的经费每月只有110万（法币），而2月份仅全校水电费就得支付260万元……”全部经费不敷水电开支，何谈教学科研？许多教授只能靠吃两顿红薯度日，学生更是悲惨，饥饿的阴霾笼罩着珞珈山的每一个人。1947年5月14日，上海学生率先发起反内战、反饥饿示威游行。接着北平、天津、南京、武汉等地学生也相继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向炮口要饭吃”、“反内战要生存”的游行。武汉大学进步学生在党组织建立的秘密核心小组率领下，由学生自治会出面，经过千余名学生签名同意，决定5月19日起，罢课3天，并通过《为响应和平运动，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公费数额宣言》，提出7点要求。

正在罢课的武大学生，得知南京发生五二〇血案的消息后，群情更加激愤。5月22日，由武汉大学发起，武昌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声援南京学生，抗议当局暴行。5月28日，武大举行“反内战、争温饱”时事座谈会，李剑农、刘秉麟、吴于廑、缪朗山、朱君允、金克木、梁园东、刘颖、石峻等教授在会上争相发言，强烈谴责蒋介石发动内战，不顾人民死活的罪恶行径。会上约定，武大响应华北学联提出的定于6月2日举行的中国各大城市学生大游行。

为振奋人心,5月31日晚,武汉大学举行了一场全校性的文艺晚会,学生们创作演出了《老母刺瞎亲子目》《凯旋》《茶馆小调》《古怪歌》等剧目,揭露控诉蒋介石发动内战,造成妻离子散、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富有感染力的演出激发了观众强烈的共鸣,一时间,台上台下群情激愤。

演出散场后,秘密核心小组的三位同学结伴回宿舍,边走边讨论两天后的罢课游行计划。小组成员、学生团体“文谈社”负责人夏雨亭突然回想起前不久结识的进步青年李子固白天专程来学校说的一番话:“从我们得到的各方面消息来看,国民党很可能在游行时下毒手,我们的意见最好是取消游行或改期举行。”他越回想心里越惴惴不安,于是对另外两位成员赵萌兰、王尔杰说:“你们觉得李子固的话可信不可信?国民党会不会在游行时下毒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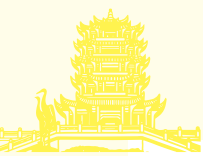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王尔杰安慰道:“目前罢课大游行的准备已就绪,取消或改变已来不及了,只要在游行时加强保卫工作,问题不会很大,不要太担心。”

赵萌兰点点头,说:“尔杰说得对,雨亭你别想这么多,最近几天连轴转,今晚早点休息,过两天罢课大游行时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呢!”

此时核心领导小组的同学们并不知道,“李子固”其实是地下交通员徐远的化名,他是武汉地下党组织特意派来报警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曾惇和国民党元老李书城的侄子、地下党员李声簧在5月下旬分别拜会了李书城、张难先两位老先生,在交谈中得知,武汉警备司令部准备对武大学生进行大逮捕。曾惇立刻要徐远尽快去武大找到秘密核心小组成员,将情报告知并建议其取消或改变原定计划。但问题在于,核心小组



武汉大学党的秘密核心小组成员王尔杰、赵萌兰



中的地下党员赵荫兰、王尔杰的组织关系还在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手里，并没有转到武汉地下党组织来。党的地下工作有一条重要原则：各个系统和人员间不准发生横向关系，以免一处遭破坏，损失一大片。因此，核心小组不清楚“李子固”的真实身份，只是把徐远当作一个普通进步青年和团结对象来看待，对他的话自然也就将信将疑。三人商量一阵之后，分别回宿舍，约定明天再讨论罢课游行的具体事宜。

其实，敌人所酝酿的阴谋行动远远超出了核心小组的预计。为镇压武大学生预定于6月2日举行的反战游行，蒋介石嫡系、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彭善召开军警宪特秘密会议，还有7名反动学生参会。会议决定派特务化装潜入学校，指挥校内的特务学生调查进步学生名单并监视其行动，三青团分子则公开组织反罢课反游行签名。5月28日，警备司令部审定了逮捕进步师生的黑名单，彭善叫嚣“一定要抓到为首的学生，宁可多抓也不要漏抓，否则制止不了学生捣乱”，企图将进步师生一网打尽。

当武大师生沉浸在5月31日文艺晚会的气氛中时，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正在秘密召开“六一大逮捕”前夕的最后一次会议。稽查处长胡孝扬在会上说：“今晚是我们具体要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照上峰指示，逐名缉拿，不得走漏。”

特务分子提出：“假如学生拒捕，怎么办？”

胡孝扬答：“不会的，不用说我们还有枪，就是徒手，这么多人还打不过几个学生娃娃吗？”

会议布置了两股行动小组，一股到武汉大学，一股到中华大学，到武大去的由胡孝扬和科长陈肇鸿二人亲自带领，胡孝扬任总指挥。

6月1日凌晨3时，国民党武汉行辕和警备司令部纠集第七十一旅、八十二旅、宪兵十二团、汉口警察总署、武昌警察总署以及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军警宪特数千人，全副武装包围了珞珈山。一部分兵力在街道口、杨家湾、洪山、农学院、东湖边等通往学校的要路口秘密布防，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部分兵力则直接包围学生宿舍和教员住宅，并在制高点架设机枪、迫击炮。武装军警在蒙着面罩的特务学生带领下，手持黑名单逐室

搜捕进步师生。

凌晨时分，珞珈山的宁静被一阵阵嘈杂的脚步声、叫骂声打破，熟睡中的师生从睡梦中惊醒。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阴冷、昏暗、恐怖的紧张气息，西边铁门落锁，东边岗哨林立，不准进，不准出，不准随便走动。每一寝室门前守以军警五六人，一持手榴弹，一持手枪，余下的手持步枪并装刺刀，如临大敌。

学生们茫然无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见荷枪实弹的军警在学生宿舍大肆搜索，按照黑名单上要逮捕学生的姓名、特征、院系班级和寝室铺位等信息抓捕进步学生。由于武大校舍范围大，宿舍重叠类似，军警的缉捕很不顺利。各行动小组出动后，有的顺利地找到要抓捕的师生，有的则来往乱窜找不到预定的抓捕对象，有的找到了寝室铺位又不是名单上要抓的学生，有的碰到名单上要抓的学生却又不在对应的宿舍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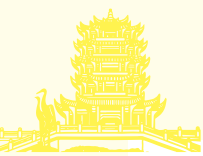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有个军警向一位黑名单上有名的同学问：“某某某是你吗？”

这位同学立刻机警地回答说：“不是。你们弄错了，那位同学住在某字斋第某某号。”并告诉对方由哪里拐弯顺什么方向到哪里。军警们急忙奔向所指的学生宿舍，结果遭到那里学生的痛骂。待发觉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后，军警特务们气喘吁吁地赶回原来的斋房，之前回答他们的学生早没了踪影。

最后，哲学系的金克木、机械系的刘颖、历史系的梁园东、外文系的缪朗山和朱君允等5位教授及其他10多名师生被军警逮捕，并押上警车准备分批带走。

凌晨5时许，天刚蒙蒙亮，完成搜捕工作的军警特务们准备离开。被监禁在宿舍里的学生们从窗户里望见宿舍前的马路上还停着一辆军用卡车，被捕学生一个个五花大绑，在寒光闪闪的刺刀、枪托押解下，被强行带上囚车，正待运走。困在宿舍的学生们感于同学之情，前请释放。在与军警特务说理无效的情况下，到早晨6时，天、地、玄、黄四个斋舍的学生首先冲出铁门，营救同学。

“不准动！谁动打死谁！”士兵端起了枪，但黑洞洞的枪口和冰冷的



刺刀没有吓倒同学们，大家愤怒地高喊：

“我们都是中国人！”

“反对内战！”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学生有什么罪？吃了败仗反过来镇压学生，算什么本事！”

几个军警突然如鹰犬般猛地冲到同学们面前，一把抓住敢于冒犯他们的人，恶狠狠地骂道：“他妈的！带走！”据说他们中间不少是从山东退下来的败兵，最怕听到讽刺国民党军打败仗的话。

看到敌人又在胡乱抓人逞凶，大家忍无可忍，刺刀、枪托再也无法阻挡学生们营救同学的决心，人潮中爆发出“冲出去”的怒吼声，像黄河决口一样势不可挡！刹那间，装有被捕师生的汽车被一百多名学生团团围住，两个荷枪实弹的军警死死地把着汽车门。看着被五花大绑的宛如死囚的同学，学生们气得眼睛都红了，有的捡起石头砸玻璃窗，有的从小窗中拖被捕的同学。一个军官下令司机开车，可司机被学生们强行拉了下来。几个学生合力把司机坐垫的木框架抬起来，一下一下砸方向盘，硬是把方向盘给砸弯了。玻璃和方向盘被砸，车底的油路、电路也被切断，汽车开不动了，但汽车被荷枪实弹的军警牢牢把守着，从小窗户营救被捕同学着实困难。于是，几个学生试图拖开把守车门的军警。推搡之间，那军警突然用刺刀刺向学生，这行为更加激怒了大家，一个学生勇敢地夺下军警的枪，周围的学生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制服了军警。

这时，一名军官突然朝天鸣枪，发令开火。一时间，遍布宿舍上下周围的军警亦纷纷开枪，抛掷手榴弹，并以自动武器向手无寸铁的学生随意射击。顿时，珞珈山上硝烟弥漫，樱园路上弹痕累累。学生们惊惶万状，赶紧匍匐在地，并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枪声仍持续了十多分钟之久。

关于枪声响起之后的情形，受重伤的学生戴焜6月7日曾这样记述：“这时在外同学全部卧倒，斯时我正在汽车旁，小腿中三弹，一弹入小腿骨中，余二弹略伤肌肉，当即卧倒车底，猛烈之弹火持续廿分钟之久……当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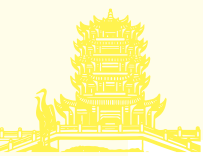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次枪声停时，我就看见一个同学在中央大门前阶梯上因头部中弹，脑浆四溅，滚下阶梯数级，鲜血染红好几个同学的衣服。某同学见已伤人，乃匍匐至一军官前，请令停枪，终仍无效。为此每次枪声中断，即有同学跪请停枪，直至第四次枪声过后，始未再放。”

学生伤亡极为惨重。在“地字斋”宿舍内，史学系学生黄鸣岗中弹当场死亡；在中门台阶上，土木系学生王志德中弹当场死亡；在“天字斋”茶炉旁，政治系台湾籍学生陈如丰中弹当场死亡。血流遍地，厥状至惨。他们3人都是一年级学生，竟死于国际上早就禁用的达姆弹之下。其中，黄鸣岗同学当时正身患疟疾卧病在床，听到枪声大作，起身向窗外瞭望，不料竟被一发子弹从右胸侧射入，穿过胸腔后由左胸侧飞出，掏出一个碗口大的洞，鲜血喷出，斋室内床上、墙上和地上殷红一片。直到入殓时，他还大张着眼睛和嘴巴，死不瞑目！事后有研究者明确指出，根据军警开枪时的站位和黄鸣岗斋室窗口的位置，可以肯定开枪者对只将头部和胸部露出窗口的黄鸣岗进行了精确瞄准射击，绝非流弹伤人。此外，重伤者有斋务员毛明章及学生戴焜、周佩瑜3人，轻伤者有学生王元吉、董光韬等16人，军警们押着被捕师生员工扬长而去。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武汉大学六一惨案。

事后，国民党政府武汉当局采取断绝交通、封锁新闻等手段，企图掩盖事实真相。他们还捏造证据，歪曲事实，竟然诬蔑武大学生私藏军火，企图暴动。中央社在6月2日的报道中造谣：“有学生多人将宪兵连长陈永嘉击倒，夺去手枪，冲突遂起”“一时互击，枪声大作，结果除夺回陈连长手枪外，并夺获共产党分子日十四式九二零六号手枪一支，子弹三粒”，等等。6月3日，为了自圆其说，中央社又报道：“军警重伤人员仍未脱离危险阶段，闻各界曾推代表前往慰问。”武汉警备司令部则贼喊捉贼地召开记者发布会，拿出他们屠杀学生用的子弹，胡说什么“是从学生手里缴获的”。

惨案发生后，师生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当日，代理校长刘秉麟与6名教授赶到武昌阅马场湖北省参议会，向



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程潜进行严正交涉。武汉地下党组织得知消息，立即派徐远、刘实、陈克东、刘绵等人赶到武大，了解情况，随后提出了如何进行斗争的6条意见。曾惇同志的爱人王一南，怀着6个月的身孕，徒步去武昌找到李声簧，把党的6条意见带到了武大。上午9时，全体学生齐聚宋卿体育馆，决定成立学生自治会六一惨案处理委员会，无限期罢课，派人员进京请愿，向社会各界说明事实真相。下午，教授会举行大会，决定罢教一周，成立宣言起草委员会和营救委员会。当天晚上，王尔杰从每个进步社团中抽出一名骨干，联合“教授会”、“讲师助教会”，参与组建六一惨案处理委员会，同时决定派代表赴南京请愿，并于6月2日发起抬棺游行，为死难烈士伸冤。

6月2日，学校教授会、学生会分别发表宣言，提出严惩凶手、释放被捕师生、公葬死难学生、优恤死难者家属、赔偿受伤学生损失、切实保障人权、保证军警特务以后绝不进入学校非法捕人等要求。

6月3日，从南京开会返校的周鲠生校长约集18名教授，齐赴武汉行辕交涉保释被捕师生，并抗议中央通讯社发出的歪曲事实真相的报道，要求追究责任。周鲠生向程潜呵斥道：“限你24小时内，全部交还我被捕师生。不然，我即组织5000人的队伍，披麻戴孝抬着三副棺材、二十副伤员担架在武汉三镇游行示威。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你程潜一人负责！”迫于周鲠生的“最后通牒”，程潜同意释放全体被捕师生。午后4时，被捕师生获保释返校。

得知六一惨案的消息后，全国各高校纷纷予以声援。华北学联决定罢课3天；清华、北大两校反饥饿反内战委员会组织罢课，并设祭坛遥祭武大死难三烈士；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也举行了追悼会；（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医学院、社教学院、北平交通大学、唐山交通大学、武大上海校友会、武大自贡校友会都纷纷来电慰问和声援。来自台湾台南的林慧庆代表武大台湾同学会发表《悼陈如丰君》，上海台湾同学会和台湾教育厅也发来唁电。在6月16日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的遥祭追悼会上，三具惨不忍睹的烈士遗体画像两边挂着一副挽联：

主子提供达姆弹；
奴才充当刽子手。

上边的横批是四个黑色大字：“党国所赐”。

这段时间，曾惇到上海向钱瑛同志汇报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六一惨案的详细情况。为了加强党在武大的领导，钱瑛将赵萌兰、王尔杰两名学生党员的组织关系移交给曾惇，并同意在武大发展党组织。6月21日曾惇回汉后，立即安排陈克东与王尔杰接上关系，当天在李循棠家中成立学运组，由陈克东、李循棠、王尔杰三人负责，研究进一步发动群众和各界人士声援武大，扩大政治影响以及追悼会、出殡的问题，并决定在校外刻印进步刊物《方向》。

6月22日上午，学校师生和校外来宾2000余人在体育馆举行了追悼大会，沉痛悼念遇难的三位学生。会场内外摆满了校内校外送来的花圈和挽联。

体育馆门口的挽联：

捕教授，杀学生，四项诺言到底无非是骗术；
求和平，争民主，一条血路齐心合力慰英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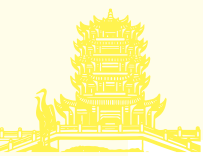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武大全体学生的挽联：

那边高谈人权，这边捕杀青年，好一部新宪法，吓诈欺骗；杀、杀、杀，自由哄人，民主哄鬼；
只准大打内战，不准呼吁和平，看三位亲兄弟，牺牲惨痛；惨、惨、惨，万方同哭，四海同悲。

清华大学自治会的挽联：

机枪扫射，军警包围，珞珈山竟成屠场，请看遍地鲜血，四项诺言今何在？

四海同悲，人神共愤，清华园遥祭英灵，谨献一瓣心香，亿万青年继后来。



珞珈山小贩的挽联：

你们大学生尚被捕杀；
我等老百姓何堪生存。

缪朗山教授的挽联：

黑夜正浓，闲话和平皆有罪；
黎明未启，蓦然觉醒竟捐生。

武大南京校友会的挽联：

囚教授，杀学生，枪杆横行，说什么爱护学府，奖掖文教；
哀法治，哭民主，文章无用，还是要坚强振作，奋力争生。

在灵堂最显眼的地方，还摆放着署名蒋中正的花圈——“屠杀无辜学生”的恶名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社会舆论上陷入了极大被动，敌人不得不故作姿态，以示“安抚”。而有心的同学在花圈上加了一个横幅，上书“猫



1947年6月23日，武汉大学师生为死难同学举行出殡大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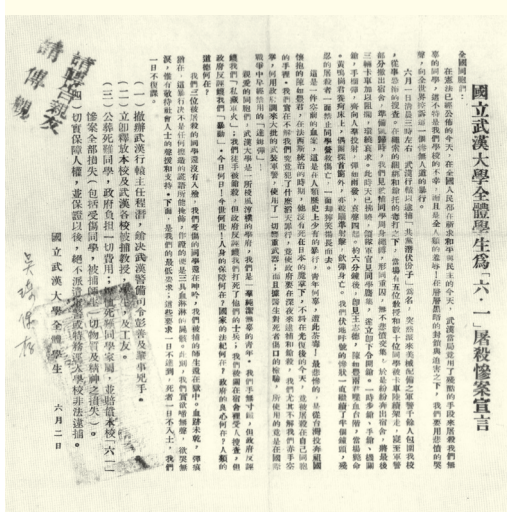
哭老鼠”四个大大的黑字，辛辣地讽刺了反动派的虚伪面目。

6月23日，学校师生为死难学生举行了出殡大游行。出殡队伍浩浩荡荡，在肃穆的气氛中，同学们戴黑纱、执花圈、举挽联，游行队伍行遍武汉三镇，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深切同情、慰问与声援。到了傍晚，依照全体同学的决定，惨案处理委员会将灵柩停在学校汽车站旁，修筑墓地，安葬两位同学（黄鸣岗同学灵柩被家人接回故乡）。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6月4日电令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秉公处理，对伤亡学生代为抚恤。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指派政务次长杭立武前往武汉大学，查明事件原因并进行处理。武汉行辕在武汉大学师生的强烈要求下，被迫审判了六一惨案的凶手，并对武汉警备司令彭善处以停职五年的处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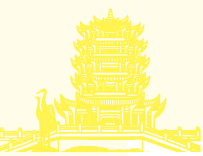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武大六一惨案，惊醒了对待蒋介石政权抱有幻想的人们，使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真实面目，促进了全国民众投身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行列。

为了纪念在六一惨案中遇难的三位同学，武汉大学将樱园老斋舍的三个拱门分别改名为如丰门、志德门和鸣岗门，并在



国立武汉大学全体学生为六一屠杀惨案宣言

体育馆南面死难同学初次下葬的地方专门修建了一座六一惨案纪念亭。在解放后的镇反运动中，制造六一惨案的主犯裕昆、郝钊、牛俊斌、杨汉颐、胡挥血等11人被判处死刑，于1951年4月22日在烈士墓前就地枪决，三位烈士终于得以瞑目。1983年4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将六一惨案遗址列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六一惨案纪念亭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一·七血案与武汉被服厂罢工斗争

◆ 孙 勃

1947年9月初，位于硚口的国民党军政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被服总厂（简称武汉被服厂）贴出了一张布告，要求全厂职工提前在10月底完成当年生产计划和追加任务，并许诺完成任务后每名职工能得到40万元法币的奖金。当时百物腾贵物价飞涨，工人们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40万元按当时市价，可以买到三石大米，多少可以改善生活。因此，被服厂的工人兄弟姐妹们每天加班加点地工作14小时甚至16小时，挨饿受累，拼死拼活，昼夜赶工，终于在10月底前完成了厂方要求的全部生产任务。

然而，正当大家欢欢喜喜，以为可以拿到这笔奖金的时候，一张新布告贴出来了，上面写着：“戡乱时期国库空虚……职工奖金（包括裁、缝两场的计件工资）碍难照发。为顾念职工生活困苦，先垫发每人十万元，其余部分俟十二月末和年终奖金一并发给……”

这一纸布告，不但40万奖金泡了汤，而且连正常的计件工资都不能足额发放，只是每人给10万元来打发。工人们看了厂方这个食言而肥的布告，肺都气炸了。众人愤怒地议论着：

“血汗白流了！”

“这简直是喝人血，吃人肉，骨髓里榨油！”

“现在‘老四’（湖北人民对新四军有感情，称他们‘老四’。当时群众通称人民解放军为‘老四’）过了黄河，刚到大别山，国库就‘空虚’。到12月末岂不是更‘空虚’？到时候这钱么样兑现？”

……

转眼到了11月，厂方又下达了冬季任务，要求赶制单军衣。11月6日，

裁剪场的工人带着气愤情绪到工务课领裁衣样板。工务课长杨松鹏是大流氓杨庆山的小兄弟，为人跋扈。他一见工人们都是气鼓鼓的，张嘴便骂：“你们不要调皮，老子要100条狗难找，要100个工人，只要在门口贴张招工条子，马上就会有1000个人来由老子挑！”

这番辱骂工人的恶言恶语一下子把大家心中的怒火给点燃了，很多人和他对骂，事情传出来之后一下子来了上千工人包围工务课。厂长徐福海闻声跑过来，开口就咒骂工人：“你们这帮穷鬼，有饭吃还不知足，吃饱了来闹事。再闹，老子把厂关了，饿死你们！”

大家一听，立刻怒吼：

“我们累死累活，哪个吃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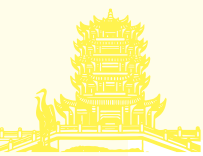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我们的奖金到底是多少万？这些钱哪里去了？”

徐福海听到这些质问，恼羞成怒：“要造反啦？关门！关门！你们给老子滚！”

工人们乘势高声呐喊：“关厂了！厂长撵我们咯！”“不做了！到马场宿舍去呀！”一下子，裁缝场、缝纫场的工人们纷纷自发罢工，在马场宿舍集合，浩浩荡荡地前往国民党华中军政首脑机关武汉行辕请愿。

对工人们揭露出的被服厂野蛮管理、粗暴打压、无端克扣工资奖金等种种罪行，行辕的接待人员不得不表示“同情”，并许诺“合理解决”。但实际上，武汉行辕的官老爷们对此事并没有马上采取什么措施，大概在他们眼里，这只是“一帮穷鬼”在胡闹腾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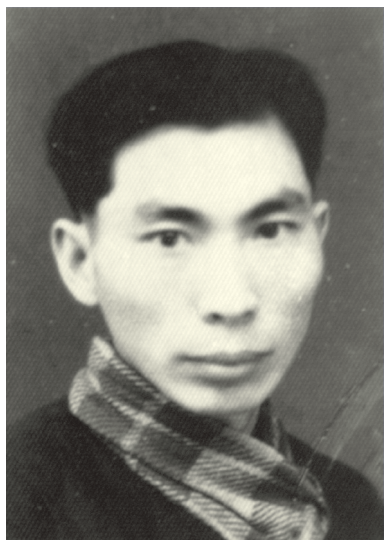
11月7日上午，工人们见行辕毫无动静，准备第二次请愿。大家准备出门时，突然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混在人群里。几个工友马上逼住他，在其身上搜出了匕首，证实此人是个工贼。就在这时，真实身份为军统特务的厂部秘书钱汉章、督查戴续林随一辆满载武装厂警的十轮大卡车赶来，他们一下车就气势汹汹地命令厂警在宿舍门口架好机枪，妄图吓退工人们。但大家根本不吃这一套，准备直接冲出宿舍区大门上街。特务下令射击，厂警朝天鸣枪，那个工贼趁着人群发生混乱的机会想逃跑。组长丁海泉和青年工人蔡绍倪见状，立马死死拖住工贼不放手。两个特务强行抢人没得手，



凶相毕露，同时向丁海泉、蔡绍倪开枪，将两人击倒。

看到丁、蔡两人中枪倒地，鲜血汨汨流出，工人高喊：“打死人了！”“快冲出去上行辕！”工人们像决堤的洪水般冲上中山大道，厂警则从卡车上跳下追打工人，大量工人因此负伤。还有一些兄弟们试图抢救丁、蔡。蔡绍倪中枪后当场身亡，丁海泉受重伤，大家连忙把他送到普爱医院，然而外国医生不肯尽心抢救一个中国穷工人，最终丁海泉伤重不治。

惨案发生后，被服厂金木场钳工、党的外围组织“民主工作队”队员张彦和金木场模型工、进步工人傅言法（后改名为李启新）立即号召金木场的工人们支援裁、缝两场的兄弟姐妹，一起罢工，获得大家的一致同意。11月8日，傅言法和张彦在满春路拐角的一个小茶馆里和武汉地下党员刘实、邓祥讨论如何组织和领导这场罢工斗争。刘实、邓祥说：“我们搞斗争，就是要有理、有利、有节。人被打死了，敌人输了理，我们一定要和他们斗到底。缝纫、裁剪两场的工人已经起来，这是非常有利的条件。要取得斗争的胜利，一定要放手把全厂工人发动起来，依靠工人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要成立一个一一·七血案治丧委员会，口号一定要提得响亮，要能起号召作用。可以发动每个工人捐一万元，八千工人就有八千万，有钱才好办事。



张彦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管钱。办丧事应符合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越土越好。”最后决定，由张彦争取当一个广大工人公认的代表，出面领导斗争。傅言法配合张彦工作，负责联络，随时向党组织汇报情况，并将上级的指示意见带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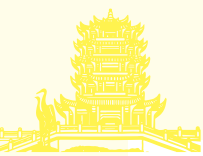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张彦回到厂里，马上召集金木场的工人开会，慷慨发言，争取到兄弟们的认可，大家推选他作为金木场代表，与其他工场的工人进行联系和照应。不过与此同时，厂方也没有闲着，他们组织起了一帮特务、流氓、工贼，打出了“工人代表会”的旗号，

妄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破坏罢工斗争。张彦邀请了其他工场的积极分子，找上门去和“工人代表会”进行较量，迫使他们同意组建一一·七血案治丧委员会。随后，张彦回到工人宿舍，向大家汇报了治丧委员会的情况。群众听了之后都不大满意，因为“工人代表会”的那些所谓“代表”，一听就知道是受厂方指挥的走狗，大家都不信任。张彦抓住群众的心理，召开大会，进一步进行宣传和动员工作。他指挥大家迅速布置好烈士停灵的追悼会现场，挖好坑埋上大柱子，把大幅帆布钉在柱子上做成幔帐，将棺木围在幔帐里，抬来桌子，点上火，并把烈士殉难时被鲜血染红的血衣挂起来，向众人展示敌人的罪恶。同时还按照地方习俗，请来念经的和尚和奏哀乐的吹鼓手。和尚念经时，南洋烟厂前来声援的女工正好到了，她们在哀乐声中送上挽联，向烈士三鞠躬。

党组织对罢工斗争作出了进一步的指示，要求把追悼会规模再扩大些，充实内容，会场要布置得庄严肃穆，以此体现出工人阶级在残酷剥削压迫下进行斗争的正义性，给人以一种工人阶级有力量的感觉，要使参加活动的人都受到教育。同时，要注意把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严密防范特务活动和某些“举着红旗反红旗”的人。事后证明，党组织的指示是非常及时和准确的。

为扩大声势，工人积极分子们起草了《告全市父老书》，准备作为传单在全市散发。傅言法怕原稿落到敌人手里，自己抄了一份，在白天把抄件交给裁缝场工人宗么，去治丧委员会取钱付印。谁知就是在这件事上，敌人还是想办法动了手脚。

天黑之后，青工彭再兴把传单样张拿了回来，但傅言法发现内容出了问题。原稿里只如实反映了被服厂工人被迫罢工的基本情况，呼吁社会人士主持公道给予支持，而印好的传单里却多了几句话：“……山东解放军已经反攻，我们赶快起来罢工、罢课，进行配合……”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在战场上已陷入被动，在后方疯狂地实施白色恐怖，大肆抓捕“涉嫌通匪”人员。印着这些话的传单一旦散发出去，敌人正好能给积极分子们扣上“与共匪里应外合”的罪名，“名正言顺”地来抓人镇压罢工。



傅言法马上问小彭：“白天我叫宗么拿去印，怎么是你把它拿回来的？”

小彭回答：“潘会计讲，宗么有急事，要我拿去印。听说明天就要用，我没顾上看，便赶紧去印字馆。现在印出不少，我看了也觉得不对头，才拿给你看。”

那个“潘会计”，就是厂方拼凑的所谓“工人代表会”里的潘某，现在在治丧委员会里管钱。这下明白了，是这个“潘会计”或是他背后的主使者偷偷地对传单原稿做了手脚，想设下圈套，陷害工人积极分子！

这个疏忽险些就毁掉了整场罢工斗争。当务之急是要马上销毁还留在印字馆里的印版和已印好的传单，以免留给敌人口实。刚满18岁的小彭主动承担起了这一重任，他半夜里摸黑赶到印字馆所在的五彩街，为了避开进行宵禁检查的军警，他声称家人得急病要请医生，敲开一家商店，从其前门进，后门出，绕过岗哨，成功找到了印字馆。谁知印字馆老板却嫌麻烦，不愿帮忙。小彭对他晓以利害：“要是这个内容的传单落到宪兵、警备司令部手里，我们自然是坐牢杀头，你是承印人，一样跑不了。”这样一说，老板才着了慌，赶紧把原版拆除，烧掉印好的传单，同时按照之前的原稿印了一夜。因为时间太紧，只印好了一千张。但无论如何，总算是让敌人的阴谋诡计落空了。

积极分子们按照党组织的指示，进一步扩大了追悼会现场的布置规模。大家在宿舍广场上搭起了两个大帐篷，一个是治丧委员会本部，一个供来宾休息用，这样使得会场至少能容纳一万人活动。在灵堂前面还竖起了牌楼，牌楼上缀着一块几丈长的白布做的横幅，上面写着党组织拟定的斗争口号：“你们死了，我们亲眼看见，我们永远记得”。牌楼两侧是一副醒目的挽联，上联“杀人抵命”，下联“严惩凶手”。两边是各厂矿、企业、学校等单位送来的挽联，如：

“坚决找凶手算账 齐心为死者报仇”

“我们罢工是为了吃饭 你们杀人是为了什么”

“再莫谈保障人权实纸上谈兵 说什么劳工神圣骗工人出力”

“为肚子不饱去请愿竟遭此荼毒 无人性两足兽敢执枪杀我工友”

.....

四五百副挽联，以及花圈、横匾和祭帐，从灵堂一直摆到两里之外的武圣路口。灵堂上方摆着烈士遗像、烈士倒卧在血泊中的照片、血衣，下面的供桌上点着大蜡烛和檀香，旁边还有十几个和尚在念经。灵堂前面是马路，马路上面用黄、蓝、白三色布搭起了和牌楼一样高的天棚。

11月12日，万人追悼大会正式举行。在地下党的组织和发动下，申新、裕华、一纱、震寰四大纱厂，粤汉铁路江岸机厂、平汉铁路车辆厂、南洋烟厂、汉昌肥皂厂、三十兵工厂、海军造船厂、鄂南水电厂、恒顺机厂、既济水电公司、福新面粉厂、汽车修配厂都派出工人代表团前来悼念。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中小企业（包括人力车、码头、马车、建筑等各行业）的工人兄弟以及电信局等单位的职工、文化团体工作人员、普通公务人员、大学中学进步学生……他们几百人或几十人一队，在哀乐声中，庄严地在灵前肃立致哀。张彦在大会上致悼词，他愤怒地诉说了军需系统工人被剥削压迫虐待的痛苦，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厂方对工人血腥镇压的罪行。他慷慨激昂的讲话获得了在场上万群众的共鸣。

追悼大会规模空前，礼仪隆重，在汉口、武昌都是前所未有的。两个被反动派蔑视为“穷鬼”的工人，死后获得如此哀荣，大长了工人阶级的志气。敌人对万人追悼会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又恨又怕，极不甘心，妄图迅速平息事态。第二天，武汉警备司令阮齐就跑到工厂来逼着工人复工。他让厂方把工人们都召集起来，然后叫嚣：“我是警备司令部的司令，我的职责是维护地方治安。政府的法令是不许罢工的，你们为什么要罢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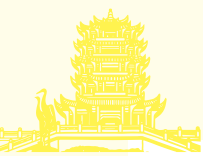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人群中立刻有人反驳他：“我们罢工是为了吃饭，你们为什么杀人？”

阮齐硬顶着说：“罢工违反治安，我有权过问。再说人死了，尽摆着，有什么光彩！”

“那照你这么说，当官的无故杀人，才算光彩？”

阮齐在工人的逼问下乱了阵脚，支吾了几句就溜到厂警卫连办公室，不敢再出来了。

这时张彦站在阮齐之前讲话的地方，大声说道：“弟兄们，看清楚了



吧！这叫官官相卫！政府的官，工厂的官，一个鼻孔出气，都是镇压我们、屠杀我们的刽子手！但我们不怕他们，只要大家团结，就有办法和他们斗争，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就能为死难的弟兄报仇，就会胜利！”

傅言法看准时机，在台下大喊：“你的话说到我们心坎里了！推选你当我们的总代表！”

几千名工人中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大家一致高呼：“赞成！”“同意！”就这样，张彦成为在全厂工人大会上正式推选出的总代表。

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玩起了新的花招。11月14日早上，人们发现马路上出现了一些标语：“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做工！”“不要上共匪的当！”落款为“被服总厂全厂工人”。这显然是厂方为了分裂工人队伍而制造的反动舆论。张彦马上又召集全厂工人开大会，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

在会上，他理直气壮地说：“就在昨天，全厂弟兄在这里开会，大家把我和老陈推选出来担任正副总代表（老陈是工贼们推选出的人选，想代替张彦当总代表，但未得逞），正式成立了一一·七血案治丧委员会。我们的宗旨是抗议厂方无理屠杀工人，口号是‘杀人抵命，严惩凶手’。现在出现了一个‘被服总厂全厂工人’的组织，口号是‘我们要做工，我们要吃饭’‘不要上共匪的当’。既然有两个组织，两种不同的宗旨，那好，我们不妨摊开来谈一谈。谁更有道理，我们就服从谁。大家看好不好？”话音刚落，全场一片喊好声。

张彦接着说：

“既然大家认为好，那就请‘被服总厂全厂工人’组织的代表到这个台上来，申述你们的宗旨。”

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人敢上台。大家再三催促，还是没有人敢站出来。

张彦见势，继续说：

“现在我提议，以这个讲台为界，凡是‘一一·七’血案治丧委员会的人请站到左边；凡是‘被服总厂全厂工人’的人，请站到右边！”

人们纷纷往左边站，就连那些工贼和特务，看到众怒不可犯，也只能削尖脑袋往左边钻。台子左边站满了人，右边空空如也。

张彦说：“现在明白了！那个‘被服总厂全厂工人’的组织是个假把戏！我们根本不承认它，这是坏人在造谣，诬陷我们！大家说怎么办？”

台下工人们高喊：

“把那些标语撕掉！”

“盖掉它！”

“有人再敢干就给他抓起来！”

张彦故意问那个老陈：“副总代表，你看怎么样？”他只好狼狈地回答：“就这样办吧。”

散会后，各工场的代表率领工人带着铲子、糨糊和标语传单，销毁和覆盖了那些反动标语。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4日下午，一个颇具规模的乐队奏着哀乐来到灵堂。乐队后面有人抬着彩亭，里面放着一块红绫匾，匾上是金色的四个正楷大字“正气长存”，上款是“丁海泉、蔡绍倪二烈士千古”，下款是“国民政府敬挽”。在彩亭后面，是两个很有来头的人：一个是鬓发斑白、身穿长袍马褂的瘦老头儿，他是湖北省有名的士绅孔庚；一个是军人，年约五十，提着一个黑皮包，呢子军服上缀着中将军衔，他是南京国民政府派来的赵高参。两人进入灵堂，赵高参脱帽，向烈士遗像三鞠躬，孔庚还三拜九叩地行大礼。看来反动派还是慌了，自知理亏，不得不在表面上做出一些姿态来“安抚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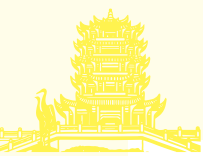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下午两点，这两个“大人物”和厂方通知工人代表到灵堂隔壁的工人子弟学校谈判。傅言法立即找到党组织，研究条件，最后根据群众的要求，拟了8条：

1. 逮捕凶手，执行枪决；

2. 撤销徐福海厂长职务，交付法办；

3. 死者都是黄陂人，必须按当地风俗摇独龙送殡，到江岸车站上车，送回原籍安葬；

4. 死者抚恤费各1亿法币；受伤者按伤势轻重，分别发给养伤费3000万、4000万、5000万元；



5. 罢工期间工人工资照发；
6. 立即按十月物价补发被克扣的 30 万元奖金；
7. 复工后，工资按市场物价随时调整增加；
8. 保证人身安全，不得任意打骂、开除工人。

谈判进行了一下午，敌人对第 3 到第 8 条意见不大，但始终拒绝接受第 1 条和第 2 条——毕竟是他们的狗腿子，轻易枪毙和撤职，以后恐怕没人再愿意继续给反动政府卖命。然而广大工人也不肯放弃这两条，大家纷纷议论：

“不枪毙凶手，我们还能在厂里做工？”

“杀人不抵命，那还了得？”

“不管怎样，都要杀杀他们的威风！”

“至少也要法办！”

“那个徐福海不叫他滚蛋，还留着欺压我们呐？！”

傅言法向党组织汇报了谈判的情况。党组织指出，群众一条也不肯放松，这是坚持原则。不过，经济上解决了问题，政治上也得取得胜利。如果坚持立马枪毙凶手，将厂长撤职，而敌人顽固，形成僵局，最后他们采取其他方法反扑，就会形成不利局面。不是有人提出即便不马上枪毙，也要杀杀他们的威风吗？这个意见可以考虑。把“执行枪决”改成“交付法办”行不行？至于厂长，反正要叫他滚蛋，把“撤职”改为“免职”行不行？我们在策略上迂回一下，敌人才肯妥协。斗争开始时，我们讲有理有利，现在要讲有节了。积极分子要和工人们再好好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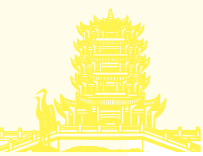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11 月 16 日，工人代表们根据党组织和群众的意见，继续和敌人谈判，敌人果然让步，表示同意。可是到了签字的时候，赵高参再次变卦，非要坚持棺材由玉带门车站上火车，而且时间要提前，最好当天就进行。为什么敌人在处置凶手和厂长的问题上都不再纠缠，却偏偏在出殡路线上斤斤计较呢？他们肯定预料到，依照现有的条件搞大出殡，工人们抬着棺材从马场宿舍到江岸车站，一路上要经过武圣路、六渡桥、江汉路、大智门……基本上要把汉口最热闹的中山大道走下来，行程十多公里，必定轰动整个

武汉。这对于敌人而言，在舆论上是非常难堪的，于是他们就又在这个上面扯皮。但代表们的目的就是扩大声势，所以对出殡方案决不让步。双方没有谈拢，又是不欢而散。

工人们这边不慌不忙，16日一整天依然大搞悼念活动，和尚照旧念经，乐队吹吹打打，全厂几千工人继续停工，大家轮流去灵堂悼念，赵高参却坐不住了，17日一大早派人来传达意见，同意把棺材送到江岸车站上车，但要求第二天就动身。工人代表们于是在协议上签字。这天上午，以国民党联勤总部名义签发的免除徐福海厂长职务的布告就在硚口一带张贴出来。接着，几名宪兵把凶手钱汉章、戴续林五花大绑，从厂部押到灵堂向烈士谢罪。大家马上一拥而上，冲到他们面前举起拳头怒吼：“严惩凶手！”“杀人抵命！”“枪毙屠杀工人的刽子手！”两个凶手被押着在灵堂走了一圈，他们垂着脑袋，神情沮丧，再也拿不出以前对付工人时的那股凶恶蛮横劲头，确实是威风扫地了，连看热闹的市民群众都拍手称快。

接下来要准备大出殡。党组织指出，大出殡实际上就是抬棺游行，目的是教育我们自己和广大人民，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一定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对于游行的组织细节，党组织也出了很多主意。如为了揭露敌人的罪行，使群众铭记反动派的暴虐，应突出展示烈士血衣、现场照片和横幅标语。连如何使游行队伍从头到尾保持情绪饱满，行进时该喊什么口号，都细致地进行了交代。党组织的指示，由傅言法带回向积极分子进行传达。

事已至此，敌人还在搞一些可笑的小动作。那块用几丈长的白布做的，上面写着“你们死了，我们亲眼看见，我们永远记得”的横幅，在大出殡前，莫名其妙地不见了。18日一大早，工人们到处去买布，谁知街上各种商店都营业，唯独布店不开张，甚至到远处去买的人都是空手而归。敌人越不想让群众看到，我们就越要让其昭然于世间。傅言法和工人们找到那个“陈副总代表”，逼着他把丁海泉的遗言“我是怎么死的，你们要对得起我”和“你们死了，我们亲眼看见，我们永远记得”作为大家对烈士的答复写在大张白报纸上，然后在竹架子上贴着，异常醒目。这件事完后，众人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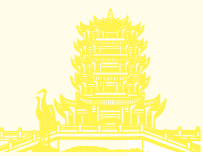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紧时间装饰棺木，谁料没过一会儿，汽车队的工人来通风报信：“他们准备了两辆卡车来运棺材。”这个事一想就是有问题的，敌人无非是想赶快把棺材运到火车站装车了事。张彦说：“棺材一搬上车，开跑了怎么办？”大家纷纷出主意，要阻止敌人强行运走棺材。过了一阵子，果然开来了两辆大卡车。车上跳下来几个人说：“赵高参讲，棺材装在汽车上，再扎上彩，比摇独龙有排场！”众人对敌人的鬼话皆嗤之以鼻。卡车司机见完不成上面的任务，就准备打道回府。张彦脑瓜一转，说：“你们在这儿等等”，把两台卡车扣下来——敌人送上门来的汽车，游行的时候正好可以利用。

来帮忙的码头工人加快了进度，把棺木装饰成了两个庞然大物，分别扎起了三十二人抬的木杠，并套上了鲜艳的绣花棺罩，顶上安着一条栩栩如生的大木龙。丁海泉的遗言“我是怎么死的，你们要对得起我”和“你们死了，我们亲眼看见，我们永远记得”的标语，像牌坊一样，分别嵌在木龙头上，被衬托得格外显眼。当去硚口游行的队伍返回马场宿舍后，抬棺出殡，万人上路送行正式开始。工人组成的纠察队员骑着自行车，在最前面开路；载着烈士遗像、灵位、血衣、遗照的彩亭紧随其后，四班乐队在彩亭前后鼓吹奏乐，接着是两副龙棺，棺材后面是赵高参派的那两辆“运棺材”的卡车，现在用来运载家属和体弱的女工姊妹。持挽联、花圈、旗帜的游行队伍穿插其中，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向中山大道。当天的中山大道则是万人空巷，热闹非凡。道旁两侧拥挤的人群排成了两堵水泄不通的人墙，斗志昂扬的游行队伍从中经过，怒吼“严惩杀人凶手！”“杀人抵命，反对迫害工人！”“我们要人身安全”，激动人心。大游行气氛热烈，揭露了敌人的罪恶，狠狠地杀灭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长了工人阶级的威风 and 志气。“工人弟兄们团结起来！”“团结就是胜利！”“我们要活命，反对饥饿！”“我们要活下去！活下去！”的口号响彻云霄。

一一·七血案罢工斗争胜利后，张彦、傅言法因立场坚定，工作积极得力，经受住了考验，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武汉被服厂建立起了党的支部，工人们终于有了主心骨。1948年2月，因为涨薪不公平，被服厂

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再次掀起大罢工，敌人则以大逮捕回应，将四百余名工友抓走。后在全市工人的大力支援和学生运动的配合下，敌人被迫陆续将被捕工友释放。张彦和傅言法早已成为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大逮捕后，武汉各大报纸头版上都刊登了悬赏通缉他们二人的消息。但他们在工人群众的掩护下，逃脱了敌人的魔爪，奔赴解放区。被服厂的党支部吸收了新的力量，继续坚持斗争。



汉阳武工队解体之谜

◆ 宋 健

地处蔡甸区的七萧大湾，即使在今天，也是武汉的一处僻静之地。1948年2月，武汉地下党领导的一支精干武装力量——汉阳武工队就在这里成立。为了在敌人眼皮下成立这支小型武装，武汉地下党组织颇费了一番周折。

1947年10月，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与武汉市工作委员会成立，按照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为配合刘邓大军进行渡江作战，必须积极开展大江两岸的工作。

此时，省、市工委正遵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一党的城市工作方针，重点以武汉为中心开展城市工作和隐蔽斗争。手中并无一枪一弹、一兵一卒，而开辟大江两岸工作需要武装力量和交通线作保障，这“无米之炊”又该如何做成呢？

湖北省工委委员、武汉市工委书记刘实经过仔细斟酌，决定派地下党员王忠彦到汉阳去联络中原突围时与部队失散后隐蔽在汉阳的党员干部。王忠彦到汉阳后联系了萧健林、萧秀东等人，随即带他们到武汉与负责大江两岸工作的省工委委员陈克东见面，陈克东指示：成立汉阳武工队，一定要联络汉阳区委原书记、老党员萧利三，争取他的支持。

1948年1月，省工委决定由岳健中具体负责，着手建立汉阳武工队，并派向平参加这项工作。岳健中等人到七萧大湾找萧利三，却因为萧利三心有疑虑，此行未能取得结果。不久，王忠彦经萧秀东介绍，与彭诚取得了联系，彭诚又介绍了冷丹稚与王忠彦接上关系。

在农历新年到来之际，王忠彦、冷丹稚、彭诚以拜年的名义，对中原突围后与部队失散隐蔽在汉阳七萧大湾的人员和收藏枪支情况进行详细了解，

并最终与萧利三见面。经过一番说明解释，萧利三同意在省、市工委领导下参与汉阳武工队的筹建工作。王忠彦立即赶回武汉，向省工委负责人汇报。

春节过后，岳健中、向平与王忠彦、彭诚来到汉阳，与萧文安、范定一、杨毅等在七萧大湾附近的庆元寺开会，共同组建汉阳武工队。经过商讨，决定由范定一担任队长、杨毅为指导员、萧文安为副队长，由岳健中负责全面工作。武工队的任务包括：组织队员学习党的文件，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宣传组织群众，扩大政治影响；搜集枪支弹药，增强实力；必要时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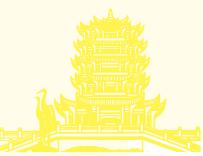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岳健中（张立武）

送人员和物资到解放区，为配合大军渡江作好准备。至此，汉阳武工队正式建立，共有20余人，8支短枪，主要活动于汉阳的金牛、嵩阳、玉贤等地区。1948年3月中旬，经省工委批准，汉阳武工队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川汉沔第二游击支队的名义，准备向汉阳南乡和汉川马口一带发展，扩大活动范围，并打算收缴国民党乡公所和地方武装的枪支，以壮大自身力量。

这支活跃在武汉与江汉解放区联系的交通线上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队伍，很快引起了国民党武汉行辕的注意。1948年3月底，武汉国民党当局密令汉阳县长杨干率领乡自卫队和民团袭击七萧大湾，企图将汉阳武工队一网打尽。

幸运的是敌人刚刚开始行动，汉阳武工队就得知了这一阴谋。当天下午，地下党员侯杰急匆匆赶到高庙国民小学，找到在这里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的岳健中，告诉他：“七萧大湾被国民党乡公所自卫队包围了，情况十分紧急！”岳健中立即向隐蔽在高庙国民小学的地下党员吴垠作了布置，要他作好应变准备，密切注意周边动静。



随后，岳健中秘密赶回七萧大湾，与范定一、杨毅、萧文安紧急研究应对方案。鉴于敌人占有绝对优势并且有备而来，他们决定迅速带领武工队转移，当天晚上来到玉贤刘老嘴。第二天，在讨论下一步去向时，有的同志主张去沔阳，有的同志主张去汉阳南乡，最终决定去沔阳与襄南军分区联系，将队伍暂时转移到解放区。会后，汉阳武工队连夜向沔阳方向转移。走到中途，前方突然有人在黑暗中喝问：“什么人？”随即响起拉枪栓的声音。武工队员有人回答“过路的……”，对方听了没有采取行动，但这一意外遭遇却彻底打乱了武工队秘密转移的计划，他们被迫分散返回高庙国民小学。

虽然敌人这次袭击没有给汉阳武工队造成实际损失，但岳健中等经过研究后决定，武工队暂时停止活动，由岳健中等负责人先到汉口向省工委领导曾惇、陈克东汇报。岳健中在向省工委汇报时表示，怀疑武工队内部有问题。曾惇考虑到特务很可能会跟踪而来，这将影响到武汉地下党组织和领导同志的安全，于是立即通知有关同志隐蔽。陈克东按照约定时间到中山公园与武工队长范定一接头时，突然发现范定一身后有形迹可疑的人跟踪。省工委当即决定切断与有关人员的联系，汉阳武工队所有人员马上向外地转移。

4月11日，吴垠、向平、黄季昌、彭国清这4名武工队员按照党组织安排，来到汉口乘坐汽车经岱家山准备向解放区转移，却被事先守候在此的国民党武汉行辕第二处的特务和宪兵、警察逮捕。随后，武工队队长范定一、队员萧汉杰等另外四名队员也在转移途中被捕。

敌人这次行动如此迅速、准确而又诡秘，显然不像是意外遭遇，而是蓄谋已久的阴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当时似乎是一个谜。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汉阳武工队被迫解体，幸存人员由党组织安排分头撤往鄂中解放区。岳健中改名张立武，党组织关系转到中共长沙特支，在长沙继续从事统战策反和军事斗争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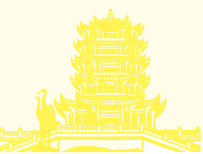
直到解放后，汉阳武工队解体这个谜底才得以揭晓：原来武汉行辕第二处的军统特务派了一个内奸混入了汉阳武工队。此人在中原突围时从部队复员到武汉，经叛徒特务吴志杰介绍，武汉行辕二处处长、军统少将黄

藩初将他作为奸细，派他去寻找中共真正的地下组织。此人接受任务后，利用关系打入汉阳武工队内部充当内奸，向敌人密报武工队活动情况，并将武工队队员们向解放区转移的出发时间、路线和人员名单向国民党特务告密，导致汉阳武工队共有8人被捕。这名内奸还出卖了鄂豫边区安排在汉口隐蔽的同志，以及江岸铁路党支部的一些成员。为了掩盖罪行，这名内奸还和叛徒特务吴志杰相约发誓：“就是革命胜利了也决不暴露。”国民党湖北省会武昌刑警大队还特地给特种刑事法庭写下秘密报告，要求“保持内线安全”以便“搜捕余党，扩大侦察”。

吴垠等人被捕后，在武汉行辕第二处的秘密看守所里被关押了三个半月，随后又被转到武昌省会警察局刑事大队和武汉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审讯。他们怀着“虽然革命快要胜利了，但是我们不一定要看到胜利”的牺牲决心，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敌人从他们身上一无所获，于是将他们判刑，关押到武昌监狱。

党组织十分关心这些被捕的同志。鄂豫三地委城市工作部特地派出秘书古正华设法进行联络营救工作。古正华辗转找到了吴垠爱人林波的妹妹，那时他不敢直接去吴垠家，就约了吴垠爱人林波在中山公园见面。古正华划了个小船，林波在亭子里等待，双方打个招呼，林波就到船上来和古正华见面。古正华代表党组织托林波给吴垠等被捕人员送了一些银元进去，藏在饭盒底下，每次只带几块进去，免得太重被发现。后来，古正华等人又打算协助被捕同志越狱。他找人设法买通看守，让看守故意把钥匙丢下，由古正华等人配好了钥匙再还回去。为了确保越狱同志安全，古正华等人准备用里应外合方式，除掉岗哨，并事先租好两辆马车，还有一条小划子在江边等着，等越狱同志一出来就乘马车到江边上小划子，安全撤离。

然而，这个越狱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南京国民党政府即派出代表与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武汉国民党当局也摆出“和谈”的姿态，地下党组织则乘机向监狱方面做工作，最终迫使敌人同意释放了武昌监狱中关押的75名“政治犯”。为防止敌人暗害，鄂豫三地委城工部沿途由黄陂县派出武工队在13个地点暗中护送、保护他们，使他们安全回到解放区。



血染战旗旗更红

——华中分局三工委、湘鄂特委、武汉中心小组英烈谱

◆ 刘士明

解放战争时期，各级中共组织通过各自的渠道，向大武汉派遣党员、城工人员、情侦小组和党领导下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逐渐形成具有鲜明武汉特征的“三大三小”中共地下组织系统格局。“三小”就是指潜伏在武汉三镇的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东局）第三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上海局武汉中心小组、中共中央上海局湘鄂特别委员会三个地下党组织，它们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遭敌特毁灭性破坏先后解体，一批党员和地下工作者牺牲。

只身闯敌营



华中分局第三工作委员会主任、
上海局湘鄂特委委员徐楚光

1942年3月，一位脸型消瘦、目光刚毅的三十多岁中年男子悄悄离开革命圣地延安，孤身一人南下。他就是抗日军政大学参谋教官徐楚光。

徐楚光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步科班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党组织指示，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直到1940年3月调往延安。此时，抗日根据地处于最艰苦的时期。为了打破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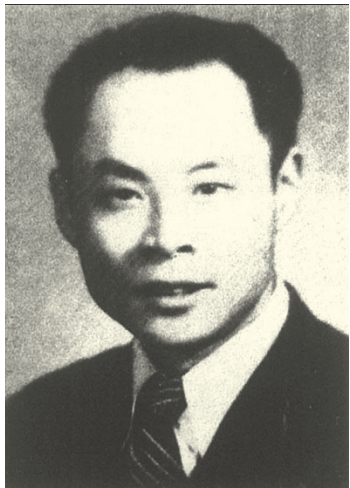
伪军的封锁，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科派遣他到沦陷区从事情报搜集、反间谍、策反伪军起义等工作。徐楚光来到南京，利用黄埔军校毕业生身份，打入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即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工总部），任上校秘书等职。

1943年10月，因联络不便，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滕代远将徐的组织关系就近转给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为了协调和沟通华中局与军部的联络，建立了新四军江南工作委员会第三分会，简称新四军三分会，徐楚光任主任（书记），由华中局副书记饶漱石和情报部部长潘汉年直接领导。新四军三分会向八路军、新四军输送了大量情报和战略物资，上级也调派马蕴平、张冰等地下党员前来协助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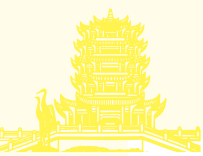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绝密鹰计划

张冰，原名王雨声，江苏南通姜灶人，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联抗东南办事处政治部主任、联抗司令部教导队指导员等职。此时，徐楚光正在做空军的策反工作，成功发展汪伪上尉飞行教官吉翔为我地下工作人员，代号“吉祥鸟，”同时安排代号“啄木鸟”的中共地下党员厉仁杰担任伪航空训练处中将主任祝晴川的随从副官。张冰转来后，徐楚光将他派往常州，秘密领导航训处的地下工作。

厉仁杰了解到：机场守卫部队为一个警卫营和一个机务连，除了日方转让的20余架飞机外，还有3架专供汪伪政府要员使用的客运机，其中建国号飞机是汪精卫的座机。这3架飞机平时停放在日本人控制的南京明故宫机场。徐楚光听了张冰的工作情况汇报后，认为厉仁杰等人已在伪航训处站住了脚跟，酝酿几个月的策反争取伪空军人员起义的工作可以全面展开。决定筹建以张冰为团政委、厉仁杰为团长、吉翔为副团长的地下航空团，全团纳入之前组建的地下军“京沪



张冰



人民挺进总队”建制系列。地下航空团的任务是：策反汪伪空军飞行人员，促成他们在时机成熟时驾机起义；争取掌握警卫营兵权，控制机场、油库等要害部位，待时机成熟时实施地面起义。整个行动命名为“鹰计划”。

经过策反，航训处少将副主任白景丰，中校飞行主任周致和，空军上校参赞何健生，空军教导总队少尉飞行员赵乃强、管序东，地勤人员黄哲夫，八大队轰炸员秦传家等人加入了地下航空团。厉仁杰也担任了警卫营改编的警卫大队代理大队长。地下航空团将目标锁定在当时最先进的建国号飞机上。几经辗转，也与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取得联系。粟裕将驾机起义飞往延安事电告中共中央。

1945年8月20日清晨，克服重重阻力的周致和在张冰和“啄木鸟”的目送下，驾驶建国号飞机，载着赵乃强、管序东、黄哲夫从扬州机场起飞。经过6个小时艰难航程，顺利降落在延安机场。

毛泽东主席闻讯，当即欣然动笔向粟裕发电报祝贺。这架飞机被八路军总部命名为820号。

建国号起义后，张冰按照徐楚光既定的指示，敦促“吉祥鸟”加紧策动地面人员起义。在新四军的接应下，少将白景丰、上校何健生、机械士陈静山、轰炸员秦传家及部分家属近二十人先后分别从扬州、南京分三批秘密起义，投奔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鹰计划”圆满完成。

不久，徐楚光成功策反汪伪装备最好的警卫三师，三千多官兵携带火炮34门、重机枪30挺、轻机枪107挺、步枪1100余支、掷弹筒117个、弹药数十万发、电台2部及其他军用物资，在淮南解放区钟家集宣布起义，并向中共中央发电致敬。起义部队被编为新四军华中独立第一军，徐楚光任军副政委、军参谋长兼二师政委。

转战湘鄂赣

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确定人民军队在全国的战略总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同日，决定中共中央华中局北移至山东，与山东分局共同组成中共中央华东局。1945年10月24日，由邓子恢任书记、

谭震林任副书记的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在江苏淮阴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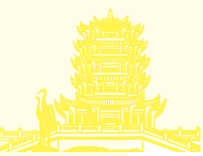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1946年2月，谭震林指示徐楚光离开华中独立第一军，到南京、上海、徐州、杭州等地建立情报网，为即将进行的国共内战作准备。3月，在新四军三分会基础上组建了华中分局联络部第三工作委员会，简称华中分局三工委，徐楚光任主任（书记），张冰任负责机关工作的秘书。

1946年3月，徐楚光根据谭震林副书记“深入国民党统治区”的指示，预见性地派遣成铁侠先期回湘，为今后可能进行的湖南开辟工作作准备。10月，华中分局联络部派三工委成员张弩、叶少卿去湖南向成铁侠传达“开展敌后地下军事策反工作”的指示。徐楚光在扬州接应并同张、叶一起先到武汉再到长沙。成铁侠返湘和徐楚光来湘鄂熟悉环境和传达指示，标志着华中分局三工委湘鄂赣三省开辟工作的正式启动。



湘鄂民主联军司令员成铁侠

随着新四军主力部队根据中央指示逐次转移到东北和山东，华中解放区已处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前线。为减轻我军正面战场压力，华中分局指示徐楚光赴湘鄂赣地区开展敌后军事斗争，迫敌回援，以策应华中战场。1947年1月，谭震林副书记约见徐楚光，传达中央精神和分局的决定，指示他“从敌营跳到敌后”，留下部分人员继续以上海为中心搜集京沪徐杭军事情报外，要另外组织和抽调精干力量赴湘鄂赣地区，组织开展敌后武装斗争。行前，组织上委任徐楚光为华中分局联络部京沪情报处处长。不久，华中分局联络部并入华东局社会部，三工委又随新任社会部副部长杨帆转入该部，社会部任命徐楚光为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特派员。社会部交给徐楚光的任务是：对中原和中南地区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筹建湘鄂赣地下民主联军，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牵制敌军回援，减轻我军正面战场压力。



1947年3月，徐楚光化名王祖文，携妻女离开山东临沂乡下华东局社会部驻地，从诸城一个海口偷渡到国统区青岛，再转道抵达上海做转移准备工作。先期行动的张冰在汉口交通路大同旅社建立了三工委驻汉办事处，成铁侠也完成了长沙的接应工作。张冰返回上海，报告徐楚光已准备就绪。

1947年4月，徐楚光以木排商人身份为掩护，率领张冰、罗纳、吕祥瑞、朱健平等30多人分头潜入武汉、长沙等地。在长沙榔梨市观音村成铁侠、刘琪夫妇家中召开的会议上，徐楚光将湘鄂赣三省划为湘鄂两个大区，湖南大区兼管江西省。徐楚光驻长沙，主持全面工作，具体负责湖南、江西两省。张冰驻武汉，负责湖北省、武汉市、湖北嘉鱼地区和湖南临湘地区。徐楚光夫人朱健平负责秘密联络点的日常工作。

三工委湘鄂赣三省联络点和湖南党小组设在长沙市天心阁槐树巷五号，该联络点实际上是三工委机关所在地和三省指挥部。成铁侠在这里加入中



位于长沙天心阁槐树巷5号的三工委指挥部

国共产党。

在长沙、武汉安顿下来后，因为与山东联络不便，徐楚光暂时与华东局失去了联系。他通过在中国民主社会党上海市党部担任主任委员的中共地下党员金龙章，与上海局书记刘晓以及上海局外县工委书记张执一接上关系。三工委从此与上海局取得联系，并为以后组建上海局湘鄂特别委员会奠定了基础。交通员历尽艰辛返回湖南后，徐楚光又恢复了与华东局社会部的联系。

组建地下军

三工委先后在长沙鱼塘街四号设立了秘密联络点、在湖南郴州开设了映椿客栈，还发展了李德仁和邹今托等人作为工作人员，利用他们的关系

在湖南衡阳万国商场、《力报》报社设立了秘密联络点。

武汉的工作进展也很顺利：在汉口花园街开设了印刷厂，在汉口三民路四十二号开设了商号，在武昌熊廷弼路开设了贸易公司，在武昌抱冰堂药店开设了联络站。这些商业机构的任务，一是作为秘密联络点，二是筹措活动经费，三是发展组织。同时，他们还在四川巴县民船工会等处设立了秘密联络点，在上海北戴河弄一号设立三工委秘密备用联络站。

很快，一个覆盖湘、鄂、沪和川东南的地下工作网就建立起来，还扩充工作关系数十人。罗纳负责的江西省的工作则无实质性进展。

1947年4至7月间，三工委在湘鄂豫进行的军运和策反工作也取得实质性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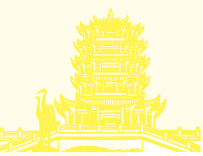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在湖南，1946年3月即先期到达的成铁侠利用曾任长沙警备旅少将副旅长的身份联络旧部，策反了湖南保安大队、湖南保安第六团、湖南保安第四旅第六团、盐警中队、衡阳盐务局税警队等地方军警约四个半团的武装。

在湖北，徐楚光亲赴武汉，策反了族叔、湖北省水上警察局局长徐文煌，打入汪伪南京军委会陆军部时期的同事、汉口警备区少将副司令叶晃，武汉行辕特务大队大队长万耀华和原江汉师管区少将司令汪以南等人，暗中掌握了一批地方军警武装。

1947年4月，当湖南地方军警武装率先成军后，徐楚光派人赶往山东，向华东局社会部和华东军区汇报，请示建立联军。社会部和华东军区同意三工委将策反部队编组成军，并授予湘鄂民主联军的番号。随后，徐楚光在长沙市天心阁槐树巷五号召开会议，宣布成立湘鄂民主联军，成铁侠任司令员，徐楚光任政委，张弩、汪以南任副司令员、叶晃任参谋长。

掩护子弟兵

1946年6月中原部队突围前，地方党组织即提前部署，安排专人负责掩护撤退人员和战斗中的失散人员。中共襄北专员公署专员、天京潜中心县委书记谢威，以及中共汉沔中心县委书记李蔺田等人留下来处理善后事宜。化名张伯华的谢威在武汉隐蔽待机期间被人认出，有被捕的危险，从



上海局湘鄂特委书记谢威

而打算转移到解放区。正在此时，王家吉和李炳南夫妇来武汉通知谢威，告之已与上海局张执一接上关系，并传达了张执一要他隐蔽武汉听候指示，暂时不要去解放区的意见。不久，江汉区党委的上级、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派张翼来汉，向谢威传达陈少敏部长的指示：不去解放区，继续在武汉隐蔽，接受上海局的领导，负责分散在湖北各地的中原突围失散人员的安置转移工作。谢威、李蔺田、孙光炳等人开始建立秘密联络站，收容转移失散人员。

与此同时，张执一还派原湖北襄河专署专管财经的副专员顾剑萍到武汉创建上海局武汉中心小组，开辟由上海到大别山的地下交通线。顾剑萍在武汉德明饭店设置了联络站，安置转移中原突围失散人员。中心小组由顾剑萍任书记，潘兢欧为组织干事，李琢章为经济干事、骆楚材为交通联络干事。谢威系统与顾剑萍小组开始分两条线在武汉承担安置转移工作。中心小组大约接送中原突围后的归队人员、青年学生、国统区地下同志以及民主人士约二百人到解放区。

除谢威系统与顾剑萍小组外，演剧六队在武汉掩护中原突围失散人员的往事至今仍鲜为人知。

演剧六队是一支明里穿着国民党军装、暗中由中共领导的专业文艺团队。其前身是夏衍倡导发起、1937年8月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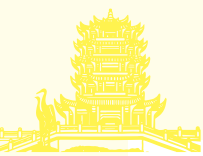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1947年的顾剑萍

生在上海的救亡演剧第八队，队长刘斐章。1938年2月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时，救亡八队先后改编为抗敌演剧第八队、抗敌演剧第六队和演剧六队，并一直在周恩来关怀下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演出活动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10月，演剧六队从重庆乘船来到武汉，入住汉口中山大道民众乐园旁原日本宪兵队所在地大华饭店。由于坚决抵制配属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张灵甫部，演剧六队被程潜收编改属武汉行辕，命名为武汉行辕新闻局巡回工作第二队，与演剧六队原名并列使用。在武汉其间，掩护数批从中原解放区分散突围的人员和文艺兵隐藏在此。当时，武汉正在上映一部描述在二战中反纳粹人士挣脱法西斯的魔掌、获得自由的美国电影《卡萨布兰卡》。脱离险境后的新四军人员称大华饭店演剧六队队部为中国的卡萨布兰卡。

演剧六队在武汉一年多，演出了田汉编剧的多幕剧《丽人行》等剧目76场，轰动一时。该队在报刊发布的广告上公开宣称：“歌唱的是人民的痛苦和要求，首首都有切身的现实意义。”中共武汉市工委也派职青支部负责工运宣传工作的韩伯村专门与队部联系。六队队员经常去武汉地下党员赵寻的亲戚刘海帆家秘密收听邯郸中共电台广播。1947年12月，演剧六队从武汉迁到长沙。1948年4月和6月，分别发生了湖北省市工委遭破坏的“汉阳武工队事件”和“武昌红十字补习学校事件，”韩伯村转移到长沙，党组织关系转中共湖北省工委长沙特支。韩伯村投靠演剧六队，寄居在联华剧院。汉阳武工队负责人岳健中改名张立武，也转移到长沙特支。韩伯村和张立武开始在队内发展党员。不久，在长沙特支领导下，演剧六队成立了湖南文艺界第一个党支部。

联合建特委

1947年7月初，张执一召集谢威、李蒨田、李云程和新四军五师的同志到上海开会。谢威等人假冒病人，住进了上海局秘密联络站之上海私立伟光医院。与此同时，张执一派联络员去武汉与张冰取得联系，让他转告徐楚光立即去上海开会。刚从河南检查吕祥瑞、罗纳工作返回武汉的徐楚



光立即赶赴上海，通过田修华与张执一取得联系后也住进私立伟光医院。开设伟光医院的李伟光原名李应章，台湾台中人，1925年10月领导了轰动全台湾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农民暴动——二林蔗农事件，遭日本当局通缉后从台湾来到厦门，再到上海，1932年加入中共，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

此次会议是张执一受上海局委托召开的，主要研究成立一个联合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在武汉、上海、南京等沿长江大中城市建立秘密联络站，将暴露身份的党员和中原突围人员转移到相邻几个解放区去等事项。张执一和刘家珍代表上海局，谢威、李蔺田和李云程代表上海局在武汉的收容掩护机构，徐楚光代表华东局，新四军五师人员代表军方参会。

会议正在进行之中，张执一接到上海局转来的中共中央电报称：刘邓大军已经开始跃进大别山，上海局应当组织力量配合刘邓大军南下。由于形势突然变化，会议主题也随之改变为新建一个管辖华中诸省的党的组织，策应南下大军等问题。经讨论，决定由湖北谢威系统和华东局三工委徐楚光系统联合成立一个直属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湘鄂特别委员会，必要时扩充为湘鄂赣区党委或湘鄂赣特别委员会，并指定谢威、徐楚光、李蔺田三人组成特委班子。后经上海局批准，党组织名称定为湘鄂特别委员会，简称湘鄂特委。

上海局批示下达后，在上海召开了由张执一主持指导的第一次特委会议。由于徐楚光、谢威相互谦让，张执一代表上海局任命谢威为湘鄂特委书记，徐楚光和李蔺田为委员。特委第一次上海会议还对特委班子成员的工作进行了大致分工。谢威除主持全面工作外，还负责湖北方面与分散各地中原突围失散人员的联系。徐楚光、李蔺田负责军运和湖南方面工作。特委机关设在湖北武昌。会议还确定了湘鄂特委开展军运工作，发展敌后武装，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配合刘邓大军以及支援其他地区的革命斗争的工作方针。特委独立开展工作，不与中共武汉党组织发生横的关系，必要时可以通过上海局协调武汉党组织配合等。张冰、汪乐挺、李炳南等人列席了会议。

但三工委并不是整体合并到湘鄂特委，其湘鄂两省与军运有关的四十

几名党员和骨干、几十名工作关系人，以及湘鄂民主联军部队、湘鄂川秘密联络站等依然归三工委领导，形成三工委和湘鄂特委两条线开展地下斗争。

特委在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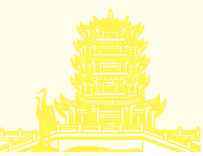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1947年7月下旬，与会人员分批离沪返汉。临行前相互约定，返汉后到武昌抱冰堂叶鸣声（叶铭琛）家中联络。叶是中共地下党员、民盟武汉支部发起人之一，徐楚光的关系人。

在叶家召开的几次特委会议上，详细研究和部署了行动方略。具体分工是：谢威、张冰、汪乐挺等人留在武昌，由谢威掌握全面工作，加强与湖北各地同志的联系；徐楚光、李蔺田、张弩、成铁侠、罗纳等人去湖南开展军运工作；在武昌相国寺四十号和积玉桥二十号建立秘密联络站。成立湘鄂特委中心党支部，由张冰、汪乐挺分别担任正副书记。特委中心党支部负责在武汉市内发展党领导下的地下组织等。湘鄂特委借助谢威、徐楚光在湖北的关系，以及三工委在湘鄂的工作网络迅速在两省开展工作。

会后，特委开始联络中原突围失散人员，积极恢复组织，发展武装力量，为接应刘邓大军南下做准备。徐楚光在返回长沙前，将徐文煌、徐又新、叶鸣声、叶晃夫人李敬梅等一批工作关系交给了张冰。

谢威派人分头联系散居各地的中原突围失散人员，向他们传达特委三条指示：一、恢复和发展组织，开展游击战争，迎接南下大军；二、宣传革命形势和军事胜利，鼓舞士气；三、组织工作中应注意因土改而引起的阶级变化。

在湖北的北线，谢威了解到中原突围后，刘建章、许猛、丁锐、段玉美等地方同志仍以北山工委名义在进行活动。他们不但掌握一支武装，而且还保存着包括钟祥附近上下胡集、八角庙、冷水铺等集镇及其周围农村在内的一些根据地和相应的政权组织。李炳南奉特委之命找到北山工委，向刘建章传达了湘鄂特委的指示，并责成他们与邻近各地坚持斗争的同志取得联系。接到指示后，北山工委很快与坚持在荆（州）沙（市）地区和



江南地区的陈明、王克强、王宏义、段正富以及天京潜的张英武、柳以仁、高华庭等人取得了联系，在特委领导下开展工作。

在湖北的南线，谢威派人到鄂南找到了原京钟指挥部协理员徐涛和地委民运部干事吴玉堂。吴玉堂当即来到武昌听取指示，谢威派他速去鄂东寻找漆少川和易鹏。吴到鄂东后，因漆少川和易鹏直接与南下大军接上了头后赴大别山根据地，没接上关系，鄂东方面无实质性进展。鄂南方面徐、吴就地开展开展工作。

在湖北中东线，谢威派王锡仲去应城找李必超、韩起。打听到他们已先后被敌人杀害，没有开展工作。

徐楚光亲自带领汪以南、胡佛言乘船顺长江东下，到鄂东黄冈县团风镇下船，去蕲水等地寻找他们过去在鄂东工作时的关系，部署策反蕲水、罗田、英山三县国民党县自卫大队，以此为基础组建鄂豫皖边区地下人民武装。徐楚光任命汪以南为湘鄂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鄂豫皖边区地下人民军司令员，徐楚光任政治委员；徐文煌任副司令员，徐国纲任第一师师长，胡佛言任警卫团副团长。地下人民军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开辟和扩大根据地。汪以南等人按照徐楚光的指示留在鄂东展开对蕲、罗、英三县国民党自卫大队的策反和筹组鄂豫皖边区地下人民军工作，徐楚光、胡佛言返回武汉。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到10月底，湘鄂特委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联系上一些失散人员，向他们传达了特委决定。不少地区在特委帮助下恢复了党的组织，扩大了敌后游击武装，党的各项工作逐步恢复和开展起来。

在湖南，主要是在原三工委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设立秘密联络站、发展党员、策反国民党地方部队和组建扩充湘鄂民主联军、策动起义等工作。湘鄂特委成铁侠和欧阳魁发展桂阳北乡首富、四大金刚之一的陈漠璞的儿子陈赛鹏加入中共，创建了泗洲寨游击根据地，建立了湘鄂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

在长沙，徐楚光、李蒨田在湖南省参议会收发室设立了秘密联络总站，在落星田开设了裕民煤栈，便于徐楚光以煤炭商人身份作掩护。原三工委

槐树巷五号联络点转为湘鄂特委驻湖南领导机关，湘鄂民主联军在长沙、衡阳发动起义计划也加紧实施。

1947年秋末冬初，在成铁侠等人策动下，以湘鄂民主联军湖南部队衡阳盐务局税警队为主力发动起义。起义部队在由衡阳开赴新化前，因叛徒反水出卖而遭失败。起义部队指挥官李万衡被捕，成铁侠等人向常宁、桂阳转移。这次武装起义是解放战争时期湖南国民党部队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影响较大，及于全国。湖南省内外大小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起义军的情形达半月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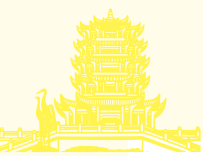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早在1946年5月，负责上海地下工作的沪、镇（江）三工委特派员刘蕴章暗中叛变投敌，成为军统局南京站和局本部二处党政组情报通讯员，蜕变成潜藏在三工委的特务。刘叛变后，军统局将徐楚光列入专案侦防级立案。1947年4月，军统局通过其他情报途径对徐楚光率部转战湘鄂赣地区工作的动向有所觉察。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将徐楚光三工委系统的侦破由侦防级提升为侦破级，并密电交代上海、湖北、湖南等地特工站，以武汉为重点，组织力量追捕徐楚光等三工委成员。敌人的毒手正伸向徐楚光。

鲜血染战旗

1947年秋，刘邓大军已从大别山向外发展。10月，前锋已经到达武汉附近的黄陂、新洲地区，武汉守敌开始戒严。军情发展比湘鄂特委预料的要快，客观上也要求特委尽快发动武装起义，策应大军实施战略展开。

1947年9月下旬，徐楚光、李蔺田由长沙来到武汉，在武昌胡林翼路抱冰堂药铺内召开了特委扩大会。会上，大家对于联络失散人员、恢复发展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军运等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一致意见，但对于利用国民党地方军警部队组成的湘鄂民主联军在长沙、武汉发动武装起义的时机上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徐楚光认为战机稍纵即逝，应立即发动起义，中心城市起义可牵制敌人回援，减轻正面战场压力，达到策应刘邓大军的目的。谢威认为目前任务是巩固发展革命武装，隐蔽待机。如果过早行动，兵力单薄且无取胜把



握，不如等大军过江时再发动武装起义，起内应作用，把握要大一些，衡阳盐务局税警队起义失败就是教训，反对立即发动起义。因意见无法统一，暂时休会。

由于徐楚光三工委系统来湘鄂的主要任务是华中分局部署的，其核心内容就是发动武装起义，迫使敌军回援，减轻正面战场军事压力，无论是策应华中解放军还是中原解放军，其总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在第二次特委会议上，徐楚光仍坚持按华中分局的部署立即发动武装起义。就谢威而言，发动武装起义并非湘鄂特委的中心任务，仍不同意立即起义。在分歧依旧、无法达成统一意见的情况下，决定报请上海局定夺。上海局回复：就近去中原局向刘邓首长请示。特委会据此委托徐楚光前往中原局汇报。

行前，徐楚光、李蔺田返回长沙交代工作。此时正值中秋节前夜，徐楚光与妻儿一边吃月饼一边赏月。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是他们的永别！1947年9月29日，徐楚光化名《申报》外勤记者席正，与李蔺田一起到达武昌，准备由武汉警备司令部干部学校少校教官胡佛言掩护经鄂东转大别山根据地。

当徐楚光从三工委秘密联络点神农架森林开发公司武昌办事处检查工作后出来时，在路上偶遇大革命时期在老家蕲水县自卫大队任中队长时手下一个叫夏伯诚的班长。此人早已脱离了革命队伍，当时是国民党武昌警察局局长陈焕炳的眼线，之前已从陈焕炳处得知保密局已立案，正悬赏捉拿徐楚光。此时，徐楚光并不知道夏伯诚的真实身份，一时疏忽将他带到自己住处。当晚，徐楚光在武昌蛇山隧洞附近族姑妈徐敏文家被捕，一同被捕的还有胡佛言和徐敏文夫妇。

负责掩护徐楚光的李蔺田第二天一早得知徐楚光被捕，立即报告谢威。当天晚上，谢威召集李蔺田、张冰在武昌水产街徐文煌寓所举行特委紧急会议。作出营救徐楚光、增补张冰为特委委员、由谢威去中原局向刘邓首长汇报工作等五项决议。

因案情重大，党组织未能营救出徐楚光。10月中旬，徐案从武昌警察局移交保密局湖北站，徐楚光等四人被转押到汉口华商街的国民政府主席

武汉行辕三处。12月底，徐楚光被押送到南京国防部二厅转交保密局，关押在南京宁海路十九号保密局监狱。经受敌人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徐楚光始终坚贞不屈，1948年10月9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9岁。

谢威将工作安排后离开武汉，沿秘密交通线，徒步经黄陂、麻城进大悟山见到刘邓首长、李先念司令员和陈少敏部长。因谢威是熟悉湖北省情的地方干部，李司令员和陈部长执意将他留下，随即被江汉区党委派到江汉二地委工作。由于谢威书记仓促离职，甚至来不及与李蒨田、张冰交接工作，上海局又没有任命新的书记，李蒨田、张冰成了特委实际上的负责人。在没得到中原局首长同意或是不同意发动起义指示的情况下，两位委员仍按原计划扩充联军部队，相机发动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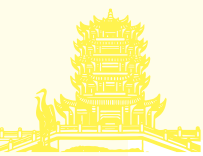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湘鄂特委内三工委人员叛变投敌和违反地下工作原则与其他党组织保持横的联系，给湘鄂特委、上海局武汉中心小组等横向党组织造成重大损失。同在湖北的中共湖北省工委和武汉市工委均成立于三工委和湘鄂特委之后且没有横的联系，因而避免了损失。

1948年1月，湘鄂民主联军副司令、三工委湖南党小组组长张弩的随员兼湘鄂特委交通员叶少卿在武汉意外被捕叛变投敌，被保密局湖北工作站委任为上尉组员，派遣回特委充当潜伏特务。

4月20日，湘鄂特委设在武昌积玉桥二十号的秘密联络站被叶少卿出卖遭破坏。当晚，上海局武汉中心小组经济干事李琢章被捕。

5月，张弩在奉命去山东向华东局汇报工作时遭叶少卿出卖，在保密局上海站和警备司令部的联合搜查下被捕，随即叛变供出与他联系过的地下党员唐公福以及曾领导过他的淞沪杭嘉工委委员罗希明，致使工委书记方休和委员罗希明、范正昌等人被捕，上海局外县工委领导的淞沪杭嘉工委遭到严重破坏。

5月，汉口刑警队、湖北绥靖总队联手出动，先后抓获特委秘书罗纳、三工委总联络员和特委中心党支部副书记汪乐挺、鄂豫皖边区地下人民军副司令员徐文煌，以及徐又新、余坤山所部下属十八人，押送保密局湖北站关押。当晚罗纳叛变，供出湘鄂特委党员和特委策反对象长沙警备区代



理司令唐生明等三十余人，同时交出特委经费黄金十两和一批党的文件；余坤山及其下属十二人被杀害。徐楚光被捕，使三工委和湘鄂特委失去强有力的领导人，随着徐文煌等负责人先后被捕，主要由徐楚光联系的湘鄂民主联军湖北部队逐渐自行解体。

6月1日，与特委发生过横的联系的上海局武汉中心小组被罗纳出卖，小组成员潘兢欧、骆楚材在交接工作时被捕。不久，武汉中心小组书记顾剑萍也在由沪抵汉的轮船码头被捕。除二十多名成员先后被捕外，该小组秘密开设的银行、商行、印刷厂以及贵重药品和黄金也都被特务悉数查获，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上海局直属的武汉中心小组遭敌特毁灭性破坏而解体。顾剑萍后来在南京英勇就义。

徐楚光被捕后，张冰一直在湖北坚持工作。1948年5月上旬，张冰得知罗纳叛变被迫离开武汉之前，通知湘鄂特委湖北幸存人员迅速转移到长沙，与李蔺田领导的湖南成员汇合。张冰离开武汉后，湖北方面的工作也随之全面停止，湘鄂特委湖北机关和地下组织遭受重大挫折而基本解体。党在武汉的组织遭受严重损失。再赴湖南的张冰与李蔺田、成铁侠等人整理湖南地下组织和地下武装，张冰还着手建立了长沙—益阳—常德—津市—沙市进入江汉解放区的地下交通联络线。继而又去衡阳联络地下武装，准备武装斗争。

保密局湘鄂工作站也加紧破坏湘鄂特委和三工委在湖南的地下组织。

5月，湘鄂民主联军湖南部队之国民党湖南保安第六团上校团副滕文被捕，作为重犯被转入汉口关押，其他打入六团的特委人员紧急转移，保安第六团党组织不复存在。同月，因副师长侯宗汉叛变，湘鄂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解体。湘鄂特委派来做军运工作的郭仁被捕后，被押解到常德第十七军绥靖区军法处。郭仁的警卫员邱宜炎、鲁杨柏（党员）被侯宗汉杀害于桃源。郭仁被营救出狱后组建了江南游击队，复又领导了常德武装劫狱，救出难友和其他囚犯100多名。1949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郭仁领导的游击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反动派将郭仁杀害于湖南桃江。

因叛徒叶少卿仍潜伏在特委内部未被识破，张冰与之约定见面。1948

年6月27日，经叶少卿指认，张冰在长沙火车站被保密局湖北站站长余克剑率领的湘鄂工作站二十多名特务抓获，随即押赴武汉，先后关押在汉口郊外罗家墩保密局湖北站监狱和汉口沿江大道武汉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张冰被捕后，长沙起义计划也随之夭折。武汉解放前夜张冰英勇牺牲，年仅35岁。

就在三工委和湘鄂特委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1948年5月，江汉三地委城工部成立，上海局张执一将徐楚光、张冰、滕文等人关系交给郭伯诚部长，其目的可能是希望借助解放区的力量协助和掩护三工委和湘鄂特委成员。此时，徐楚光已经被捕，张冰前往城工部接上关系后不久也被迫离开武汉。根据上级“特委领导的湖南兵运工作，转归江汉三地委城工部领导”的指示。湘鄂特委和三工委在湘人员成建制地随湘鄂民主联军司令员成铁侠就近转归中共江汉三地委城工部。成铁侠被任命为襄南军分区高级参议，多数时间随城工部活动。



江汉三地委城工部部长郭伯诚（中）、团委书记高开元（左）、
沔东城工部副部长吴平（右）

李蔺田在汪文翰堂弟汪治华家隐蔽半年后，与汪离湘返回湖北沔阳。成铁侠、陈赛鹏、陈连城、李铁山、罗滔、欧阳挺、滕文等特委成员也先后转移到江汉三地委城工部。成铁侠被任命为三地委城工部下辖的荆（州）



沙（市）工委委员，成了三工委和湘鄂特委幸存人员的实际领导人和联络组织者。不久，成铁侠、滕文、陈赛鹏、李铁山、陈连城、罗滔、欧阳挺等人又被派回湖南从事军运工作。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江汉三地委城工部赴沙市接管。原三工委和湘鄂特委幸存人员随成铁侠转入四野十二兵团和湖南省军区。他们继续坚持艰苦顽强的斗争直到1949年冬。其间，成铁侠、李铁山、陈赛鹏组建了下辖三个支队和一个直属队、三千多人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军区司令部等多支敌后游击武装队伍，并与敌军展开战斗。湘南游击总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陈赛鹏于新中国诞生前几天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烈士的鲜血染红战旗，烈士的英名永垂不朽。

化险为夷——武昌红十字补习学校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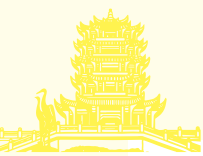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 宋 健

武昌城内黄鹤楼下的斗级营，是一条并不引人注目的小街巷。1948年6月中旬，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突然将位于斗级营66号的武昌红十字补习学校封锁得严严实实，并进行彻底搜查。学校的学生在惊恐之余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原来，这所外表普普通通的学校实际上是武汉地下党组织的一个秘密机关，学校的英语教员肖惠就是红十字补习学校党支部的负责人。封锁和查抄这所学校的则是国民党汉口市警察局刑事侦察大队的警察和特务。那么，这个地下党的秘密机关又是怎样暴露的呢？

导致这次党的秘密机关被破坏是从邹慎被捕开始的。邹慎是湖南常宁人，1945年10月经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到中原解放区工作，中原突围前转移到武汉，接受武汉地下党领导。1947年底邹慎在担任汉口青年剧社副社长期间，因演出《草木皆兵》等进步剧目，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监视近半年。1948年4月他入党后，又在汉口做木船生意筹集党的活动经费，进一步暴露了身份。而肖惠领导武昌红十字补习学校党支部组织的读书小组成员也没有严格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经常出入中山公园高谈阔论，暴露了行踪，结果被国民党特务跟踪，顺藤摸瓜找到了学校所在地。

1948年6月12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邹慎和住在他家准备前往解放区的进步学生陈定彦。邹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变节，公然叛党投敌，表示：“我要将我参加共产党的经过说出来，我绝对改过自新。”随即，邹慎招供了他所知道的地下组织“职业青年委员会”的名称及党组织情况，还有4名党员、6名进步群众的姓名、住址，并充当国民党汉口刑警大队的刑事



警员，带着特务四处搜捕地下党员。

6月19日，邹慎带领特务在家中设下埋伏，企图逮捕前来接头的肖惠。不料肖惠已接到党组织紧急通知，正准备转移，没有来接头。敌人按照邹慎的供述逮捕了肖惠的恋人、女共产党员王欣荣，并从王欣荣口中得知了肖惠的地址，于是邹慎带领4名便衣特务于20日凌晨4点半闯入肖惠宿舍，逮捕了肖惠和刘岩燕。

为了破获更多的中共地下组织，狡猾的敌人故意让邹慎的妻子去找地下党员雷贞谷，声称：“老邹被捕了，请组织营救。”特务随后暗中监视雷贞谷，企图“放长线、钓大鱼”，给中共地下组织来个“一网打尽”。然而，雷贞谷没有上当，于是邹慎又带领特务在汉阳白鳊街口将雷贞谷、戴守富二人逮捕。由于邹慎叛变投敌，出卖组织和同志，武昌红十字补习学校这个地下党的秘密机关被国民党特务彻底破坏，先后有6名党员和12名党的外围组织成员被捕，大批党内文件落入敌手。

肖惠被捕后，敌人将其押送到汉口车站路万国旅社二楼军统特务秘密据点进行审讯。特务们先后派来多名叛徒进行劝降，许以“上校”职务，轮番威逼利诱，随后将他转送到武汉警备司令部缉查处看守所，进行严刑审讯。

邹慎的叛变投敌，加上一些被捕党员缺乏应对审讯经验，犯下严重错误甚至有人动摇，招供了一些情况，这些都使得中共湖北省工委和武汉市工委处于极度危险之中。通过审讯，敌人得知了化名“汪先生”的武汉市工委书记刘实的身份、体貌特征（身材高大，说北方话，爱穿西装）和大致活动范围，也知道了武汉市工委委员杜子才（化名杜南针）原来的住址和工作单位。

武昌红十字补习学校事件发生后，武汉市工委最先得到消息的是工委委员杜子才。他妻子告诉他：“听说有个叫王欣荣的被捕了。”杜子才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要去通知肖惠转移。他妻子怕他去有危险，就与他商量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进行侦察。由他妻子去肖惠住处察看情况，他本人则隐蔽在附近一个面馆中吃面，他与妻子约定：如果肖惠住处有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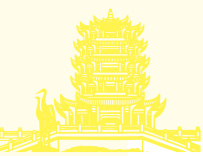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疑情况，就走过面馆咳嗽两声；如果肖惠出事了，就走过面馆连续咳嗽几声；如果一切正常，就进面馆来吃面。结果杜妻察看肖惠住处后返回路过面馆，连续剧烈咳嗽。杜子才明白：肖惠已经被捕！他立刻回到自己住处，拿掉显示平安的暗号后迅速转移。

武汉市工委书记刘实的遭遇同样惊险。他对武昌红十字补习学校事件并不知情，依然按照原定计划于6月19日去地下党员程逸儒家接头。而程逸儒却因为邹慎出卖，在6月18日就被特务以调查一桩“烟土”案为名从南洋烟厂带走。幸好机警的程逸儒以暗示的方法通知了本厂女地下党员戴雪冰，由她将程逸儒被捕的消息转告了家人。当刘实到来时，程逸儒的嫂子及时将消息告诉了刘实，刘实也立即转移，并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

更为惊险的是湖北省工委委员陈克东。他因筹办地下印刷所之事到红十字补习学校找肖惠联系。一进门，他就发现报警暗号已被撤走，学校内学生的表现也很不自然。长期地下工作的经验使他意识到出了问题，但此时如果惊慌退出则更加危险。于是他只能装着若无其事地往前走。果然，在一片狼藉的办公室中，他被早就事先埋伏在这里的特务拦住。特务问他是干什么的，陈克东想起进门时看到门外有张招聘家庭教师的广告，便泰然自若地回答是来找家庭教师的。特务们仍不相信，继续盘问，陈克东又想起口袋中正好有一张国民党湖北省政府陆近诚处长的名片，便谎称是陆的秘书，要为处长请个家庭教师。特务们终于不再怀疑，放走了他。



国民党汉口地方法院对红十字补习学校党支部书记肖惠的审判案卷



陈克东脱险后，立即向曾惇报警。曾惇考虑到杜子才是他和肖惠的联系人，便立即赶往杜子才居住的寺庙中，当他发现里面显示平安的暗号已被撤走，不由得心中一惊：难道杜子才也被捕了？他不动声色地走到佛像前，暗中观察了四周，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才从容离去。回到家中，他立即撤走显示平安的暗号，迅速转移。事后他才知道：杜子才已经得知了肖惠被捕的消息提前转移了。

经历了这一连串惊险无比的遭遇，曾惇、陈克东认识到形势异常险恶，为保存革命力量，他们果断决定：立即停止大规模群众运动，并通知可能暴露的党员干部紧急转移，省、市工委领导成员也暂时撤离武汉。为了解被捕人员在审讯中的供词和在狱中的表现，随时掌握敌人动向，他们还动用了内线关系打探敌情。这个神秘的内线就是不久前打入国民党汉口市地方法院担任实习推事的地下党员王千弓。通过这一内线，省、市工委掌握了叛徒的情况和被捕人员的表现，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最终化险为夷。

经过这次惊心动魄的危机，为防止武汉地下党组织再遭受破坏，上级党组织决定撤销中共湖北省工委和武汉市工委，于1948年7月正式成立中共武汉市委员会，并从外地调入一批党员骨干充实武汉地下党的力量。随后，武汉市委又投入了新的斗争中。

江汉风起潇湘潮

——长沙特别支部的战斗历程

◆ 刘士明

中共长沙特别支部，简称长沙特支，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湖北省工委设在外省规模最大的一支地下党组织。它隶属关系几经变迁，相关情况变得扑朔迷离，成为颇具神秘色彩的地下党组织。

春风又绿江南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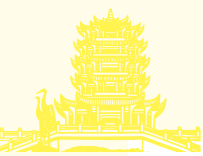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发布了《关于大城市交通要道的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斗争需要，先后派出三批干部到武汉重建党的组织，从此经历了开辟工作、建立省市工委以及建立武汉市委三个时期。

1945年11月，南方局青年组派遣由刘实、邓祥、张维明三名党员率领的第一批干部先后到达武汉。这支队伍不但是中共武汉市工委的主要力量，也肩负着情报搜集和传递任务。

1946年3月，曾惇携夫人王一南以及工作人员徐远在赵忍安和李声簧的接应下到达武汉。曾惇这一支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南方局派到武汉的组织。

1946年夏，南方局组织部抽调在湖北沙市参加合法竞选的陈克东，作为第三批干部负责人率队开辟武汉工作。陈克东这一支的主要任务是筹集经费、交通联络和组织工作。

1946年5月南方局撤销，先后改为中共中央重庆局、南京局、上海中央分局和中共中央上海局。湖北、湖南党的组织均由上海局管辖，直接领



领导人始终是上海局常委、组织部长钱瑛。1947年2、3月间，党在武汉的主要负责人曾惇、陈克东、刘实开始互相联系。

194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27日，刘邓大军胜利进入大别山北麓潢川、固始地区，10月控制了武汉周边的黄陂和新洲地区。军事斗争形势的快速发展，客观上要求武汉三支彼此独立的党组织汇合起来，建立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党组织，领导湖北省和武汉市以城市工运和学运斗争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开辟第二条战线，牵制敌人力量，配合军事行动。上海局负责人钱瑛和刘宁一认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党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根据钱瑛和刘宁一的指示，1947年10月下旬，在武汉同时成立了以曾惇任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以刘实任书记的中共武汉市工作委员会。

湖北省工委建立不久，交通员黎智（闻一多侄子）来汉传达了钱瑛代表上海局作出的指示：“刘邓大军南下后，各地工作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已经消失，应积极开辟大江两岸工作，作好配合大军三月渡江准备。”钱瑛说的大江是指长江，三月渡江是指解放大军拟于1948年3月渡长江南下作战。交通员走后，湖北省工委班子成员曾惇、李声簧、陈克东和刘实开会研究如何落实钱瑛指示。会上决定实施开辟大江两岸工作。这一工作分为两项任务：一是开辟省辖长江两岸的工作；二是开辟粤汉铁路鄂湘段几个大中城市的工作。由长期活动在湘鄂秘密交通线、熟悉两省情况的陈克东负责建立各地党的基层组织，为大军渡江作准备。这一任务被称为开辟大江两岸工作，又称大江南北计划。

由于配合刘邓大军军事行动是一项紧迫的工作任务，必须在1948年3月前完成建立基层组织的工作，以便策应大军渡江。精明能干的陈克东组建党组织的进展堪称神速，只用了三四个月就将湖北境内沿长江两岸的广济、黄石、汉阳、石首、公安等地的关系接了起来。他还联系上以前分别

隐蔽的党员，建立了中共沙市支部和中共大冶县工委；并在湖南岳阳建立了党组织。省工委建立了汉阳武工队，市工委刘实也派谢速航到黄石组织和武装群众，监视江防保安队。为接应大军渡江，党在长江两岸的基层党组织迅速建立起来。

陈克东在开辟大江两岸工作的同时，奉钱瑛之命，于1947年11—12月在湖南长沙建立了特别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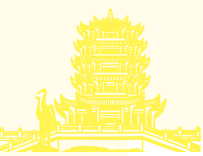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陈克东在湖北境内沿长江两岸和湖南境内沿粤汉铁路鄂湘段建立的党组织都是开辟大江两岸工作的产物。组织关系上，新建党组织隶属湖北省工委；工作任务上，由曾惇、陈克东根据钱瑛的指示布置工作。武汉市工委书记刘实派遣周济在湖南建立的衡阳直属支部不属于大江两岸建党任务，衡阳直属支部与长沙特支也没有横的联系。

党的工作也围绕“准备配合大军三月渡江”展开。原来以为刘邓大军3月就会来到，结果刘邓大军并没有发动渡江作战，而敌人对地下党的破坏和镇压却比以前更加疯狂。

武汉党员的“安全阀”

湖北党组织恢复和建立后，其领导的武汉地区爱国民主运动与刘邓大军在武汉外围的频繁军事活动遥相呼应，使国民党武汉当局感到严重威胁，加紧对中共地下组织实行破坏。白色恐怖之下，党在武汉的地下组织接连遭受了几次较大的挫折和破坏。由于湖北党组织连遭敌特破坏这一突发情况的出现，从1948年4月开始，长沙特支由执行大江两岸任务主动转为接收、掩护湖北暴露身份转湘的地下党员的工作。

汉阳武工队是湖北省工委在汉阳七萧大湾建立的一支20余人、8条枪的小型武装，岳健中任党小组长并负责全面工作，范定一任队长，队员大多是中原突围后隐蔽在当地的新四军五师干部。1948年3月，汉阳武工队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川汉沔游击第二支队。由于建队时有个别新四军五师变节分子奉武汉行辕二处处长、军统少将黄藩初之命混入充当内奸，3月底，武工队集结时，国民党汉阳县乡自卫队包围七萧大湾，武工队在



转移途中与敌遭遇，队伍被冲散。4月11日，队员吴垠、向平等4人在汉口岱家山军警宪联合检查站被行辕二处特务逮捕。随后，范定一等4人被捕。岳健中断定队伍内部出了叛徒，立即决定停止一切活动，设法分批转移。岳健中紧急赶往武汉向省工委书记曾惇汇报出事情况。曾惇认为如果敌人跟踪到武汉，势将危及党组织和负责人的安全。于是紧急通知有关同志隐蔽，并将岳健中等人往长沙和鄂中迅速转移，汉阳武工队解体。岳健中改名张立武，党组织关系转到长沙特支，在长沙从事统战策反和军事斗争工作。

1948年6月12日，省工委设在武昌红十字补习学校内的机关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破坏。因肖惠是校党支部书记，因此该事件又称肖惠案件。由于该校英文教员、地下党员邹慎工作不检点，言行暴露，被特务跟踪逮捕后叛变投敌，导致武昌红十字补习学校内党的机关被国民党破获，党支部书记肖惠、刘岩燕等6名党员及傅国森等12名外围积极分子先后被捕。邹慎甚至还供出了市工委书记刘实的身份及活动范围，严重地威胁着整个武汉党组织的安全。曾惇、陈克东相继脱险后，立即紧急通知主要负责人及有关人员转移。武汉市工委领导的3个职业青年支部也全部撤退转移。陈克东首先转移到香港，后转移到长沙，开始接收和安置转长沙党员。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在武汉市工委职青支部负责工运宣传工作的韩伯村和胡原转移到长沙，隐蔽在演剧六队联华剧场内，党组织关系转到长沙特支。长沙特支成为湖北省工委和武汉市工委的重要掩护机关。

1947年6月1日，武汉警备司令部指挥军、警、宪、特包围武汉大学进行大搜捕，并向师生开枪，造成打死和重伤各3名学生、轻伤16名师生、逮捕22名师生的六一惨案。被同学从军警手中抢救出的学生党员夏雨亭流落江西等地。到1948年9、10月间，夏雨亭几经辗转与武大同学、国统区全国学联湘鄂赣三省联络员陆方取得联系，陆方安排他到长沙修业小学当教员，夏雨亭改名夏敬文隐蔽下来。1949年1月下旬，陆方将夏敬文的党组织关系转长沙特支。此外，在鄂南电力公司开展工运斗争的侯杰等人也转移到长沙特支。

1948年6、7月间，岳健中和陈克东分别转移到长沙后，陈克东开始以长沙为主要工作地并建立了特支领导班子。陈克东任长沙特支书记，岳健中和宋绍尧任委员。特支机关设长沙，特支成员多为外地转来的党员。支部班子建立后，仍然以承担掩护任务和甄别发展党员为主要工作。

长沙特支“管得宽”

与主动接收和掩护湖北方面转移党员不同的是，长沙特支还被动地接收了南京中央大学党员和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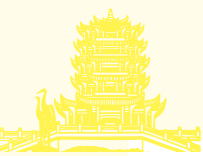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1947年5月20日，南京爆发了国民党军警血腥镇压游行请愿学生的五二〇血案。血案发生后，在各地中共组织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为席卷武汉、重庆、广州、杭州、长沙等60多个大中城市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全国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五二〇运动一年后的1948年5月，中大、金大党组织发动红五月运动。5月20日，举办五二〇运动周年纪念万人营火晚会，前来破坏的特务逮捕了4名学生。5月22日，中大、金大、金陵女大同学包围国民党青年部，迫使其放人。面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国民党当局开始动手镇压，《中央日报》连续几天发表杀气腾腾的社论，叫嚣要对进步学生“操刀一割”。从1948年8月19日起至1949年初，国民党当局接连对南京、上海等城市进步学生实施了3次大逮捕，逮捕进步学生105人。

八一九大逮捕前后，中共南京市委为了保存力量和加强中小城市的工作，决定将一部分已暴露的党员和新青社员分批撤退到解放区或转移到外地，暂时隐蔽起来保存力量，相机开展工作。

胡封陈是中大党员，他向湖南转移前党总支交代：到湖南后，应与已转移到汉口的中大党员张学萃保持联系；还可联络转移到两湖的其他中大同学，等候南京指示。中大党员、经济系研究生陈执中因参与组织京沪苏杭四区学联遭国民党当局全国通缉，与同样遭通缉的郭道西转移回到家乡湖南。

胡封陈与陈执中取得联系后，陈认为应将分散湘鄂两地的中大同学集



中到长沙待命。从1948年8月下旬开始，经过胡、陈多方联系，3名党员胡封陈、陈执中、张学莘和5名新青社员王文炳、袁君范、郭道西、傅业葵、余逸时于9月初齐聚长沙。

陈执中与南京联系转接党组织关系未果后，三赴武汉找党，并于1948年11月与上海局取得联系。陈克东根据上海局的指示与陈执中接上关系，将陈执中、胡封陈和张学莘的党组织关系转长沙特支，5名新青社员转入外围。

陈执中不久也与南京恢复联系。中大党总支后来通过陈执中，开始有计划地向长沙陆续转来马毅、毛程省、瞿继玉、魏泽颖、陈鸿辉等党员和新青社员约20人。

长沙特支就这样成为南京中央大学党组织在湘的掩护机关。

长沙特支还接收了上海局转来、拟随武汉行辕少将高参宋英仲打入“湘粤赣三省剿匪总指挥部”的黄建平和程哲萱夫妇。

江汉风起湘潮涌

1948年7月，曾惇专程前往香港，向上海局领导同志汇报了武汉党组织工作情况和遭破坏的情况。上海局领导根据斗争形势变化，接受了曾惇的建议，决定撤销中共湖北省工委和武汉市工委，成立中共武汉市委员会。新成立的武汉市委的工作任务是：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做好武汉市的城市工作，把原属于省工委负责的长江两岸党的工作移交武汉外围解放区，并将长沙特支、沙市支部、衡阳直属支部划归武汉市委领导。长沙特支划归武汉市委的原因：一是继续执行掩护任务的需要；二是上海局钱瑛在防止湖北党组织遭遇地下党重庆市委那种毁灭性破坏而采取的“两手准备”应变措施的需要。沙市支部划归武汉市委的原因主要是通过骨干党员徐正今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城工部副部长、江汉区党委城工部部长蔡书彬和江汉军区保持横的联系，便于获得解放区的支持。

为加强武汉市委领导力量，钱瑛调派上海市委工委路海空工作委员会书记江浩然和四川省委委员张文澄去武汉工作，并从全国各地抽调了大批

骨干充实武汉党组织。

1948年7月下旬，中共武汉市委成立。曾惇任书记负责全面工作，江浩然任组织部长，张文澄任宣传部长。曾、江、张三人为常委。陈克东任委员兼长沙特支书记，刘实任委员负责工运工作。7月底，曾惇、江浩然离开香港返回武汉，8月1日途经长沙时，向在长沙工作的陈克东传达了钱瑛的指示，布置了长沙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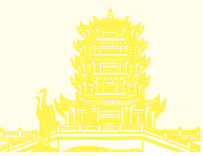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江汉区委城工部部长蔡书彬

武汉市委调整斗争策略，按系统和战线建立起工人运动工作组、策反工作组等一批工作组和委员会。陈克东兼管策反工作组，负责长沙、沙市两地党的工作和长沙、武汉的统战策反工作。

在武汉，以城市为中心的工运、学运等各项工作逐渐恢复和深入开展起来。在沙市，陈克东任命李忠发为支部书记，建立了沙市通往解放区的秘密交通线。

在长沙，陈克东化名老张，开始领导特支党员开展工作。学运方面：在湖南音乐专科学校建立了青年团组织，向小学教师界派出了党员，开展了学运工作，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湖南支部。工运方面：向长沙裕湘纱厂、湖南农业改进所派出了党员，开展了工运工作。在演剧六队发展了党员，建立了青年工作小组；在长沙第一育幼院建立了据点。陈克东还派遣毛程省等党员到岳阳开辟工作，为1949年特支岳阳党小组的建立、湘鄂赣边区民主自卫军的组建奠定了基础。除继续加强组织建设外，陈克东还在长沙北郊丝茅冲行素中学萧敏颂家、长沙军路侧贺益恩家以及陈楚良家建立了秘密联络点。与此同时，还着手对湖南省国民党高层进行统战策反。陈克东领导下的长沙特支在掩护转湘党员、保存党的力量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划归武汉市委后，长沙特支继续接收了来自湖北、上海、南京和北平的党员和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在长沙发展了党员。

从湖北转移来的有：陈克东、岳健中（张立武）、王昆仑、胡原、韩伯村、刘绵、夏雨亭（夏敬文）、侯杰（侯德才）等。

从南京转移来的有：胡封陈、张学萃、陈执中、王文炳、袁君范、郭道西、傅业葵、余逸时、马毅、毛程省、瞿继玉、魏泽颖等。

从上海派遣或转移来的有：程哲萱、黄建平（黄栋）、周汝聪、贺善文等。

原北平市委失去党组织关系在长沙特支重新入党的党员有：宋绍尧、萧敏颂、曹国枢、黄启威、张贞（派遣而来）等。

陈克东在长沙发展的党员有：周毅、艾青、鲍莫若、晏桂芳、廖绍鑫等。

解放战争时期，湖北省工委、武汉市工委和武汉市委党员总数 524 人，共向外地转移党员 50 名，其中 40 人转移到长沙，1 人转移到岳阳。4/5 的湖北外转党员转移到长沙，长沙特支无疑是湖北党组织在湘最大的掩护机关。

到 1949 年 1 月上旬长沙特支脱离武汉市委前夕，拥有党员 60 多人。

暗助民盟建组织

陈克东按照武汉市委的分工和部署，通过萧敏颂，开始在长沙推动建立民盟湖南地下组织，为开展统战策反工作作准备。与此同时，民盟总部也积极指导湖南建盟工作。

萧敏颂是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生，1935 年上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一二·九爱国民主运动，曾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宣传部长、华北各界救国会宣传部副部长，是民先队党团成员。1937 年毕业回长沙。1938 年 11 月长沙文夕大火前夕，随中苏文化协会疏散到湖南沅陵，因战乱失去党组织关系。1944 年 6 月，应桂林核心小组负责人梁漱溟、陈此生邀请，萧敏颂和夫人曹国智在广西贺县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湖南最早入盟的盟员。同年 9 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萧敏颂任民盟东南总支部、南方总支部执行委员。从 1946 年至 1948 年，

民盟南方总支部和民盟总部分别派盟员来湘，4次尝试建立盟的省级组织，均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1948年秋，经钱瑛批准，萧敏颂在长沙特支重新入党，以前党龄暂时搁置，待解放后查清再作处理。萧敏颂重新入党后，陈克东开始积极推动在湘建盟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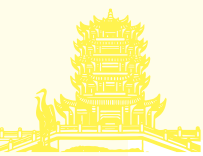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1948年12月，萧敏颂邀请张梓敬、余志宏、刘禄铨在长沙北郊湖南行素中学萧宅秘密聚会。会议由萧敏颂主持，与会者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建立湖南民盟地下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应立即启动建盟工作。萧敏颂当场手拟了筹备建盟方案和筹委名单，推举刘禄铨持萧敏颂致总部的筹备建盟方案和信件赴香港。



民盟湖南省支部主任委员、
长沙特支党员萧敏颂

刘禄铨返湘后，带回了民盟总部同意建盟的决议和负责人周新民的回复函。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民盟湖南省支部筹委会于1949年1月10日在长沙正式成立，萧敏颂任主任委员负责全面工作，刘禄铨负责秘书工作，余志宏负责宣传工作，张梓敬负责组织工作。民盟湖南筹委会简称“湘支”，与总部联络代号为“苏湘民”。不久，中共湖南省工委的余志宏和刘禄铨因党内另有任务退出民盟工作。李鳌和长沙特支的杨伯峻分别接替余、刘任委员。1949年2月25日，民盟湖南省支部在长沙成立。之后，下设了日常工作机构执行委员会。支部委员亦即执委会委员，仍由原筹委会四名委员萧敏颂、李鳌、杨伯峻、张梓敬充任，萧敏颂任主任委员。执委会负责“湘支”的日常工作。

1949年1月10日成立的民盟湖南省支部筹委会和1949年2月25日成立的民盟湖南省支部，恰好跨越了长沙特支随上级变迁的过渡阶段。民盟湖南省支部筹委会成立于长沙特支武汉市委时期，民盟湖南省支部成立



于长沙特支中共中央上海局时期。陈克东和刘晴波两任书记都一以贯之地支持民盟湖南省支部的组织建设。

墙内开花墙外香

随着国民党军在战场上接连失败，国民党当局为统一军政指挥，决定将原武汉行辕改编为武汉绥靖公署，随后再改编为管辖湖南和江西两省的长沙绥靖公署，程潜任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

潜伏在武汉行辕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刘绵也随着这一变化转到长沙绥靖公署。在绥署从武汉迁往长沙前，刘绵向上级请示去向。湖北省工委开会研究认为，程潜回湘后，湖南地方势力抬头，与蒋介石、白崇禧的矛盾势必加深，刘绵应继续潜伏在绥署，便于掌握敌人动态，条件成熟时可策反绥署部队，迎接解放军渡江南下。曾惇书记批准刘绵随绥署南下长沙，任务是搜集情报和策反蒋军，并将他的党组织关系转长沙特支，由特支委员岳健中（张立武）负责联系。

由于湖北省工委提前于1948年5、6月间部署刘绵随长沙绥靖公署南下，为刘绵情报搜集和1949年在湖南成功策反多支原武汉行辕部队奠定了基础。武汉市委还派遣李太平小组入湘策反。衡阳直属支部也做了大量策反工作，这些在武汉埋下的伏笔最终在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中结下了硕果。

中共湖南省工委于1948年9月开始针对程潜的统战策反工作。当年开展了两项影响大的活动，一项活动是王家菜园的时事座谈会，另一项活动是桃子湖会谈。

1948年11月19日，被誉为程潜“军师”的方叔章受湖南省工委委托，出面在自家私宅请客，其目的是以会谈的形式听取各方对时局的看法，以及程潜应采取何种应对时局之策。因方宅位于长沙河西岳麓山下桃子湖畔，故名桃子湖会谈或桃子湖便宴。受邀参加宴会的有湖大教授李达，湖大政治系主任兼教授会主席伍薏农、副教授萧敏颂和讲师余志宏，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肖作霖，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湖南省物资调节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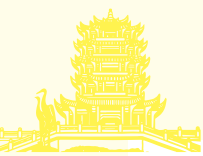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主任委员、程潜族弟程星龄。肖作霖、邓介松听方叔章说李达将出席，表示很高兴认识这位中共建党的发起人。萧敏颂受邀后请示陈克东，陈指示他不得暴露特支党员身份，以民盟地下组织负责人身份出席。

会上，在各方谈了看法后，李达最后发表长篇大论，鼓励在座的国民党人士抓紧时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贡献。会后，程星龄、邓介松和肖作霖一同向程潜报告了会谈详情。程潜对李达的话表示认同：“他说的没错，现在确是没有别的什么路好走了。”由于李达具有中共一大代表的特殊身份，在座国民党人士猜测他是为中共传话。桃子湖会谈的影响是深远的。与会中共人员和程潜最信任的6人中除陈明仁和程潜长子程博洪外，其他4人方叔章、程星龄、邓介松和肖作霖都参加了会谈。会谈不但促使程潜于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结束前，国民党军队实力尚存之时就初下起义决心，于1948年12月31日夜正式委托程星龄代表他与中共湖南省工委联系，还使邓介松、肖作霖拥和的信心更加坚定，行动更加一致和积极。

1949年，邓介松、肖作霖在程潜的支持下撵走反动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张炯和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接收省党部，改选省参议会议长，成立和平促进会等措施，均出自桃子湖会谈的启发。此外，桃子湖会谈还为程潜与中共联系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实施途径。此事标志着湖南和平解放开始进入国共双方实际运作阶段，也从客观上促进了长沙特支从武汉市委脱离出来的进程，以实现上海局多支地下党同时做程潜统战工作的意图。1948年11月萧敏颂参加桃子湖会谈，证明中共武汉市委委员陈克东领导下的统战活动已深入到湖南省国共双方高层。1949年中共中央上海局长沙特支的统战活动，是武汉市委统战工作的延续。

有备无患当“替补”

1949年1月，白崇禧集团盘踞湖北，武汉的地下斗争形势严峻。而5名市委领导中只有陈克东1人是湖北人，武汉市委急需负责统战策反工作的陈克东归队，以加强领导力量。上海局根据中央决议和武汉、长沙斗争



形势的需要，作出陈克东返回武汉、将长沙特支从中共武汉市委序列中脱离出来、直属上海局并调刘晴波接任书记的决定。

1949年1月，湖南省工委决定分别建立中共长沙市工委和长沙县工委。同月，长沙特支脱离武汉市委直属上海局。党在长沙的力量得到加强。

上海局为什么没有将长沙特支划归刚建立的长沙市工委，或在长沙特支基础上建立长沙市工委？这与导致中共重庆市委遭敌特毁灭性破坏的《挺进报》事件有关。

从1948年4月开始，中共重庆市委等一批党的地下组织遭受敌特毁灭性破坏，江姐等100多人被捕牺牲。《挺进报》事件后来波及成都、南京、上海等地，甚至在上海的钱瑛都险些被重庆叛徒带来的特务抓获，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也被迫转移到香港。

钱瑛采取的应变措施，就是在湖北、湖南和贵州等地部署平行党组织，自成体系，独立作战，以免“一损俱损”，发生连锁破坏。

在湖北省，虽然以解放区为依托的各级城工部已建立了多支与武汉市委平行且无横向联系的城工组织，但吸取了湘鄂特委事件、武汉中心支部事件、红十字补习学校事件、《挺进报》事件等一连串血的教训，钱瑛还是决定谨慎从事，以防万一。她从1948年8月开始在武汉市委系统内部署独立的平行党组织，派遣尚嘉齐、吕乃强等人到武汉组成青年工作组，这一预防措施被称为“作两手准备”。

在湖南省，钱瑛考虑到党的组织形式更加单一，也作了两手准备，于1949年1月建立了上海局直接领导、与湖南省工委平行且无横向联系的长沙特支。由此可见，既不能将长沙特支合并到新建的长沙市工委，又不能特支基础上组建市工委，长沙特支只能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毁灭性破坏、作为两手准备的应变力量而独立存在。即便后来发生了长沙市工委与长沙特支之间因工作交叉碰撞引发的所谓“红旗特务误会事件”，党组织面临暴露的风险时，钱瑛仍然拒绝了特支提出的与湖南省工委接通关系的要求，究其原因，或许是钱瑛认为撤销应变措施的条件尚不成熟。

“王益林”独立门户

1949年1月初，钱瑛通知中共全国学联（香港）党支部委员刘晴波：



中共长沙特支书记刘晴波

上海局决定让你接替陈克东出任长沙特支书记。刘晴波到钱瑛处领受任务时，钱瑛、朱语今特别交代：长沙特支直属上海局领导，工作范围不限于长沙，可在省内独立开展工作，不与湖南省和长沙市的党组织发生横的联系；万一省、市党组织遭到破坏，可作为应变力量继续战斗。

不久，陈克东由长沙赴港与刘晴波见面，双方约定了在长沙的接头地点，并相约在长沙交接特支工作。上海局对刘赴任非常重视，朱语今专门从全国学联调湘鄂赣三省联络员陆菊如由长沙赴香港，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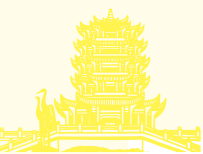
刘晴波赴任。朱语今为刘、陆办理了调派手续。

1949年1月中下旬，刘晴波化名王益林、陆菊如化名陆方，两人假扮夫妻来到长沙。刘晴波按事先约定，到军路侧一栋独立小院找到行素中学教师贺益恩女士，通过她侄儿、特支党员贺善文联系上陈克东并开始交接。长沙特支从1月中下旬脱离武汉市委。

陈克东告诉刘晴波：他是于1947年来长沙负责长沙特支工作的。除在长沙发展党员外，还接受了外地经上级手续转移到长沙的党员。刘晴波接手时约有党员三四十人，另外还有从外地转来和在长沙发展的新青社员。长沙特支从建立



长沙特支文教工作组组长陆方



以来就不与湖南省和长沙市地下党发生联系。因为外来党员较多，在长沙的群众关系较少，在工运方面还没有开展较多工作。

陈克东转交部分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后便匆匆返回武汉。2月下旬，陈克东再次由武汉到香港，进行第2次交接，以至于缺席武汉市委2月23日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

长沙特支1949年1月中下旬整体转属上海局前，拥有党员60多人，党员人数超过衡阳直属支部，是武汉市委在湖北省以外规模最大的一支党



长沙特支机关所在地 长沙市火后街八号

组织。陈克东是以武汉市委委员的身份兼任书记，故长沙特支在规格上要高于其他支部。此外，长沙特支还有另一个特征，这就是大学生多。党员中的一半以上都是名牌大学学生，还有几人是研究生。

因为移交前遵照上海局钱瑛的指示派出20多名湖北转湘党员到外地工作，所以，转到上海局的是张立武和宋绍尧2位支部委员以及30~40名党员。一支基层党组织建制地整体转归上级直接领导，这在解放战争后期的上海局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证明上海局对这个特别支部的重视！

局钱瑛的指示派出20多

1949年3月底4月初，钱瑛从香港调派林南、郑小叶到长沙。4月下旬初，长沙特支新的领导班子成立，刘晴波任书记，张立武和林南任委员。特支机关设在长沙火后街8号，工作范围涉及长沙、醴陵、岳阳、临湘、益阳、浏阳、株洲、衡阳和江西萍乡等两省九市县，以刘晴波化名“王益林”作为特支与上海局联络代号。

新的领导班子根据上海局的指示，确定了着重开展工运和学运工作、少发展党员多发展外围组织成员的方针，并设置了统战、军事策反、工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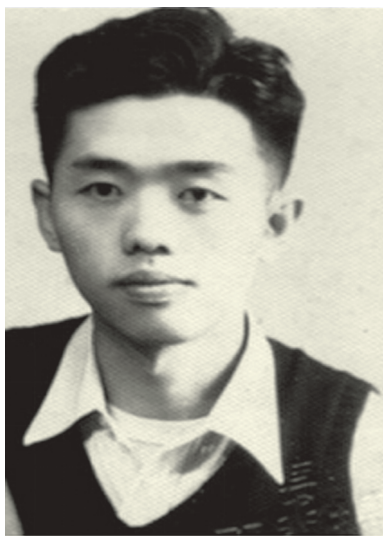
学运、宣传、小学教师、机关公务人员、医药卫生界等八个工作组，成立了演剧六队党支部，以及岳阳党小组、衡阳策反小组等若干党小组和据点。

特支在建立长沙市内各工作组和省内外各党小组或据点前后，着手建立秘密外围组织、统战性质组织、合法登记的社团组织，组建敌后游击武装和民主党派地下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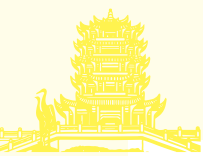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长沙特支在隶属武汉市委期间，就由南京中央大学来湘党员引进了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和青年团。直属上海局后，建立了秘密外围组织工人解放先锋队。工人解放先锋队简称工先，是长沙特支 1949 年在工厂建立的党领导下的秘密外围组织，其成员大多为工人。在人数较多的企业，如裕湘纱厂还设有工先大队，大队下设若干分队。工先由特支分管工运的林南领导。

新民主主义工作者联盟，简称新联，是在经济、金融界职员中建立的组织，也是特支人数最多的、具有统战性质的外围组织。新教育研究会，是刘晴波指示湖南私立行素中学代理校长曹国智建立的特支在长沙中学界的外围组织。

长沙特支还建立了 3 个公开登记的社团组织：中国农学研究社湖南分社、新法学研究会和医院教会团体联谊会。1949 年 4 月在长沙市基督教青年会公开成立的中国农学研究社湖南分社，吸收了国民政府农林部棉产改进处汉口分处于武汉解放前被裹挟撤退滞留长沙的近 20 位科技人员，通过参加各项活动、交流和反复动员，棉产改进处汉口分处负责人周干、周咏曾等人最终放弃继续向广州撤退的原定计划，整个机构、人员及物资全部完整地留在长沙，为解放后迅速投入到湘鄂两省棉花生产的恢复工作中奠定了基础。



长沙特支机关委员林南



长沙特支还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于1949年春夏之交由黄栋、程一中和许松圃组建了民革长沙市工作委员会。同时建立了一个由刘晴波、黄栋、曹国枢和周汝聪组成的4人民革党小组，由黄栋出面、党小组协助，一起领导民革。长沙市2支规模最大的民主党派地下组织——民盟和民革，都是长沙特支帮助组建的。

在革命形势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长沙特支设置了由张立武负责的军事策反工作组，独立组建了有800多人、700多支枪的湘鄂赣边区民主自卫军；有100余人、70多支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北挺进队；有枪四五百的益阳南岸七乡联防武装；有上千人的郴州游击队；有200余人枪的湘北人民游击支队；有100余人、40多支枪的金井武装工作队以及湘中游击纵队等7支武装队伍，这些武装队伍进行了敌后游击战斗。其中，长沙特支岳阳党小组杨青和起义营长姚风午指挥的湘鄂赣边区民主自卫军，在湖南临湘羊楼司镇智擒一个蒋军美械加强连，缴获全部美械装备。由于自卫军扼守湘鄂赣三省交界处之临湘、蒲圻、崇阳和通城四县边缘地带，重峦叠嶂，虎视入湘交通要冲，产生了比它的实际力量大得多的政治影响，连长沙的报纸都刊载了姚风午率领湘鄂赣边区民主自卫军起义的消息。自卫军每天在交通关隘和铁路沿线伏击过往小股敌军、交警和后撤军政人员，令敌人防不胜防。后来，杨青和姚风午将部队带到湖北解放区，经过整训，改编为江汉军分区独立第三团。

地下斗争显身手

长沙特支对湖南省国民党高层的统战活动始于1948年11月的桃子湖会谈。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推进，长沙特支根据上海局的部署，以争取湖南和平解放为重点，在统战、策反、工运、学运、军运、保厂护产、反迁移和领导民主党派地下斗争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全面开展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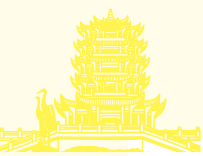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对程潜的统战工作。湖南和平解放的成功，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正确决策、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以程潜和陈明仁为代表的国民党湖南军政高层审时度势毅然起义，以及地下党卓有成效的统战策反工作这四个方面

共同努力的结果。长沙特支是进行统战策反工作的一个方面。1949年春夏，特支加快了统战工作步伐。萧敏颂、曹国枢、杨伯峻分别建立了与程星龄、方叔章、谢一中、省府新闻处长刘伯谦等人的联系。黄建平通过岳父程一中，也与前黄埔军校代理校长方鼎英以及湖南元老唐生智胞弟唐生明等保持接触，刘晴波还会见了唐生明。通过做工作，上述国民党军政人员都表示愿为长沙和平起义贡献力量。1949年3月刘晴波到香港参加培训班学习时，上海局钱瑛将程潜小儿子、长沙绥署警卫团团长程元（字博乾）的统战关系交给刘晴波，以期通过省工委和特支两条线同时做程潜的统战工作。以张立武为组长的特支军事策反组成立后，刘晴波将联系程元的任务交给了萧敏颂。萧敏颂与长沙绥署政工处长刘伯谦是长沙明德中学的同学，萧通过刘的引见结识了程元。鉴于上海局有地下党主要负责人不得出面与国民党军政首脑直接会谈的规定，1949年6月初，特支决定由萧敏颂负责约程元，张立武负责与程潜直接会谈，力促其下决心起义。

6月上旬的一天，程潜邀张立武到省政府，进他办公室里间密谈。几天后，程潜要刘伯谦转告张立武：为了以后方便出入省府，特地给他安排了一个省府参议的名义，并送来一枚省府的证章。特支将张立武与程潜的谈话内容，以及程元和刘绵提供的长沙绥署的动向，均以密信的方式向上海局钱瑛报告。大约在6月底，程潜和张立武在省府作了第2次会晤。程潜被白崇禧逼走邵阳后，张立武又应程潜之邀到邵阳晤谈2次。张立武是与程潜会晤最多的中共人士，对争取程潜起义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工运方面。长沙特支的工运工作，相对集中在长沙裕湘纱厂、湖南省公路局、长沙汽车修理总厂、长沙保养场、长沙电厂等几个大单位。特支党员林南、陈鸿辉、侯杰（侯德才）、袁家式、袁君苑、吴振华等人在上述单位建立了工人解放先锋队、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工人纠察队等秘密外围组织，团结广大工友取得了保厂护产工作的最终胜利。

学运方面。特支的学运工作主要在长沙开展。特支党员郑小叶、杜家骏、胡原、陈执中等人在湖南音乐专科学校、湖南省立一中、文艺中学、省立克强学院等学校建立了新青社、长沙市中等以上学校歌队联合会（简



称市歌联)、学生自治会等外围组织,参与组建了长沙市学联。他们开展了四七大游行、护校保产等运动。

在教育界工作方面,特支于1949年1月成立了由陆方、贺善文任正副组长的文教工作组,这是特支成立的第1个工作组。4月,成立了以陆方为组长的小教工作组。小教党员在拥和签名运动、反迁移、反破坏、反紊乱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稳定了教职工队伍。

农业科技界的地下斗争。特支党员贺善文、瞿继玉依托中国农学研究所湖南分社,在农业科技界开展工作,建立了湖南省农业界联谊会。他们团结广大科技人员,保护了湖南农业改进所仓库储存的数万斤万利籼水稻良种、省农机处全套进口农业机械、华中棉产处储备的数百吨柴油、修业农校内全省少有的一整套四库全书等,一大批重要物资、机械、图书仪器都顺利保存下来,并制作成财产仪器清册上交。

特支下属的演剧六队党支部充分利用专业文艺团队的优势开展各种宣传工作。

民主党派的地下斗争。民盟湖南省支部根据民盟总部和长沙特支的部署,确定湖南民盟组织的中心任务是从各条战线上发动盟员及所联系的群众,打击和孤立敌人,壮大革命力量,迎接解放。此时,湖南已建立了7个民盟的市分部。民盟湖南省支部在特支党员、主任委员萧敏颂和特支党员、宣传委员杨伯峻领导下,发挥民盟报人群体优势宣传和平主张。盟员龚鸿兴与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部少将副参谋长陈庚接触,又通过陈庚同湖南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王劲修建立了联系。盟省执委会掌握了这个情况后,指定特支党员杨伯峻指导龚直接做他们的策反工作。陈庚、王劲修将各自能控制的部队,包括驻地、官佐以及他们的思想倾向造具名册。名册中官佐的思想倾向用符号标示:标“0”者,表示陈、王可以直接指挥;标“?”者,表示不可靠;无标记者属于中间状态。陈庚在交名册时,严肃地对龚鸿兴说:“龚先生,我和王司令的两条性命一起交给您了。”龚得到名册后,立即送杨伯峻转交给长沙特支。特支派了专人,在龚鸿兴的协助下继续做他们的策反工作。陈、王两将军最终率部跟随程潜、陈明仁起义。

盟员肖如柏、李治安还策动欧冠率湘南保安第一军和湘南 27 个县市通电起义。特支领导的民革长沙市工委利用身份上的优势，逐渐形成以唐伯球、席楚霖、曹伯闻等民革党员为主的国民党湖南地方民主派参议员群体，与以程潜为代表的湖南省政府军政高官群体遥相呼应的拥和局面。这两个政治群体中的湖南省参议会议长唐伯球、副议长席楚霖和秘书长曹伯闻，省政府顾问方叔章，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主任程星龄，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和刘公武，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肖作霖，长沙绥靖公署秘书长刘岳厚等人多是程潜的僚属、同事、同乡或亲戚，能随时接近程潜，程潜也信任他们。当程潜既要应付蒋介石，又要防范白崇禧，处境复杂态度游离之时，这些亲朋故旧对程潜的劝说和进言，对于稳定程潜走湖南和平起义之路，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中共无法替代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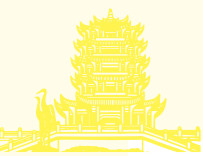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银行界的地下斗争。新民主主义工作者联盟先后在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金城银行，以及合作金库、邮汇局等单位职员中发展了 100 多人。他们通过银行职工联谊会开展活动，建立读书会、学习小组，宣传党的路线、方针，特别是工商政策，保护好单位财产、物资、账目、档案资料，做了大量迎解放、迎接管的准备工作。

策反蒋军立奇功

1949 年，除长沙特支成功策反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军统二处衡阳潜伏组和盐务处、国防部第二厅三〇五直属行动小组、岳阳县长兼自卫团团长许新猷起义外，湖北省工委提前安排入湘的刘绵还成功策反多支国民党部队投向人民。

二三二师前身为国民党第九战区孙蔚如西北军一部，后改编为武汉行辕警卫团。师长康朴原为武汉行辕副官处处长，副师长张镜白原为武汉行辕警卫团团长。武汉行辕改为长沙绥靖公署后编成新编十四旅，1948 年 7 月再扩编为二三二师，下辖六九四团、六九五团和六九六团，直属长沙绥靖公署。

二三二师驻湖北松滋、公安、石首一线警戒江防时，曾秘密加入中共



中央中原局社会部领导下的秘密革命组织 3130 武汉总部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三军，编为第八师和第十五旅。1948 年冬调湖南后脱离江南地下第三军序列。

二三二师担任石首和华容两县江防期间，西北军起义师长孔从周派曹胜权持函到师部，嘱康、张为西北军争气，勿给蒋介石殉葬。康朴、张镜白请曹向孔转达了起义决心。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长樊中黎先后派韩炳新、蒙养正两次来师部联系起义事宜，由张镜白留驻在六九四团，以方便与河南军区联系。为保密起见，商定由张镜白负责与地下党保持联系。武汉地下党员李芬、刘时学也先后携带密电本来到六九四团驻地调弦口，并代表康、张到江北江汉军区联系，以备万一事泄，即可立即渡江起义。华中局社会部也派谭士元、张大平前来策反。

刘绵在武汉行辕担任总收发和监印官时，与康朴、张镜白接触比较多。二三二师调湖南后，张立武、刘绵分析认为该师是所谓杂牌军，在蒋军内部受到排挤，加之中央军李默庵、宋希濂所部先后驻防常德，霍揆彰所部驻岳阳，对其左右两侧构成威胁。在解放军大军已逼近武汉的态势下，只要抓紧做好策反工作，康朴、张镜白率部起义的可能性较大。张立武遂派刘绵去湖南华容策反康朴，并交致江汉军区手书一封给他，嘱其相机联系。

1949 年 3 月，刘绵只身经岳阳，过洞庭，坐船来到华容县二三二师师部，对师长康朴、副师长张镜白进行策反。早已打算率部起义的两位师长见旧友代表长沙地下党来劝，几番试探后，康朴表达了起义决心并委刘绵以军职留在师部。刘绵趁机对原来认识的武汉行辕警卫团一些中、下级军官进行策反。

为了落实康朴率部就地起义的计划，刘绵持张立武手书过江联系江汉军区三分区李人林部，带回该军分区张翼宽司令员敦促起义的帛书、联络信号、电台呼号以及解放军接应方式。张司令员要求康朴将隔江驻扎的二三二师拉过江到三分区去。刘绵立即返回长沙向张立武汇报。特支研究后认为：康部如单独起义势将过早暴露程潜、陈明仁起义的企图，二三二师作为长沙绥署保卫程潜的直属部队，要服从大局，应与长沙同时行动，

不宜单独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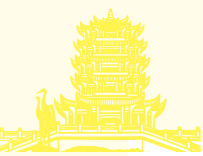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康朴、张镜白听从了刘绵转达的特支意见，一边加强干部训练和对官兵的教育工作，先后举办了三期干训班，派李醒吾负责干部训练，使全师官兵的政治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一边作起义准备。6月下旬，程潜命令二三二师编入陈明仁兵团七十一军，开至益阳、安化一线进击姜亚勋部，驻师的中共人员刘绵、韩炳新、蒙养正均偕行。7月中下旬，部队一部开到长沙岳麓山附近地区，一部在株洲集结。8月4日随程潜、陈明仁起义。二三二师起义后没有发生叛逃现象，还参加了解放湘潭的战斗。

刘绵在完成二三二师起义策动工作后，又接受了新的任务，赴株洲指导第十一兵工厂警卫大队大队长王鉴岱率部起义。

王鉴岱在国民党武汉三十兵工厂任中校警卫大队长时，结识了胡原，并与陕西老乡刘绵私交较好。武汉发生党组织遭破坏的红十字补习学校事件后，胡原从武汉市工委转移到长沙特支，隐蔽在演剧六队联华剧院内。不久，王鉴岱也随长沙绥靖公署抵湘，旋即被派往株洲第十一兵工厂担任警戒任务，任全部美械装备的警卫大队大队长。

1949年2、3月间，刘晴波在谈话了解情况时得知胡原与王鉴岱有联系，遂派胡去做王的策反工作。正在寻找中共组织的王鉴岱见胡原前来，十分高兴，当即表示了起义决心。胡原建议王先不要贸然起义，待联系上湖南省工委领导的姜亚勋武装队伍后再相机举事，向姜部靠拢，王表示赞同。因特支与省工委没有横的联系，胡原只得到宁乡寻找姜部。正值白崇禧派兵“围剿”，姜部转移到了安化一带，没有找到。与此同时，王鉴岱也改善士兵生活，发蚊帐、发胶鞋，为起义做准备。正在筹划期间，特支急调胡原去湘潭组建湘中游击纵队，胡即将协助王鉴岱起义的工作转托给特支下属的演剧六队党支部。

同年夏，长沙特支下属的演剧六队党支部决定派田元接替胡原。田元到达位于株洲五里牌的十一兵工厂时，保定军校出身的王鉴岱对这位不懂军事的年轻人感到失望。正在此时，白崇禧命令王鉴岱率部随十一兵工厂南迁海南岛，还派出一个军统小组驻厂监督搬迁。情况紧迫，张立武立即



指示刘绵赶往株洲指导起义。

王鉴岱见武汉行辕的老同事刘绵到来，喜出望外。两人立即研究了行动计划和实施步骤，决定放弃投奔姜亚勋部计划，将队伍拉到解放军进军方向之平江地界。为迷惑厂方，自即日起部队每晚全副武装实施夜间军事演习。连续演习3个晚上，到第4个晚上，趁敌人不注意，全队官兵200多人连夜拉出株洲北进。走了一通宵，天色微明之时，队伍在一个山坡下集合起来，王鉴岱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部队。

次日凌晨，部队按计划穿过长沙至浏阳公路向平江前进，当进至离公路约3里路时，发现国民党部队占据交通要道。熟悉国民党军队内部情况和指挥官姓名的刘绵和穿着国民党军装的王鉴岱走在最前面，指挥部队以战斗队形闯过两道敌岗哨，从敌营部门口通过，顺利到达平江。刘绵、王鉴岱宣布起义部队改编成湘北人民游击支队。

游击支队在平江地广人稀之处遇到极大困难。刘绵在三十来公里外联系上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解决了给养困难，演剧六队也派美工、新青社员周令谟前来协助。周化名郑寿衡，任游击支队指导员，做思想政治工作，稳定了部队的情绪。长沙解放前夕，湘北人民游击支队在长沙远郊金井被解放军正规部队收编，刘绵、周令谟返回长沙。第十一兵工厂职工也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挫败了敌人的南迁阴谋，保住了工厂设备。新中国成立后，第十一兵工厂扩建成株洲三三一厂。

胜利会师奏凯歌

1949年6月，解放军进入湘境，湖南和平解放形势渐趋明朗。周里书记领导下的湖南省工委已发展成为中共在湖南的一支主要力量，长沙特支作为应变队伍的必要性已经消失。在重庆《挺进报》事件中只身脱险到达武汉的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是湖南长沙人，因而被钱瑛选中，委托他赴长沙传达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

6月27或28日，洪德铭到达长沙。第二天，洪在省工委会议上传达了华中局的指示。省工委根据华中局指示精神，作出了立即通知有关地方

停止武装起义和袭击敌人的部署、停止发展新党员、长沙特支合并到长沙市工委等五项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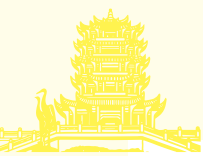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洪德铭也找到刘晴波，在长沙特支会议上传达了华中局的指示。

7月1日，两支地下党开始合并，合并后的党组织仍称长沙市工作委员会，沈立人任书记，刘晴波、胡鹏、邹得心任委员。

合并后，除张立武率军事策反工作组大部分成员（曾昭森等除外）一起调省工委军事策反组外，在长沙的其他特支党员全部转到长沙市工委。刘晴波兼任市工委机关团体工作组书记。特支在长沙市的其他党员并入市工委相应党组织。特支长沙市之外的党小组、党员和秘密外围组织并没有并入省工委，而是并入省工委所在地下属相应党组织。两支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和工人解放先锋队，以及统战性质组织新民主主义工作者联盟随之并入市工委系统，仍由前特支党员领导。

至1949年6月底，长沙特支党员约60多人，新青社员约140多人，工先队员约100多人，新联成员约300人。

1949年7月初，周里、沈立人虽与刘晴波取得联系并着手安排合并事宜，但限于当时条件，长沙市的党组织整理工作持续了约半个月，其间，特支仍独立工作。7月中旬，中共长沙特别支部结束了历史使命。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随解放军进城的中共长沙市委以长沙特支机关所在地火后街八号作为首个办公地。



特种刑事法庭内外的斗争

◆ 宋 健

1948年8月17日，一个充满白色恐怖肃杀之气的消息在国民党统治区广为传播：国民政府行政院针对中共地下活动发动“特种刑事检举”，蒋介石也发表了“告国人书”，声称共产党“在我后方煽动学校青年，开辟其所谓第二战线，并策动外围分子发动其所谓反战求和运动，以破坏我社会秩序，阻挠戡乱动员……”字里行间，磨刀霍霍，杀气腾腾，其目标直指青年学生。在此之前，国民党当局已于1948年4月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设立了特种刑事法庭来审理共产党案件，并颁布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企图以此镇压国统区内风起云涌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8年8月23日，武汉大学进步学生杨照明、吴心池两人突然神秘“失踪”。24日，进步学生唐正乾在学校附近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绑架。26日，武汉大学原学生自治会主席崔明三在黄石被捕押回武汉。一时间，宁静美丽的武汉大学校园内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26日上午，国民党汉口高等特种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陈锡时带领一名法警来到武汉大学，一口气向校长周鲠生递交了18张传票，4名“失踪”大学生的名字赫然在内，另外还有14名学生也遭到传讯。显然，这4名“失踪”学生早已遭到特务秘密逮捕，其余14名学生也是黑名单上要抓捕的对象。陈锡时言之凿凿地声称这18名学生是所谓“匪谍嫌疑分子”“职业学生”，并气势汹汹地胁迫学校立即将他们送交特种刑事法庭听候审讯，特种刑事法庭将根据他们“罪行”轻重判刑。

面对国民党当局来势汹汹的所谓“特种刑事检举”，新成立的中共武汉市委迅速行动起来。中共武汉市委学生运动工作组的负责人金本富与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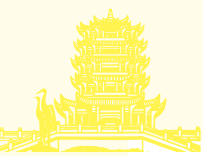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汉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吴仲炎在武昌三道街的一家茶馆接上了头，他们冷静分析形势，认为被传讯的 18 名学生大都是进行公开活动的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和积极分子，由此判定敌人的传讯并非由于叛徒告密。他们果断决定将有暴露危险应该转移的党员火速转移，并广泛发动群众，团结全校师生共同进行反传讯斗争。同时，他们还积极争取校方支持，尽可能做到未被捕的学生不出庭，如果一定要出庭，就要校方派负责人接送，以保证学生人身自由和安全。经过学生自治会出面与校方联系协调，取得了特刑庭不得抓人的保证。

由于学校处于暑假期间，留校学生不多，18 名学生中只有 6 人在校，于是周鲠生校长召开会议，决定由校方代表、教授会代表及学生自治会代表共同护送被传讯学生出庭，此外，学校还成立了由法学专家韩德培教授为首组成的“法律顾问委员会”，要求特刑庭作公开审讯，准备正式开庭时为学生辩护。

26 日下午 5 时，6 名出庭学生由护送人员陪同来到汉口高等特种刑事法庭的看守所。他们发现 4 名“失踪”的同学都被关押在这里，原学生自治会主席崔明三居然像重刑犯一样被戴上脚镣手铐。

消息传来，武汉大学留校学生群情激愤，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一方面，学生自治会与校方联系，积极营救被捕学生；另一方面，由校方出面与看守所交涉，要求其不得虐待在押学生。同时，学生们轮番组织去看看守所探监，送去食物、用品，慰问被捕同学。周鲠生校长也顶住敌人的施压，多次拒绝敌人无理要求，坚决抵制就地逮捕，积极营救被关押的学生。

国民党特刑庭虽然煞费苦心，但因始终拿不出“匪谍嫌疑分子”的证据，慑于社会舆论压力，最终不得不把关押的学生“交保释放”。对于尚未到校的 8 名学生，特刑庭仍然坚持要传讯，并扬言如不到庭，便下令通缉。校方一方面与敌巧妙周旋，一方面严词拒绝“就地缉拿”学生。经过谈判，校方承诺开学后送 2 名返校学生出庭。然而，在开庭后，特刑庭仍然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审讯仅花了 20 分钟便草草收场。虽然他们给这 2 名学生强加了“破坏秩序，危害民国”的罪名，但最后还是当场释放了这 2 位学生。



中共武汉市委在被传讯的学生得到释放后，立即将他们大多数人安全转移到解放区。事后，国民党中央党政干部联席会议秘书处对特刑庭这种处理方式极为不满，他们在给中央司法部一封密电中指责汉口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对武大奸匪嫌疑学生……并未通知本会即径行交保释放”，要求“嗣后处理与本会有关奸匪案件，应先征询会议意见”。

特种刑事法庭传讯事件平息不久，1949年1月14日至15日，国民党军统特务又在武昌戈甲营16号秘密逮捕了查家骧、金忠恒、杨振华等准备前往解放区的7名武汉大学学生。关押期间，国民党特务多次对他们进行审讯，使用了威逼利诱各种手段，但这7名学生没有一人屈服。

16日晚，杨振华的弟弟赶到武汉大学报告了7名学生被捕消息。中共武汉大学总支闻讯后，立即通过学生自治会和院系联合会召开全校同学大会，决定全校罢考以示抗议。学生自治会代表还请周鲠生校长出面营救。于是周鲠生亲自给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打电话，并派人与学生代表四处奔波，查询被捕学生下落。几经周折，他们才得知7名同学均被关押在武汉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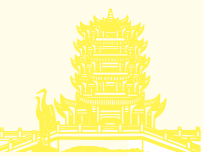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党总支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推动社会知名人士进行营救，并举行记者招待会将此事向社会公开，以公开营救活动揭露敌人的秘密逮捕。

1月19日，学生自治会以武汉大学全体同学名义致函《大刚报》。第二天，《大刚报》全文登载了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来函，并发表了全校学生罢考消息。《新湖北日报》也以“武大学生罢考3天”为题发表了消息。

20日下午，由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在蛇山奥略楼举行记者招待会，由学生自治会主席孙宗汾等4位同学主持，武汉多数报社记者到会。武大教授、讲师代表何定杰、赵子培参加，省议会副议长艾毓英也到会。虽然会场外面站满了军警特务，但学生代表毫无惧色，详细介绍了7位同学被捕情况，并散发了《告全国同胞书》。第二天，《大刚报》不顾反动当局禁令，发表了“武大招待各界，报告学生失踪经过”的消息，23日又发表了国民党地方元老张难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致白崇禧的函电。这一连串关于7名大

学生被捕的新闻报道，将敌人秘密逮捕学生的暴行公之于众，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周鲠生、李书城等知名人士都纷纷出面为营救被捕学生奔走。武汉大学党总支还组织同学募捐，发动同学探监，使被捕同学大受鼓舞。经过几番较量，国民党当局最终因证据不足，在社会各界压力下，不得不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

营救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全校学生的士气，《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响彻校园，在武汉大学党总支和武汉地下党组织领导下，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满怀信心和希望投入了迎接武汉解放新的斗争中。



变国民党的报纸为共产党的喉舌

◆ 刘桂芳

在迎接武汉解放的斗争中，新闻战线的舆论战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解放前，武汉新闻界情况非常复杂，全市有一二十家大大小小的报社，几十个形形色色的通讯社，其中有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和《武汉日报》，有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的《华中日报》，有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的机关报《新湖北日报》，有国民党国防部办的《和平日报》，还有特务、流氓、恶霸市侩们办的专门制造反动谣言或海淫海盗、敲诈勒索的黄色小报和通讯社。其中有一家国民党官僚、特务、青红帮头子合办的反动通讯社，却变成共产党的喉舌，实在是匪夷所思。它就是前导通讯社。

城工部掌控通讯社

前导通讯社是官商合办的一家通讯社，成立于1948年3月，附设在时运股份有限公司开设的均义盐号内，位于汉口中山大道汉安里21号。当时著名的流氓头子杨庆山、“华中剿总”运输司令吴某都是公司的股东。社长魏绍征是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新闻处处长，又是中统特务，平时不大管社务。副社长徐鉴良是均义盐号总经理，只顾做生意，不懂新闻业务。主编柳传经操纵社内大权，他过去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过，姑父是武汉行辕少将，魏绍征对他十分信任，委以“全权代表”。

前导通讯社自成立之日起，内部就存在着斗争。柳传经一伙极力拥护国民党的“戡乱剿匪”政策，竭力为反动派呐喊助威，污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副主编周香奎，记者吴世勤、石嘉棣等倾向进步，主张揭露腐败政治，实现公正舆论。

1948年9月，正当全国解放战争如火如荼进行之时，中共京应县委城工部派遣胡安涛到汉开展地下工作。控制、利用报刊和通讯社等公开的舆论工具，机智灵活地开展宣传工作，是各级党委城市工作部发动宣传攻势的一种独特方式和重要手段。胡安涛与周香奎是挚友，学生时代合办过《夏风》等进步文艺刊物。经过多次接触、交谈，胡安涛于1948年10月把周香奎发展为地下城工人员。随后通过周，又把吴世勤、石嘉棣发展为地下城工人员。京应县委城工部长王有学要求：尽快掌握前导社为我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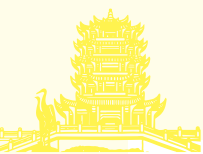


京应县委城工部长王有学

掌控前导社，最大的障碍是柳传经。恰在这时，辽沈战役结束，形势发展对我方十分有利，魏绍征忙于逃难，柳传经姑父从南昌来电，调柳传经去南昌日报任职。两个最大的障碍解除，剩下的就是副社长徐鉴良了。徐是个商人，政治倾向并不明显，面对全国形势，对前途充满忧虑又举棋不定，不知自身出路在哪里。徐当时居住在流氓头子杨庆山的公馆楼下，胡安涛、周香奎为了争取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夜到徐宅密谈，宣传党的政策，打消他的疑虑。最终争取到徐为我党工作。至此，前导社大局被我城工人员掌控，前导社成为京应县委城工部的一个地下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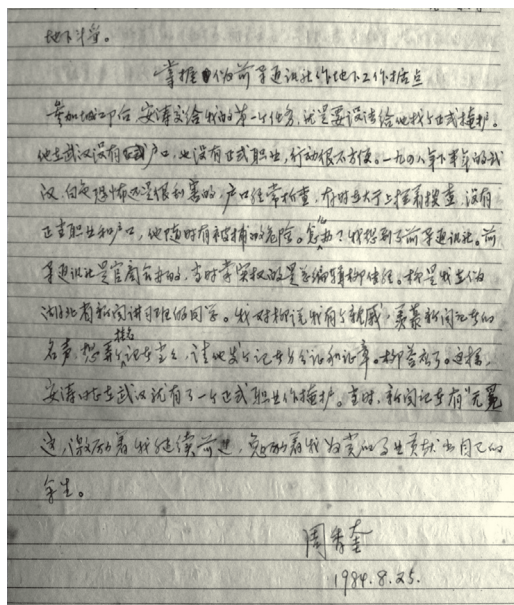
拦截银元

城工人员利用前导通讯社政治背景复杂、消息灵通的特点，披露了许多国民党当局的内幕。1949年1月11日下午，周香奎到中央银行采访，一个职员偷偷告诉周，库存全部银元正在对面民生第一码头装船过江运往广州。周马上赶到现场查看，见确有其事，就地作了采访。回前导社



后，周向胡安涛作了汇报，胡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自己发消息稿揭露和打击敌人；二是把消息透漏给其他报纸，尤其是大报纸，各种报纸都发消息的话，声势大，也可以掩盖消息来源，避免麻烦。于是，周把消息透露给了《大刚报》和《武汉日报》，其他人也分头行动，四处传播消息。

第二天，武汉各大小报纸都在头条位置刊登了同一则新闻：国民党把



城工人员周香奎亲笔写下的关于在前导通讯社开展地下工作的回忆

用金圆券从人民手中兑换来的银元 400 余万运往广州。其中《大刚报》的头号子标题是：“国家银行动摇人心，库存金银全部运走！本报讯：汉口中央银行昨日已将前存之银元四百余万枚运往广州，由该行钱副经理亲自押运。闻是项银元系前（十）日由央行通知各家银行，将库存之银元全部集中该行，当晚在央行对面民生公司第一码头装在木船上，然后运往粤汉码头的。又讯：央行昨日运走的银元为留存武汉的最后一批。

第一批系黄金，由该行经理杨汝梅及金管局长陈言押运走的。第二批为白银，在本月初由该行副经理刘重岳押运，故本市央行已无金银留存，恢复金银存兑已完全绝望。”

这条新闻准确、具体，有时间，有地点，有数目和具体的押运人员。消息一出，全市哗然。几个月前，国民党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收缴民间真金白银，做“戡乱剿匪”之用；后来又搞“金银存兑”，仅汉口中央银行就发出临时存兑收据五百多两。现在金银偷偷被运走，人民的怒火彻底被点燃，同时国民党假求和、真备战的面目也暴露无遗。若真想求和，

又何须把库存金银私下运走？这条新闻从政治上、经济上都重创了国民党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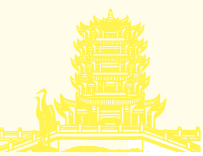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当天，白崇禧即以华中“剿总”的名义召开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说：当此非常时期，社会亟需安定，各报刊载如此刺激性新闻，白某深表震怒。会上汉口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袁雍主张清查国库，中央银行杨汝梅坚决拒绝，吵得不可开交。在中央银行存有金银的储户成立了“索债团”，向中央银行索还黄金。准备运往广州的400余万银元，当天被迫从粤汉码头运回。

泄露军机

1948年12月间，吴世勤在警察分局采访时，在办公室看到一份国民党国防部保防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的机密文件，见私下无人，他赶紧抄了一份。内容是：马上要在武汉地区进行大清查、大搜捕，动员一切武装力量，分区分段清查户口，监视社团活动，加强“肃奸组织”，处置可疑人物。

吴回前导社汇报后，胡安涛、周香奎认为时间紧急，来不及转送上级组织，但必须把消息尽快披露出去。但是消息一旦披露，敌人肯定会追查，得做好保全自己的措施。吴世勤很机智，他把消息透露给了《中国晚报》的记者，叮嘱他不要说出消息来源，只说是警察局传出来的。《中国晚报》当晚就见了报，前导社当晚也发了稿。第2天，有几家报纸刊登了此消息。

当时，正是敌人“假求和”的关键时期，白崇禧也通过湖北省参议会发了“假和平”声明。搜捕共产党的这个消息一经披露，等于打了白崇禧的脸。当天，华中“剿总”就派人到前导社追查消息来源。前导社说是从《中国晚报》抄的，追查到《中国晚报》，他们又说从警察七分局办公室抄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记者都知道警察七分局局长跟市警察局局长是同乡，又是军统嫡系，市警察局清查这件事肯定会留些情面。最终《中国晚报》《建国晚报》两家晚报因“泄露军机罪”停刊三日，警察七分局局长袁守中记大过。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前导社利用“后台硬”的自身条件，经常印传单，对国统区人民进行政策宣传。1949年2月，社里的人发现对面平台上时常有人向这边张望，加之有汉安里来了特务机关的传言，大家都十分担忧。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收听广播和刻印传单的工作得赶快转移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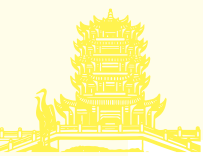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全市都在国民党统治下，哪里有真正安全的地方？徐鉴良提议到他家里去，他家就在杨庆山公馆楼下。杨庆山这个流氓头子，双手沾满血腥，专门为军统、中统逮捕、屠杀共产党员，任谁都不会想到有人敢在他眼皮子底下搞事情。大家经过商议，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于是决定就这么办。

杨公馆是“三保户”，一不受监视，二不查户口，三是军警宪特不搜查。杨庆山这条恶狼倒成了大家的“保护伞”。每当室内收听解放区广播、刻印共产党传单时，徐鉴良的妻子汪超英就在门口把风。有次大家正在卧室内工作，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大家都非常紧张。汪超英人在客厅，镇定自若地打开门，见是杨庆山的七姨太站在外面：“老头子回了，三缺一，快来吧。”原来是杨庆山要请人打麻将，大家虚惊一场。汪超英毫不迟疑，直接跟着七姨太上楼打牌去了。就在徐鉴良家这个据点，地下党刻印了大量的传单散发出去。

除前导通讯社外，地下党掌控的其他报刊、通讯社表现得很出色。例如：1949年2月18日，《新湖北日报》以上海特讯方式发出了“金圆券寿命已濒结束”的消息。2月26日，该报又以南京特讯的方式发出了“金圆券面临崩溃危机，传政府可能发行硬币”的讯息。当时国民党政府全靠印纸币骗取人民钱财开支内战经费，哪有金银来制造硬币？这些消息简直是金圆券的一道道催命符。后来金圆券已成废纸，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要省银行研究改发“银元券”来替换“金圆券”。这简直是笑话，金圆券都成废纸了，又想拿“银元券”来骗人。华中经济通讯社的同志听到这个机密消息，认为这是敌人在穷途末路之际想再捞一把。3月12日，华中经济通

讯社以上海来电名义，发出“通货如此恶性膨胀，每天发十三亿还在闹钞票荒”的电文，弄得国民党当局十分狼狈，再也难以议论这类事情。

面对这些受共产党影响和控制的报刊、通讯社所发起的宣传攻势，国民党当局既恨又怕，总想将其置之死地。例如：1949年4月下旬，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情报宣传处曾威胁和警告《大刚报》的负责人说：“你们《大刚报》最近办得跟共产党的报纸差不多了，如果你们再这样办下去，那就干脆把你们送到共产党那边去好了。”尽管如此，这些受党影响和控制的报刊、通讯社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方针，继续开展宣传工作，只是斗争的方式和策略比以前更为灵活、更加巧妙了，使敌人无计可施、无可奈何。



真和平还是假和平

◆ 刘桂芳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连续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内外交困的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境地。国民党桂系将领白崇禧坐镇武汉，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副总统李宗仁遥相呼应，企图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和平攻势”，逼蒋介石下台，然后由桂系出面收拾残局，与共产党谈判，实现划江而治。与此同时，武汉的一些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也在极力呼吁和平，试图寻找一条能尽快结束战争、减轻人民痛苦的和平途径。饱受战乱之苦的武汉人民此时也表现出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在多种因素和各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一场席卷湖北和武汉地区的和平运动于1948年底迅速兴起。

酝酿和平运动

湖北和平运动起源于1948年秋。当时，武昌有个“十人座谈会”的组织，其成员主要有周杰、贺有年、许莹涟、胡忠民等人，大都是湖北省议会的参议员和社会贤达人士。该组织利用周杰任校长的蕲青中学，每周六举行聚会，座谈时局，交流思想。参加的人尽管各自背景不同、动机也不一致，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及中共武汉秘密工作人员的暗中指导，通过座谈，互相砥砺，逐渐形成了共识，决心为停止内战，争取国内和平而努力。为达这一目的，他们决定在省参议会上公开呼吁和平，倡议和发起和平运动。

1948年11月，湖北耆宿李书城在家中举办酒宴，宴后与湖北省议会副议长艾毓英（实际主持参议会工作，此时已接受中共江汉区委城工部

余杰的指导)谈到时局时,艾说:“现在战火快要烧到武汉了,对时局如何看法,您老也有言责。”李说:“现在武汉是白健生(白崇禧别字)的天下,战争与和平关系白健生的命运,不把白健生掌握好,那就一切谈不上。”于是,二人相约第二日下午去拜访白崇禧,探探他的口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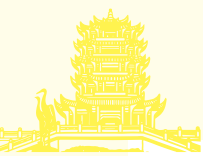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第二日下午,李书城、艾毓英、耿伯钊三人同行去见白崇禧。当艾毓英与白崇禧单独在书房谈话时,艾说:“我们想发动和平攻势,让蒋先生尝尝舆论压力的滋味,好退位让贤,一新耳目,不识白先生以为如何?”白说:“我一定大力支持”。艾说:“我们所希望的支持,还不仅是精神力量的支持,还想进一步得到物质力量的支持。只有舆论和实力双管齐下才能相得益彰。白先生你以为是不?”白斩钉截铁地说:“我同你分工负责。你用议会发布通电,呼吁和平,表示人民的意愿。我用军事力量严密戒备,以保证绝对的安全。”

拜访白崇禧后,李、耿二人回家,艾毓英又去蕲青中学拜访周杰。艾说:“现在烽火燎原,武汉恐转眼就要波及,参议会毕竟是民意机关,负有言责。形势迫使我们为人民呼吁和平的必要。议会不休战不行啊!大局不能不顾呀!”周说:“你真的敢这样做吗?如若果真如此,我举双手拥护。”艾说:“议会这个讲坛,毕竟是要口头,而不能靠拳头的……不但要您举手支持我,还要您动口支持我,在会上排难解纷,仗义执言。”周说:“好,看情况尽力去做。”

发出和平“艳电”

白崇禧因个人目的,对省参议会发起和平运动表现得分外热心。1948年12月初,白派华中“剿总”副司令、桂系骨干李品仙(李书城的学生)到武昌珞珈山拜访李书城,向他说明蒋介石打内战毫无胜利希望,和平乃是全国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如果本地士绅肯起来呼吁和平,各省人民将纷纷起来响应,可以凭全国人民的意志,强迫蒋介石停战言和。如他违背民意,则可联合各省军民迫令他辞职。”

李书城与周杰仔细揣测白崇禧的用意,是要藉和平运动来强迫蒋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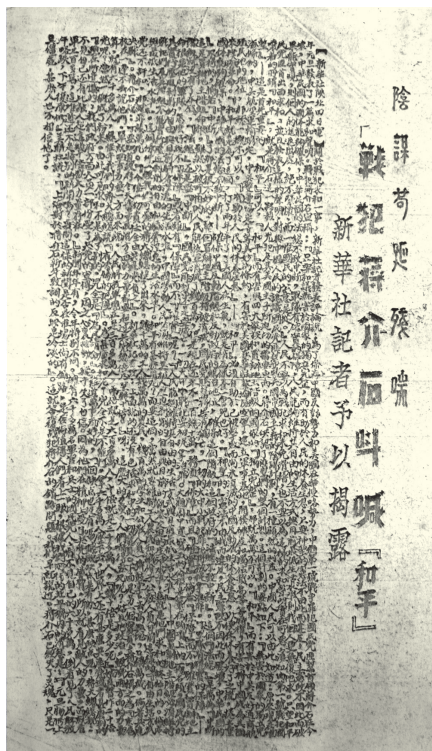


辞职，好让桂系李宗仁继任总统。虽然他们谁也不愿意为白的阴谋效劳，但若是利用蒋桂矛盾发动局部和平运动，则有可能推动湖北、武汉和平解放，两人遂商定以省参议会为基础，邀约各界人士，并请张难先等年高德劭、素有清望的湖北元老参与其事，以资号召，发起组织一个和平促进会，推动湖北和平。

在多种因素的促动下，1948年12月29日，湖北省参议会第一届第六次全体大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周杰等几位参议员提出的促进和平临时动议，由艾毓英执笔起草《致南京蒋总统电》和《致毛泽东先生电》，送白崇禧审阅后发出（即所谓“艳电”）。通电向蒋介石指出，“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求蒋介石“遵和平救国之遗训，循政治解决之常轨，觅取途径，恢复和谈”。至此，

在武汉酝酿已久的“和平运动”终于以民意代表机关的“合法”形式出笼。白崇禧还于12月24日和30日两次致电蒋介石，呼吁和平，逼蒋下台。

湖北省参议会的通电发出后，立即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河南、湖南、广西、安徽、江西等省立即响应，积极推进和平运动。1949年元旦，穷途末路的蒋介石决定以退为进，发表了要求和谈的《新年文告》，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毛泽东随即也发表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和《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了蒋介石“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和反动性，同时表示为尽快结束战争，减轻人民痛苦，愿意与国民党在八项条件下举行谈判。



地下党印制的新华社评论揭露国民党“假和平”阴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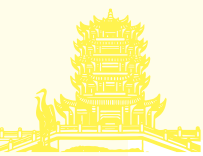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1949年1月16日，在湖北省议会的原址上，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宣言》《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简章》，要求国共双方“接受人民的要求，停止战争的行动，立刻拿和平答复人民，把和平付给人民”。提出双方立即就地停战；立即停止征兵征粮，停止都市设防；立即释放俘虏和政治犯；立即保障言论自由，容许书报流通等四项最低限度的要求。大会还选举了39名干事组成干事会，并推举李书城为和平促进会主席。

李书城访问解放区

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成立后，李书城、李伯刚（秘密党员）征得白崇禧的同意，带上白崇禧的密信于1949年1月23日离开武汉赴解放区，与共产党谋求和谈。

李书城一行经信阳、驻马店等地进入中原解放区，沿途受到了解放区军民的热情接待。李书城一行2月中旬在归德会见了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向解放军转告湖北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并介绍了白崇禧和蒋介石的矛盾，以及白崇禧对中原战场“局部和平”的态度。刘伯承、陈毅向李书城等询问了白崇禧在武汉的情形以及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的工作情况，对李书城等为人民和平愿望远道北上表示欢迎，并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们：“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全中国，不能让大小军阀割据中国领土，与解放军对抗。国民党军政人员必须放弃地盘思想，退出所占据的地方。其军队必须交解放军改编……不能原封不动。”刘、陈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桂系在南京的做法，恐还想窃据南京的旧摊子，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与解放军对抗。”要求李书城等返回武汉后，联合本地爱国人士，力图在战斗期间设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防止敌人破坏。李说：“在解放区的一个月，使我大开眼界——官兵、官民之间和谐相处的关系，与国统区完全不同！我回去以后一定把所见所闻和二位将军的指示，告知父老乡亲！”

在解放区，李书城还阅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将



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并实地考察了解放区的社会状况，有豁然开朗之感，觉得受益匪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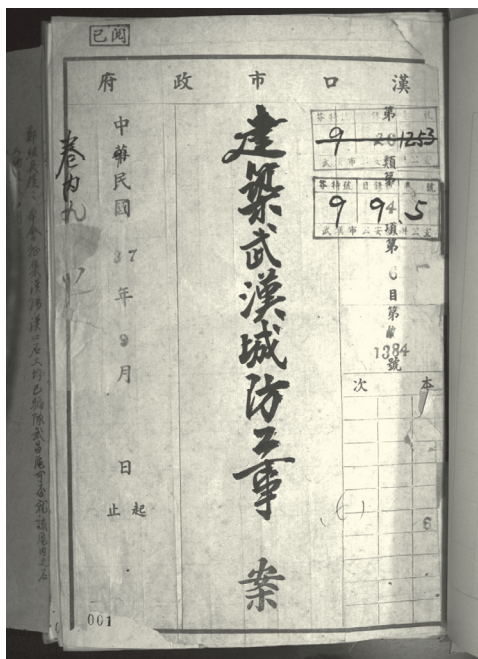
白崇禧撕下“和平”伪装

在李书城一行访问解放区之时，武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白崇禧支持“和平运动”，是出于桂系倒蒋的目的。蒋介石1月21日宣布“引退”，桂系李宗仁上台“执政”后，白崇禧见倒蒋的目的已经达到，便撕下了“和平”伪装。

2月中旬，白崇禧在汉口举行的“和战问题研讨会”上公然声称：和平绝不可幸致，应确知可战始可和，能战始能和，应备战以谋和，勿求和以忘战。在发出战争叫嚣的同时，白崇禧还命令成立武汉城防工事委员会，在武汉市郊大修城防工事，限令从3月23日起10日内完成汉口、汉阳外围及核心城防工事修筑，并逼迫汉口和武昌商会以及汉口市政府缴纳大量

银元，以补充军费。他还密令驻汉口的工兵团做好炸毁鄂豫交界处平汉铁路武胜关隧道和信阳附近长台关淮河大桥的准备，企图阻止解放军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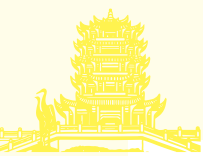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待李书城等从解放区返汉后，白崇禧已闭口不谈和平，也拒绝听李书城等人北行的汇报，而是全力备战。李书城回来后受到多方邀请，先后在省参议会、武汉大学、华大、国师、中华等大专院校做公开演讲并招待记者。武汉市委书记曾惇建议他多讲讲解放区情况和党的政策。李书城在解放区与国统区两个世界、两种



国民党当局在武汉建筑城防工事防范解放军进攻的档案

人间的对比中，向和平促进会的同仁发表感慨，自己过去“终未跳出英雄革命的圈子而进入人民大革命的峻宇高峰”，过去对于共和国的理想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只有他“亲眼目击的‘解放区’，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的人间乐园”。李书城极力以自己在解放区亲眼所见的人与事，向和平促进会同仁全面介绍解放区这一“人间乐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对时局的主张与各项方针政策。他说，“只有联合起来争取像北平一样的和平，那样才不会蒙受兵燹的灾难”，“和不成功，就只有一战，不过是一次决定性的，最后的一战罢了”。

通过白崇禧在湖北和平运动期间出尔反尔的表现，武汉人民和湖北的元老耆宿、爱国民主人士们都看清了国民党当局假和平、真备战的本来面目，认识到只有人民革命彻底胜利的一天，才是真正和平到来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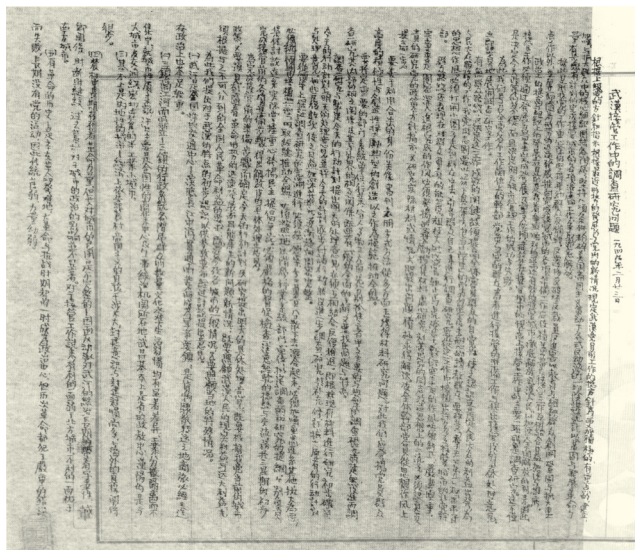


“八仙过海”与“无孔不入”

◆ 宋 健

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今为北京）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入城仪式。九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电令第四野战军组建12万人的先遣兵团，挥师南下威逼武汉。在此之前，江汉军区部队2月2日在武汉西面打响了荆（门）当（阳）战役。春雷般的炮声，宣告了武汉解放的时刻已经临近。

为了迎接武汉解放，顺利接管这颗“华中明珠”，中共武汉市委和各级城工部都接到了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开展调查研究，详细了解武汉社会经济状况，摸清城市“家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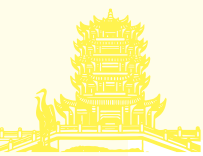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1949年2月23日，中共武汉市委印发《武汉接管工作中的调查研究问题》文件



中共武汉市委和城工部人员组织收集武汉情报，秘密送回解放区，相继出版的刊物

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特大中心城市开展全方位、大规模调查研究，这对于处于秘密状态的武汉各级地下党组织来说，无异于虎口觅食。为此，中共武汉市委于2月23日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作出了《武汉接管工作中的调查研究问题》的决定。武汉市委系统和各级城工部系统在这一时期都纷纷行动起来，在各个工厂、企业、机关、学校、仓库等广大范围内，利用合法身份和各种关系，对人、事、物三个方面进行深入了解，并对要害部门、重点单位设法作重点调查。调查研究内容包罗万象，包括人员、档案、账册、资产、器材、物资、房产、地产、田赋等等，以及武汉的官僚资本企业、三镇公私工矿企业、交通运输、手工业、商业流通、财政税收等各方面情况，甚至还有群众领袖、地方士绅、各界名流、党派人士的来历、家庭状况、社会关系、工作能力、住址、电话和最近动向等内容，几乎是一部关于大武汉的“百科全书”。

为了完成这一艰巨而又危险的任务，地下工作者们不得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武汉市委金融工作小组的地下党员翁和新、陈啸原（农民银行经理秘书）与在中国银行工作的何燕南，通过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和进步群众帮助，把汉口各个银行、钱庄特别是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资产、负债、库存及组织、人事、账务、表册等重要资料全部调查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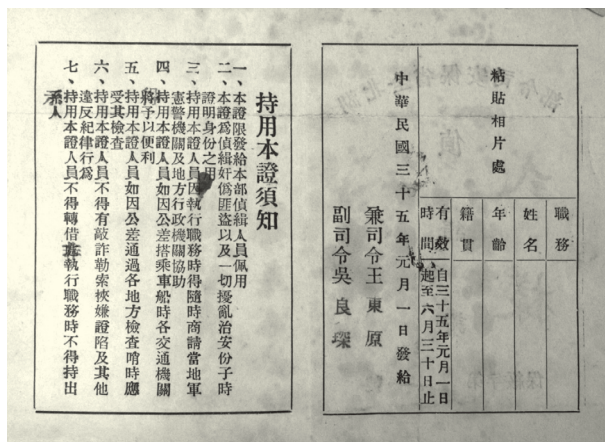
一清二楚。潜伏在汉口联合征信所的地下党员陈梦浓、龚岐山通过半夜打开保险柜暗中抄录的方式，取得了武汉各工商企业的组织人事、职工、资本、机器设备、资产负债的详细记载。汉口工业会的吴传启则利用其担任主任干事的职务之便，整理出较为系统的汉口工矿、商业基本情况和工商界人士的简历、特点等资料。

打入到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系统工作的王维章、李昌伦、孟子奇、高鹄生、李传明等人，利用各种机会暗中开展调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省政府各厅、处、局的人员、武器、政治组织情况摸清。但是，对于更为重要的核心档案资料，却一时无法获得。于是高鹄生索性设法当上了省政府委员会的记录员，这样就能及时获得第一手资料。很快，他就掌握了敌人准备向鄂西恩施撤退，打算转移重要档案、房产、田地案卷的信息。于是，他们迅速策反争取了各厅、处的一些档案人员，巧施“调包计”“障眼法”，把重要的房地产、田赋底册及省银行资产、人事档案等，用旧报纸置换出来，孟子奇则装扮成“贵妇人”，出入省政府各厅处及有关单位，进行联络协调，并暗中转移资料。

平汉铁路局江岸地区党支部的地下党员则通过职员中的进步分子编写出平汉铁路历史沿革、人员编制及技术设备等材料，对平汉铁路下属各单位的负责人，铁路系统的军统、中统特务及外围组织成员以及江岸机务段

机车停放、材料储存情况都进行了详细调查了解。

这些从各种渠道汇集到武汉市委的调查研究资料，经过整理后被秘密派专人送到香港，由上海转送北平，编入人民解放军的《城市军管手册》。



国民党湖北保安司令部为特务签发的侦缉证

在武汉开展地下斗争的各级城市工作部也是想尽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关系，使用各种手段，“无孔不入”地开展调查研究。江汉区党委城工部的关锡庚，利用他在湖北省银行任职的便利条件，借口员工联谊会要做“应变”准备，搜集了全部人事档案和财产目录。他还以索取“年终双薪”为名，清查了省银行的金银库和内账，并通过他在省邮电局、江汉关、第一纱厂、中央银行、汉口职业介绍所等单位的工作关系和朋友，搜集各单位的资料。属于江汉区党委城工部余杰领导的城工组织了解到湖北省议会有一部全省公产目录，便通过与城工部建立了工作关系的省议会副议长艾毓英以调阅档案的名义得到这部公产目录。地下党员吴先铭以省公营事业监察委员名义，借口“为了应变，摸清家底”，通过省企业委员会增派人手，公开进行调查，取得了该会所属公营厂矿企业等40余个单位的财产清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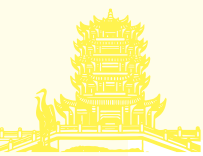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属于江汉区党委城工部余杰领导的一个党的地下工作外围组织“新政治学会”则采取“瞒天过海”的办法搜集档案资料。

1949年2月，朱鼎卿接替张笃伦出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为了方便移交手续，省政府秘书处第一科缮校室负责人调派了一位名叫陈剑函的年轻人，到“张笃伦主席移交办公室”（简称“张办”）当总收发。这一看起来十分正常的人事调动却给了江汉区党委城工部一个意外的惊喜。

原来，早在1948年11月，陈剑函就通过他的同乡、省建设厅科员柳泽民介绍，加入了江汉区党委城工部余杰领导的地下工作外围组织“新政治学会”，成为一名城工人员。他到“张办”上班的第二天，他的上线联系人柳泽民就告诉他：“你这个职务并不重要，但这个岗位太重要了！移交的档案都要经过你收发，是新旧交接的中转站”，“我要



中共江汉区党委城工部派驻武汉的城工组织负责人余杰



做点调查研究工作，需要查阅档案。你要为革命做件有益的事，那就是我要哪个卷宗你就给我哪个，下午晚一点交我拿走，第二天一早送来”。于是，陈剑函白天在“张办”清点档案办移交，晚上则向柳泽民“移交”档案，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有关建设、人事、财政、教育等方面大批档案，甚至机要密件，都源源不断地由江汉区党委城工部的地下工作者“调阅”。后来，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怀疑，柳泽民又派出一位“胡先生”作为秘密联络人，与陈剑函联系交接档案。由于这些地下工作者机警细致，手法专业，被“调阅”的档案页码、编号、卷宗都能保持原封不动，完璧归赵，因此国民党当局毫无觉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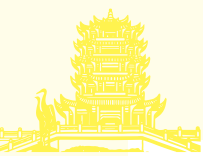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此外，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通过调查研究，编印了一本《武汉调查》。这本关于武汉的“百科全书”，在编印过程中充满了艰难曲折和危险。

1949年元月，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派遣张春阳、靳彦俊离开郑州，秘密潜入武汉指挥内线工作，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发动地下工作的同志开展调查研究。张、靳二人把中共中央城工科关于城市工作指示摘抄下来，卷成小筒装入牙膏里带到武汉，向有关同志作了传达。城工部门的地下工作者迅速行动起来，有的通过工作岗位之便调查自己所在单位；有的通过统战对象和策反关系，由调查人员通过自己的工作对象进行资料搜集和秘密调查；还有的利用新闻工作者合法身份，广泛收集各种官方资料。

来自各方面的大量材料收集后，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的方敬之、张春阳、靳彦俊、王晓鸣等人开始进行加工整理，并安排专人用薄纸进行抄录，甚至密写在物理化学笔记本和圣经上。运送这些宝贵资料到解放区则是最关键也最危险的一步。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的地下工作者有的利用自身的身份为掩护运送；有的则乔装打扮成商人、学生，把重要材料夹杂在官方报纸里运送出去；还有的利用新闻记者采访的身份作掩护运送材料。如靳彦俊就曾以《武汉时报》《合肥皖报》特约记者身份，以赴河南战地采访为名暗中运送调查研究资料。为防万一，党组织还派遣在国民党“人民服务总队”担任军官的夏国强陪同护送。他们离开驻马店北上，在进入解放

区与国统区交界地带时曾遭到地主武装国民党保安旅的盘查。但贪婪的敌兵只注意索要金银财物，从靳彦俊身上“搜”到了一枚金戒指，便高高兴兴地放行了，压根儿就没注意他们旅行袋中的各种“报纸”。

当他们把材料集中后，在城工科工作的杜子才、卢仲哲、李铁林、王绮云等人则连日连夜地进行编排印制，最终形成了20余万字的《武汉调查》，成为解放武汉和接管城市的向导和指南。



斗智斗勇 迎接黎明

——武汉解放前夕反迁移、反破坏和“保产、护厂、护校”斗争

◆ 何利平

1949年初，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政权末日已经来临，但盘踞武汉的国民党军仍垂死挣扎，他们不愿让武汉完整无损地落入共产党之手，决定撤退前对武汉进行大掠夺、大破坏。武汉人民在地下党组织和各级城工部的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广泛团结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反迁移、反破坏斗争，为保护城市迎接解放做好了各项准备。



国民党军坐船南撤

毁城计划残忍毒辣

黎明之前，天特别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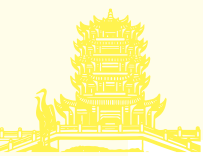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盘踞武汉的白崇禧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为了保存实力，早就在准备撤离武汉，退守老巢广西。临近撤退前，他在武汉签署命令颁布“十杀令”，严防“造谣惑众”，“泄露军机”。

5月8日，白崇禧公布武汉撤退计划：第7军、第46军、第48军从汉口撤回长江以南，武汉战略物资能运走的赶紧运走，一点也不留给共产党；所有的交通设施和工厂，都必须彻底破坏，彻底炸毁，让武汉变成一座空城和废墟。

为执行这一罪恶计划，白崇禧亲召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到华中军政长官司令部，部署紧急撤退和爆破汉口公共设施事宜。白崇禧命令国民党58军尚在汉口担任守备的部队立即全部撤到江南，把包括堤防、水厂、电厂、电信大楼、码头在内的重要公共设施和已经来不及搬走的工厂设备统统炸掉；第58军已经过江的部队则沿长江江堤，边撤边向驻守金口的张轸部进逼，以阻挠其起义。

国民党当局在市区发布特别戒严令，对武汉实行军事管制，强迫机关、工厂、学校、银行紧急搬迁，并借机以“副秣差额费”“敌伪房屋奖券”“珠宝奖券”等巧取豪夺，搜刮勒索武汉人民。武汉警务司令部稽查处用心险恶狠毒，开列出黑名单，准备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实施大逮捕、大屠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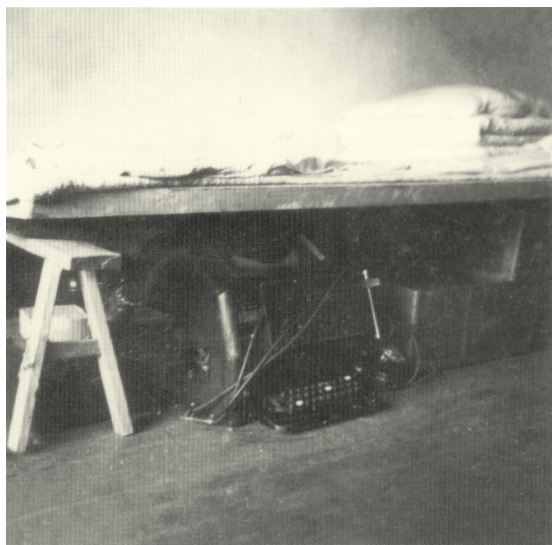
5月14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先头部队强渡长江，直插黄石、大冶，武汉敌军南逃退路即将被截断。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在仓皇弃城南逃之际仍想实施毁城计划。5月15日，鲁道源部开始破坏江汉关码头的各大趸船，爆炸之声全市可闻。大街小巷盛传当天要提前至下午5时戒严，各处人心惶惶，商店纷纷关闭。



市委全会周密部署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处于地下状态的武汉市委于4月19日秘密召开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为保护城市度过青黄不接进入接管而斗争》的报告，确立武汉解放前夕地下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反迁移、反破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而且市委根据有关情报获悉：一、汉口外围无险可守，敌人担任武汉守备的鲁道源部可能放弃汉口、汉阳，据守武昌一隅，武汉三镇有可能被分隔成两处；二、敌人已作好迁走重要机器设备和破坏工厂、码头、堤防、电信局、水厂、电厂的部署。所以，市委决定调整党的领导，建立武昌分委，在江南、江北分设两个指挥部，分头领导，以便在敌人封江隔离的情况下，能各自单独作战。随后，市委以鄂南电厂为中心将武昌分为8个区域进行联防，在汉口以武汉电信局为中心分为上、中、下3段组织联防。会议要求进一步深入发动各阶层人士，尤其是要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与敌人展开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

市委全会后，全市党员立即行动起来，把反搬迁、反破坏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在各自的单位里，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护厂、护校、保卫资财、



被武汉电信局工人们藏在床下保护起来的通信器材

保护重要档案的斗争，不让敌人破坏。尽量利用各单位的“应变委员会”公开地组织各种纠察队，增强防范力量。

武汉每个工厂、学校、机关、银行等各单位，都组织了“应变委员会”“安全互助团”“护厂、护校委员会”等合法机构，根据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要求，地下党组织提出“保产活命”“保厂护

产”“团结应变”“上下一致，保护城市”等响亮口号，发动工人要求发给加班费、迁移费、安家费和遣散费，给敌人“出难题”，组织群众进行保产、护厂、护校、保护城市的斗争。

齐心协力保护城市

反迁移斗争首先从军事工厂开始。早在1948年底，白崇禧就下令武汉被服总厂、三十兵工厂、江岸铁路局、海军造船厂、汉阳船舶修造厂、汽车修配厂以及其他军事工厂向广西、海南岛等地搬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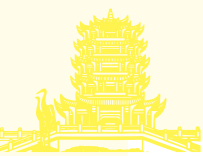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武昌三十兵工厂的工人们接到搬迁命令，先从汉阳搬到武昌，接着又往广西搬，一路受苦，东西也丢得差不多了，回来的工人叫苦不迭。在党的领导下，工人们采取“泡蘑菇”的战术，设法与国民党周旋，消极怠工拖延搬迁，本来很快就可以把机器卸下来，装箱就可以运走，工人们磨磨蹭蹭，说这里拧不动，那里拆不开，还提出发银元作路费的条件。大家把厂部包围起来，不发银元坚决不走，把事情闹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派代表去谈判，敌人被迫发了银元。

工人们白天在军警监督下慢吞吞地拆机器，一到晚上敌人刚走又赶紧重新装上，甚至把一些废铜烂铁也装进大木箱让敌人运走。有的工人还偷偷把机器上重要部件拆卸下来隐藏好，使敌人即使搬走了机器也不能用。最后只有极少部分军工厂设备被运离武昌。

在临近解放时，三十兵工厂建立了武装纠察队，工人们从仓库中挑选出上百条坏枪，修好后发给工人纠察队使用，以保厂护厂，工人们还开赴街头，震慑妄图进行捣乱、破坏的敌人。一位老工人颇有感触地说：“修了一辈子枪，只这一回是为自己。”经过艰苦的斗争，这些军事工厂基本上都留在了武汉。

地下市委及时总结武昌三十兵工厂反迁移斗争的经验，利用“应变会”的组织加以传播。

武昌第一纱厂工人积极开展保厂护厂斗争，喊出：“机器和棉纱就是我们的饭碗、我们的命，谁要搬走，就是要我们的命！”工人们日夜轮流



守护工厂和仓库，粉碎了资本家程子菊企图运走棉纱和机器的阴谋。

海军造船厂的工人将车间、仓库都锁上，并在四周架上网，挂上“小心触电”的牌子，使敌人无法拆迁和破坏机器与厂房。

具有二七光荣斗争传统的京汉铁路工人，在时任江岸铁路地下党支部书记蔡杰的领导下，组织所有的党员、工协会员、积极分子加入保产活命委员会和纠察队。当敌人命令将平汉铁路一切物资搬迁过江时，党支部立刻组织动员保产活命委员会分头行动，深入到 13000 多员工家属之中，向大家提出“成千成万筑成的铁路就是成千成万人的生命！铁路是铁路员工的饭碗！人不过江！物不过江！钱不过江！”的口号，同敌人的破坏活动开展面对面的斗争。

火车轮渡码头的工人们立即动手拆除从江岸车站通向轮渡趸船的道岔。

国民党驻军问他们：“拆道岔干什么？”

工人理直气壮地说：“江水上涨，道岔比渡船低得多，火车咋上去呢？拆了好加高！”

机务工人通过怠工拖延修复火车头的时间，货车厂的工人下掉货车墙板，拆掉挂钩，挫败敌人搬迁的阴谋。

江岸机厂职工开展护厂斗争，派出纠察队瞭望，日夜战斗。他们把机械车间 6 台自动车床全部拆装在一节旧棚车上进行了伪装，安放在工厂比较隐蔽的地方，做随时都可以转移的准备，把一些笨重设备的重要配件也拆了下来；把比较重要的工具抹上黄油沉入工厂后面的水塘，连工厂中的吊车，所有部件和大小电机都进行了拆卸，埋放在工厂周围的草地里。这个厂不到一两天已经隐蔽、疏散一空，只剩下几台破旧车床和钳台了。

机务段的职工也日夜奋战，把敌人计划重点破坏的 14 台大功率蒸汽机车分别放在库内熄火，有的事先拖到丹水池外国人办的德士古油库和英国怡和仓库附近存放，并把这 14 台机车的摇连杆、车钩拆下，分散到大智门、循礼门、玉带门各站隐蔽；把一台最小最破的“505”机车放在机车库门口作为挡箭牌。客车所和货车场的工人把货车车皮和客车车厢甩在江边堤下和德士古油库，把所有车钩拆下，安排一些工人家属住在车上。材料厂的

工人把重要器材隐蔽在江边和草地。连桥梁厂的工人也把已经装配好了的桥梁散了架做好记号，分散隐蔽起来。这就叫敌人狗咬刺猬，无从下手，以便武汉解放后能马上用于抢修三道桥。

5月15日，厂里突然来了一伙国民党工兵，其中一副连长领头拿出大小各种炸药包向水塔上、“505”号机车轮上、机器地脚上绑扎起来，导火线也拉上了。厂保产活命委员会的值班人员连忙拉下总电闸，发出警报，厂区地下党员和工人们纷纷赶过来围着副连长讲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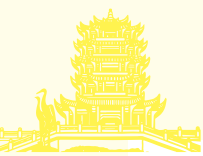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副连长说：“你们说的不错，工厂是工人的饭碗，不过这差使乃是上级所派，不来执行，兄弟也交不了差。”在一再软磨的情况下，副连长乘机敲诈起来：“兄弟我好说，来的这些弟兄，嘴巴得堵住啊！”工人们凑了几十块银元给了他们。工兵们在一片空地引爆一包炸药，拍下照片回去交差。汉口江岸地区铁路的重要设备全部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1949年春天，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密令武汉警备区制定了“长江船舶管制计划”，妄图逃窜时将江中船只抢劫一空。武汉轮渡管理处处长童伊为遵照中共武汉县委城工部的指示，接过敌人的“应变”口号，组织、协助广大职工保保护船，拒绝执行调渡轮西撤的命令。

5月14日，船员将“竹山号”“崇阳号”“随县号”“蒲圻号”等船只悄悄驶离武汉，隐蔽到武昌鲇鱼套（今白沙洲）等地，留下“兴山号”“长阳号”“汉阳号”三艘轮渡一面坚持渡江，一面作好随时跑或沉的准备。

5月15日，解放军兵临武汉城下。这时，江面已禁渡，敌人的爆炸队乘着小艇在江中横冲直撞，见船就炸。船员用棉被裹着身体，冒着密集的枪弹，驾着“兴山号”全速行驶。船行至王家巷码头时，铁驳水手长急忙招呼：“快来把铁驳拖走！”“兴山号”马上抛出缆绳，拖着铁驳驶去。这时，铁驳上的水手顾不得飞来的流弹，把敌人早就装到船上准备炸毁船只的炸药一包包投入水中。

就在“兴山号”与敌人搏斗的同时，“长阳号”“汉阳号”也摆脱了敌人，驶到武昌平湖门江中保护起来。因此，武汉解放后，三镇的轮渡迅速恢复了通航。



武汉电信局是国民党党政军通讯的要害部门，被列为重点破坏的目标，国民党撤退时，就准备把电信局的人员和设备全部南迁。南迁来不及，又多次派兵妄图将其炸毁。中共武汉市委、鄂豫三地委城工部和襄南地委城工部的共产党员、城工人员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把重要设备拆卸下来转移到职工宿舍和外商洋行的仓库等隐蔽地方，组织武装的工人纠察队“护局应变”，软硬兼施对付前来破坏的国民党军。

5月12日晚，白崇禧派了一连人把电信局包围起来，要进行破坏。赵忍安受地下市委委托，立刻赶到电信局找局长尤箕照和总工程师祝秉珩商议保住电信局。赵忍安和局长、总工程师一起研究，决定找连长谈判，给这些人一些钱试试看。经过谈判，敌连长同意并接受了200块银元。正在此时，外面传来“共产党已进市区”的消息，这是地下市委负责工运的刘实在暗中组织工人散布的，敌连长非常害怕，就急忙把一连人撤走了。

5月15日上午9时，国民党当局密令电信局当晚破坏局内通信设备。得知这一消息，全局沸腾起来，全体职工很快集中到局里，将局工人纠察队布置到各个岗位，将大门紧闭，用事前准备好的沙包堆集在门内和窗户上，中断长途通讯。

当晚，全局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晚上八九点钟，敌人派一个工兵排前来破坏，见门口工人纠察队人数甚多，严阵以待，所以未敢入内。

汉口广播电台的职工在中共江汉区委城工部的领导下，施展“调包计”，将敌人已装箱待运的电台设备截留下来，完整地保存到武汉解放，从而为武汉解放后迅速恢复播音创造了条件。

农民银行的经理比较反动，武汉党组织派其秘书、地下党组织金融小组成员陈啸原写了一封信，列举了他的一系列罪恶，要他将功赎罪。他接信后，浑身发抖，惊恐不安地说：“共产党真厉害！”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封信就是他身边秘书陈啸原所写。

汉口既济电厂、汉口宗关水厂等水电设施也是通过与敌人谈判、筹款收买敌爆破队，得以保存下来。

许多大中学校的进步师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按地区分片开展“应变”联防活动，成功地保护了学校的设备和财产。

遣走“瘟神”迎接黎明

为了让驻守武汉的国民党军尽快撤走，尽可能地减轻对城市的破坏，武汉市委书记曾惇亲自出面，请地方元老李书城、张难先出面，同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谈判。

5月14日，张难先和李书城来到武汉守备司令部，对鲁道源说：“今日我们是受三镇各界耆宿及民众之托，特来请你赴宴，并对司令提出两项请求的，即：一、与作战无关之一切建筑、设备，不得破坏；二、军队撤离城市，不得滋扰店铺，掳掠居民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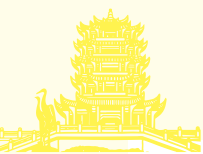
面对两位义正词严的老先生，鲁道源被逼得无路可退，只得实话相告，“二老所言极是。不过，相信二老心里也都清楚，目前，江河日下，形势日非，加之我的军队既不是蒋先生的嫡系，又不是白长官属下的主力，而今，军饷日绌，捉襟见肘，在此种种情况下，整饬军纪，实有难处。”

鲁道源公然厚颜无耻地敲竹杠，原本是地下党组织和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已经估计到了的。事先，地下党组织已通过救济委员会在汉口商界筹集了6000块银元，打算在万不得已之时，以此遣送“瘟神”。

此刻，李书城见鲁道源放出敲诈钱财的话风，为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便试探说：“那是，那是，鲁司令既然无暇出席宴会，临别之际，是当对所部表示表示。”

鲁道源毫不掩饰地摆出索要买路钱的架势，连忙追问：“多少？”他对李书城提出的3000元连连摇头，提出要30000块银元给部下发“安家费”。

张难先和李书城回到设在汉口金城银行里的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由李书城打电话给曾惇，曾惇希望能再少一点。经过交涉，鲁道源答应降到6000元。于是，曾惇通过和成银行的赵忍安找汉口市商会和工商界人士商量，用筹集的这笔钱“送瘟神”。结果鲁道源部很快就撤过了长江，在



撤退时只炸毁了江边的趸船。

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反搬迁、反破坏斗争，除了少数军事工厂被敌人强行搬走部分机器外，其他工厂的机器设备大部完整地保留下来了。武汉的堤防设施，也在各阶层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保护下，没有让敌人炸毁。英雄的武汉人民就这样在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来临的时刻，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动组织起来，驱散黎明前的黑暗，迎来朝日东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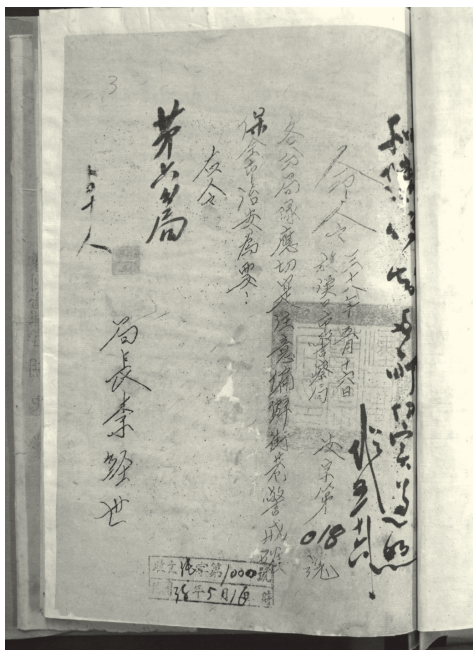
看不见的战线

◆ 宋 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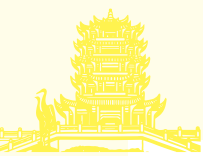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1949年春夏之交，武汉一家报纸上登载了一条极其普通的寻人启事。当时的武汉市民没有人知道，这条并不起眼的启事，背后竟然隐含着场惊心动魄的暗战。因为发启事的人使用的是一个化名，而他的真实身份则是赫赫有名的汉口特别市（以下简称汉口市）警察局局长李经世。这位地位显赫、大权在握的警察局长为何要化名登出寻人启事，而他急于要寻找见面的又是怎样一个神秘人物呢？

巧驯“野马”

看到李经世的寻人启事，在湖北省参议会担任参议员的张式训内心既惊喜又紧张。张式训是一位来自湖北潜江县的省参议员，政治立场开明，思想倾向进步，在家乡口碑较好。早在1948年，在江汉军区城工部工作的余杰就与他有过接触，后来余杰等又与省参议会副议长艾毓英建立了工作关系，并通过张式训进行联系。张式训为人谦和，平易近人，与湖北政界各方面人物都比较容易接近。因此，余杰通过张式训了解到省参议会驻会委员吴



被策反的汉口市警察局局长李经世命令警察在武汉解放时维持社会秩序



先铭有倾向进步的思想动态后，立即对吴先铭开展了策反工作。

张式训试着与吴先铭谈论“时局紧张，个人去留问题”，吴先铭表示：“我现在好像落在水里的人，如果有救生圈，我一定不走。”摸清了吴先铭的底细后，张式训即给他“送上救生圈”，吴先铭爽快地加入了江汉军区城工人员队伍，他随后又与张式训联手做省参议员郑桓武和《新湖北日报》社副社长、省政府设计委员谈瀛的工作，让他们也与江汉军区城工部建立了工作关系。

有了省参议会这些内线策应，余杰大胆地把策反工作重点目标放在了“两局三府”，即湖北省会警察局、汉口市警察局、湖北省政府、武昌市政府和汉口市政府等国民党在武汉三镇统治的核心机构，余杰要求张式训等人运用各自的社会历史关系和目前的职务，相机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弃暗投明，站在人民一边，保护城市，迎接解放。

在这些重点策反对象中，汉口市警察局无疑是一个最危险、最难攻克 的堡垒。汉口市警察局长李经世毕业于黄埔军校，但在黄埔系中饱受歧视和排挤，对蒋介石心存怨恨和不满。1948年他又投靠国民党桂系，被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委派兼任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委员。由于他既不是“中统”特务，又不是“军统”特务，在黄埔系中受排挤，在桂系集团中缺乏根基，余杰形容他是一匹独来独往、难以驾驭的“野马”。

为了攻克这个难啃的“硬骨头”，余杰与郑桓武、谈瀛等人仔细分析了李经世的处境和思想动态，决定先由与李经世三度共事、关系较深的谈瀛出面，从关心个人生活的角度对李经世进行试探。通过试探，谈瀛得知白崇禧已迫使李经世将夫人送到广西桂林，李经世对前途感到悲观，有点举棋不定。随后，李经世主动约请谈瀛到自己的住宅——汉口巴公房子赴晚宴。

就在这次晚宴上，谈瀛、郑桓武轮番向李经世展开“心理攻势”，劝说李经世认清全国解放大局已定、国民党政权面临土崩瓦解的形势，指出只有为保护城市作出贡献，为人民立功，才能取得中共方面的谅解和欢迎。李经世听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委婉地说：“事情不会那么简单，白老总

这个客人不好送，他要拉我走的。跟共产党打交道更不容易，如果碰上像邓政委那样有眼力、够朋友、够气派的人，就好办些。”随后，李经世又向谈瀛、郑恒武谈起他在鄂南与新四军邓政委的交往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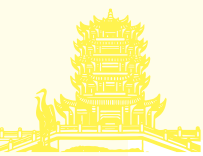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原来，李经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湖北省银行专员，到崇阳县帮助鄂南分行工作。1945年春，王震率领359旅南下途经崇阳，发现李经世家中藏有几部马列著作，在分析了李经世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情况后，对李经世以爱国人士相待，请他出席了军民联欢会并发表演讲，由此与邓少云政委相识。

抗战胜利后，李经世急于赶回武汉“接收”胜利果实，遂与军统特务头目唐新派往武汉的先遣武装小组结伴同行，不料在武昌县法泗乡被新四军截获。新四军误认为李经世是一个特务头目，便对他扣留审查，李经世百口莫辩，正在困窘之时，巧遇邓少云政委。邓政委认出李经世是在崇阳受到我军礼遇的爱国人士，立即下令释放了李经世，耐心听取了他的解释，对李经世一如既往地以礼相待。邓少云还向李经世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反复阐明了中共的路线和政策，勉励李经世摆脱旧影响，好自为之，争取光明前途，随后还特地派人护送了李经世一段路。李经世认定邓政委有眼力、够朋友，自此之后一直心怀感念。

晚宴结束后，谈瀛向江汉区委城工部驻汉地下组织负责人余杰汇报了与李经世会晤经过。李经世与邓政委交往之事，引起了余杰的重视。余杰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对李经世进行试探。

鉴于当时邓少云政委随军转战去向不明，一时无法联系，余杰便用化名给李经世写了一封信，点明“鄂南握别”，邓先生对他“仍然关怀”，要他“鉴往知来，善自抉择”。李经世接到来信后，反应十分强烈，迫不及待地用化名在报纸上登载了“寻人启事”，要求与来信人见面，这就是故事开头的一幕。

一件并不起眼的陈年往事，竟然顺利地让桀骜不驯的李经世打开了心扉。余杰为了慎重起见，又动用另一内线关系王慧闻先生，通过李经世的好友从侧面对李进行摸底，确认李经世有诚意见面。于是，余杰亲自出马



与李经世见面，声称是受邓政委的委托前来看望走访李经世的。李经世惊喜交集，对邓政委的关怀表示衷心感谢，对一切问题都作了肯定答复，明确表态愿意与中共合作，并指定谈瀛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负责与中共方面联络。至此，策反李经世的工作大功告成。

暗战武昌

在武汉三镇中，武昌在历史上曾是一座“因武而昌”的军事重镇。武汉解放前，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省参议会以及省会警察局都设在这里，因此，武昌也一直是江汉区党委城工部的余杰开展策反工作的重点区域。

1949年2月，武昌市政府接到要改组的通知。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朱鼎卿为了控制这座省会城市，直接安排自己的心腹、已经离职的原湖北省第六区行政专员蒋铭接任武昌市长。蒋铭对于出任武昌市长这个要职感到很困惑，心里很矛盾，很害怕。他认为这个市长不好当，干得好坏是次要的，主要是目标大了，怕日后共产党要算账，在就任与撂摊子之间迟疑不决。

余杰知道这件事后，认为这是一个施展影响的绝好机会，他立刻与同志们商议讨论，如何利用这次机会，让这个武昌市长成为我们的代言人和施政者。大家讨论很积极，最后决定通过关系找到蒋铭，托话给蒋铭，要他去争取当这个市长，由我们的人来配合他当好这个市长。

为了确保策反成功，余杰决定让省参议员郑恒武出面说服蒋铭。郑恒武向蒋铭转达了江汉区委城工部的意见：如果从做官的角度来看，那这个市长确实没干头，但是为了保护这座城市、利用市长这一职务，想方设法保护武昌城，使之不受到破坏，为人民立功，那就应该去当这个市长，当一个迎接解放的市长。蒋铭为人思想深沉，头脑活络，对当时形势和中共的政策看得比较透，只是思想上有顾虑，这次亲耳听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城工部指示，转忧为喜，欣然同意接受江汉区委城工部地下组织领导，就任武昌市长。为了让蒋铭吃下“定心丸”，余杰决定亲自出面与蒋铭会晤。

武昌县华林是一条融汇中西文化建筑的百年古街。明清时期，这里曾是湖北全省各县秀才下榻、苦心研读备考的地方，是清廷负责地方军事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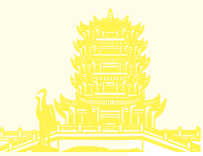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门的所在地。1861年汉口开埠后，昙华林一带逐渐形成华洋杂处、比邻而居的地域特色。

1949年2月的一天，几位行色匆匆的客人穿行在昙华林蜿蜒的小巷深处，在一处幽静的住所停下了脚步。早已守候在客厅的主人将几位迎进门，然后一起上了楼。来人就是中共江汉区委城工部驻汉地下组织负责人余杰和已成为城工人员的省参议员张式训等人，此次是专程来会见刚就任武昌市长的蒋铭。余杰首先祝贺蒋铭就任武昌市长，肯定并鼓励他站在了人民一边；同时勉励他要当好武昌市长，做好迎接武汉解放的工作。余杰还告诉蒋铭：我们城工部将全力指导配合武昌市政府的工作，只要是有利于保护武昌城，有益于人民，你只管放心大胆去干。余杰的谈话让蒋铭感受到了共产党人一心为民，光明磊落，真诚可信，给了蒋铭极大的鼓舞，使他彻底放下思想包袱，坚定了做一个“迎接解放的市长”的信心。随后，余杰确定，以后由城工部地下工作者郑桓武与蒋铭直接联系，协同蒋铭开展武昌市政府及所属部门的工作。就这样，蒋铭成为共产党安排的国民党的武昌市长。

蒋铭行事雷厉风行，刚一就任，就对武昌市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他和郑桓武根据中共方面要求“稳定部属，掌握武装，维持好过渡时期的秩序，保证完整接管”的指示精神，商定了工作方案，并立即开展部署。

首先，联络调整好各区的人事关系，将市属的各区自卫队设法调度过来为人民所用。其次，为配合地下斗争，加强职工群众保厂护厂的自卫力量。当时，武汉各工厂主要集中于武昌，几家纺织工厂在地下党和城工部地下工作人员的领导下，正在发动广大工人群众组织起来，为保卫工厂、防止破坏、迎接解放而斗争。但工人群众手上无枪杆子，一旦遭到反动敌特暴力破坏，仍然难以实行有效的抵抗，所以迫切需要枪支武装。根据下属反映，武昌市政府保存有一部分抗战胜利后接收的破旧枪支，蒋铭知道后，将这一情况告诉郑桓武，郑桓武立即汇报给了余杰。余杰当即要郑桓武让蒋铭设法把这部分枪支利用起来，拨给工人群众护厂自卫。

郑桓武赶到市府，与蒋铭紧急磋商如何将枪支弄到手，因为那时反动



派不许工人有枪。商量的结果是，蒋铭决定借敌人自己的手解决这一问题。

当时，以朱鼎卿为首的湖北省政府曾经制颁过“应急方案”和“紧急措施”，其意在充实基层“自卫”力量，加紧“组训民众”，进而达到巩固反动统治的目的。蒋铭决定“将计就计”，依据省府的“应急方案”，写报告给朱鼎卿，请以库存的枪支充实基层“自卫”力量。照此进行，果不其然顺利地获得批准。蒋铭迅即将这部分枪支转发到第一纱厂等工厂的工人自卫队和武昌商民自卫大队手中。工人、职员获得了武装，从而有能力挫败各种反动势力破坏阴谋。

在策反蒋铭的同时，余杰也对省会警察局局长胡慎仪展开了政治攻势，承担这一重任的是已经成为江汉区委城工部内线的省参议员吴先铭。

吴先铭是胡慎仪的老朋友，早在1941年吴先铭担任国民党松滋县党部书记长时，胡慎仪就在松滋县担任区长，俩人私交深厚。胡慎仪出任省会警察局局长后，吴先铭担任省参议员，与胡慎仪同住武昌，来往十分密切。按照城工部的指示，吴先铭在一次私下会面时，对胡慎仪进行了“摸底”。

吴先铭问胡慎仪：“时局紧张，我们怎么办？”

精明的胡慎仪没有正面回答，反问：“你打算怎么办？”

吴先铭不慌不忙地说：“目前对待客观形势，可能有三种态度：一是迎变，二是应变；三是不变。何去何从，现实要求我们作出回答。”

胡慎仪沉默片刻，无可奈何地说：“迎变，没有门路；不变没有前途；唯有随机应变好。”

吴先铭当即指出：“如果有门路，我看迎变是上策，应变是中策，不变是下策。”

胡慎仪听后连连点头，同意吴的看法。

经过这次“摸底”后，吴先铭认为胡慎仪处于彷徨观望之中，是完全可以争取的。于是他加紧对胡慎仪进行策反。中共武汉市委则秘密指派地下党员李逊夫、李蔓农出面做胡慎仪的工作。蒋铭担任武昌市长后，也对胡慎仪开展策反工作，促使胡慎仪下定了弃暗投明的决心，他与蒋铭相约：风雨同舟，共安危，同进退。

眼看时机成熟，余杰决定进行“摊牌”。吴先铭来到胡家，告诉胡慎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金先生（余杰的化名）要我不走，并要我转告你，要你在省会警察局做点工作，率领武装警员在官方撤退时，留下维持地方治安。”胡慎仪表示欣然同意，还特意向吴先铭表态：“事关人头的大事，你知我知，绝对保密，不对任何人讲，请放心。”随后，余杰指定吴先铭为胡慎仪的联络员，两人以故友旧交为掩护，保持密切联系。

为了对付过渡时期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郑桓武协助蒋铭建立了指挥小组。蒋铭还找到省会警察局，与局长胡慎仪（胡此时已被我城工部地下人员策反过来）联盟，相约“誓共安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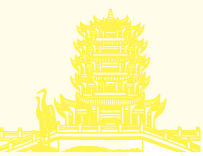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为了完成中共地下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蒋铭和胡慎仪商定，把警局管辖的警队力量调一部分控制在司门口附近，用以应付各种特殊情况。同时还在市府内部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警卫组，作为指挥小组的警卫力量，由黄雅清任组长。

黄雅清原系“汉口市党部行动第一队”这个特务性质的行动队队长，该队的任务是护卫该市党部首要分子，监视内部动摇可疑人员。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穷途末路的消息从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冲击着黄雅清的神经。黄感到国民党军队大势已去，武汉面临解放，因而惶惶不安。由于黄雅清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当过郑桓武部属，他找到郑桓武，请求指教，其情真挚。经过郑桓武的开导，黄表示听从郑的指引，愿意弃暗投明，为人民立功。

在一个月朗风清的日子，郑桓武将黄引荐给蒋铭，蒋随即将黄雅清部改编为“武昌市政府警卫组”，这一招就把具有破坏性的隐患转变为人民所利用的积极力量。这个组在真空时期昼夜流动巡查市区治安，及时向市府反映情况，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秩序。

智斗朱、杨

随着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在武汉的反动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状态。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眼看大势已去，决定逃离武汉，退守鄂西。临走前，他施展了“金蝉脱壳”之计，匆忙成立一个“湖北省政府



鄂东南行署”，由原鄂中师管区司令孙定超任行署主任，代行省政府职权。他还指令将来行署撤离武汉后，要集中省政府、省会警察局、武昌市政府、武昌县政府、汉阳县政府残余武装力量，到咸宁、崇阳、通城、通山等地依托大幕山、九宫山建立“鄂南反共游击根据地”。他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这种安排让自己跳出“火坑”，处于“成则有功，败则无责”的有利地位。

朱鼎卿这种精心安排虽然机关算尽，但要找到肯为他卖命跳“火坑”收拾残局的高官却并非易事。正在他发愁之际，省参议员郑桓武却毛遂自荐，主动表示愿意担任省政府鄂东南行署副主任，留在武汉坚守，将来转移到鄂南去打游击。朱鼎卿对郑桓武虽然有疑虑，但他知道郑桓武的能力，也没有时间再仔细斟酌了，于是就任命郑桓武担任省政府鄂东南行署副主任。郑桓武又建议增派武昌市长蒋铭担任鄂东南行署副主任，朱鼎卿也同意了。

有了这两个职务作为“护身符”，郑桓武、蒋铭开展迎接解放的工作就更加得心应手、名正言顺了。他们支持胡慎仪加紧对省会警察局下辖的12个分局和警察大队下辖的4个中队进行严密控制，通过人事安排调动将这支1000余人枪的武装牢牢掌握在手中，同时暗中储备粮食，转移档案，做好了充分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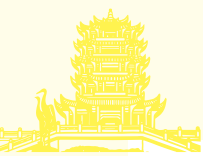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政部门开始陆续撤离武汉。省政府给省会警察局也下达了撤退命令。胡慎仪按照江汉区委城工部的部署，利用警察们都不愿离开家乡远走他乡的心情，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拖延战术，口头上答应撤退，行动上按兵不动，还要求按人头各发光洋40元作为所有警员的搬迁安家费用。由于省政府拿不出这一大笔钱，撤退之事也就暂时不了了之。

随着形势发展，一方要抢时间逃命，一方要拖时间脱险，撤退与反撤退、搬迁与反搬迁斗争越来越激烈。在省政府仓皇逃离武汉时，湖北省保安副司令杨达突然下达手令，强令胡慎仪率部向鄂西撤退。胡慎仪眼看无法再拖延，就急匆匆地找到郑桓武商议。郑桓武利用其省政府鄂东南行署副主任的身份，当即在杨达的手令上批示：“该警察大队已归本行署统率指挥，应随同本行署行动，不得先撤离武昌。”随后，郑桓武又把这一手令送给

鄂东南行署主任孙定超签署。孙开始有些犹豫，不愿与杨达发生摩擦冲突，但郑桓武却“提醒”他：“杨达把这个警察大队拖走了，我们依靠什么力量到大幕山去呢？”。孙定超一想到要留下这支力量到鄂南建立“反共游击根据地”，就不再迟疑，当场签署了行署批示。这样，郑桓武、胡慎仪等人就合理合法地拒绝了杨达调走警察大队的命令。

随后，警察大队和各分局按照原定计划，将档案文件、户口底册等转移到事先准备好的地点，并成立“武昌省会警察局应变指挥部”，调动警察大队分别向车站、码头、铁路、公路、桥梁、堤坝、仓库等地点布防，同时调动7辆警备车，协同鄂南电力公司、武昌电话局和各机关、学校、工厂、银行开展护厂护校斗争，消防队也全体出动，严阵以待，严防匪特和国民党散兵游勇破坏、抢劫。

在解放军进入武昌城区之时，蒋铭在城工部的指导和郑桓武的协助下，一方面继续督率市府及其原辖各区公所人员严守岗位，协助维护治安，妥善管理档案、物资、财产等，静候军管会接管；另一方面与为迎接武汉解放，由武汉各界名流组成的临时救济委员会以及原省市商会密切配合，为解放军筹划物资供应，配合解放军进城，迎接武昌城的解放。



特殊家教

◆ 刘邦民

1949年3月的一天，武昌启黄中学教师胡铭心与往常一样，来到他“开小灶”补习功课的学生家。这个学生可不一般，她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书记长陈良屏的女儿。还没等胡铭心完全坐下，就听该学生急匆匆地说：“胡老师，我爸爸接到不少共产党宣传材料，不晓得是从哪里寄来的。”胡铭心接着学生的话说：“我们启黄中学也常收到这些东西。”由于所谈话题敏感，这天的补习课也就“从简”了之。

第二天，陈良屏的妻子找来胡铭心，她向胡铭心问道：“你们学校收到些什么材料？哪些人收到过？可能是什么人寄的？”胡铭心冷静地回答说：“我自己也收到过。搞不清来源。”因为有备而来，胡铭心反问道：“局势如此，陈家作何打算？”陈妻叹了一口气，说：“唉，有何打算？省党部已作迁川准备。那么多人挤向西南，我看前途渺茫！陈妻一直沉浸在哀叹中，并没有对胡铭心追问过多。”见此，胡铭心对陈妻进行安抚，告诉她，吉人自有天相，然后就告辞了。

这一次耐人寻味的谈话，很快就引起了中共武汉市委青年工作组的注意。原来胡铭心是一位中共地下工作者，1947年，他在湖南湘乡中华中学宣传进步思想，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缉捕逃来武汉，由其哥哥的同学介绍认识了陈良屏。陈见胡铭心年轻儒雅，学识渊博，又由于胡是由其妻弟介绍认识，就推荐胡铭心到了武昌启黄中学教书。武汉市委青年工作组负责人杨坤泉知道胡铭心认识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陈良屏，请示了上级后，找到胡铭心，与胡铭心进行了长谈。杨坤泉叮嘱胡铭心，多了解陈良屏情况及思想动态，相机做些瓦解、策反工作。这次与陈妻的谈话，胡铭心及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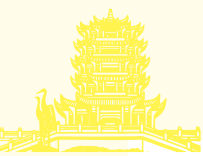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向组织进行了汇报，并寻求指导。

上级党组织分析了胡铭心汇报的情况，认为陈妻这次谈话很可能是陈良屏授意的，其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追查文件来源，二是想找途径与中共联系。如果是第一种情况，胡铭心就面临暴露被捕危险；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就存在策反突破可能。党组织决定让胡铭心沉住气，做好撤往解放区的准备，同时密切关注陈家的动向。

随后，胡铭心装着若无其事来到陈家为其小女儿补习。其间，陈良屏主动来到家庭教室，找胡铭心谈心。陈首先拉家常，问了问小女儿的学习情况，然后转向时局。他忧心忡忡地说道：“大江以南，半壁江山是撑不住了，人心已经涣散了。方觉慧（国民党湖北省执监主任委员）已经离汉，看样子是不会回来了。目前省党部工作全部由我负责忙活……”陈良屏说完这些，内心彷徨，神情苦恼，满脸慌张忧愁之色。胡铭心见此情形，对陈良屏说：“我是个穷教员，无法找退路。但想问一句：陈先生怎样安置老小？”说到这儿，陈良屏叫他的女儿退回到房间里去，然后面对胡铭心，直截了当地悄声说：“能不能帮我找找那边关系？”还没等胡铭心开口，陈良屏接着又自我揣测道：“教育界可能有渠道，你找找看。有消息，随时来告诉我。”说完心里话后，陈良屏长长舒了一口气，紧接着，他就再三叮嘱胡为其保密。

经过这一次的谈话，胡铭心掩饰不住地喜悦。一走出陈家，他惬意地笑了。

当夜，胡铭心紧急找到党的地下组织，向杨坤泉作了汇报。杨坤泉事先早已了解过陈良屏底细，知道此人并非顽固的国民党反动派，且无血债，家庭负担较重，如今他的政治靠山已出逃，策反成功可能性较大。在得知陈良屏主动找胡铭心联系共产党后，杨坤泉十分高兴，通知胡铭心：“现在可以向陈良屏亮明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了！记住，要严肃向陈良屏指出：立功才是唯一出路，站到人民一边，要他拿出实际行动来。当前一是要打消逃跑打算；二是要定期向我们汇报情况。”同时，杨坤泉告诉胡铭心，根据当前复杂的斗争形势，党组织决定：以后由地下市委武昌分委委员孙



运仁同志与胡铭心单线联系。

随后，在陈家一处绝密的地方，胡铭心告知陈良屏：我就是你要找的共产党。知悉胡铭心的身份后，陈良屏非常激动。他拉着胡铭心的手说：“我是真心实意投向光明，我早已厌恶了国民党的尔虞我诈、腐败堕落……在往后的日子里，你看我的实际行动吧！”他还向胡铭心建议，为今后汇报方便，胡铭心能否搬到省党部里来住或住在他家里来，绝对保证胡的安全。胡铭心握着陈良屏的手说：“谢谢！很高兴看到你愿意投向光明，走向人民，与我们一道，为武汉的解放做出贡献。”

因为事关重大，紧接着，胡铭心就与陈一起商量着如何避险，如何接头，如何投递情报……陈良屏被成功策反。很快，他就拿出了向往光明、走向人民的实际行动。

首先，陈良屏将参加国民党湖北省党政军甲级联席会议记录交给了胡铭心。这个会议是当时湖北省国民党当局最高决策会议，每一次的记录都有机密情报，陈良屏悉数交给了胡铭心，胡铭心又以最快的速度交给地下党组织。

此外，陈良屏还及时向中共地下党组织交出国民党军武汉防御图，对解放军迅速掌握敌军布防情况提供了非常翔实的资料；他还复制并交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组织系统表、成员背景及分工，特务系统“中统通讯社”状况，这些绝密文件对解放武汉后肃清敌特分子提供了精准的资料。

为使大武汉免遭破坏、人民少受苦难，陈良屏还积极协同商会和知名人士，劝说白崇禧弃守武汉。同时，陈良屏还将其直接控制下的京山县反共地主武装交出，指令停止活动，驻地移近，等待投降。陈良屏的策反成功，使我党掌握了敌方在湖北的动态和机密，从而在战略上处于有利地位。

武汉解放后，陈良屏听从党组织的安排，被派往当时还没有解放的重庆，利用自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书记长的身份，从事攻心策反工作。他在获得新生后，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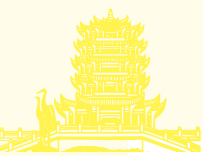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攻心记

◆ 刘 邦 民 孙 劭

1948年末，武汉的冬天很是寒冷，但富商林厚周的太太阮冰却在心中感受到了来自党的温暖——江汉区党委二地委城工部部长邱肱良和天京潜县委城工部部长林涯萍专门派交通员林其龙来汉与林厚周接头，叮嘱他们夫妇不要携家带口去台湾，并且要林厚周赴汉川斗埠头城工部驻地，接受反迁移的任务。阮冰早在大革命时期就为党工作过，后来失去了组织关系。现在又有机会重新为党的事业工作，阮冰自然是喜不自胜。

阮冰的丈夫林厚周一生沉浮于商海，在武汉的工商业者中颇有名气。他受尽了国民党腐败官员的敲诈勒索和官僚资本的排挤，对蒋家王朝不得人心的统治甚为厌恶。但由于常年受反动宣传所惑，他对共产党缺乏了解，曾经考虑把部分资产迁往香港，并与友人共同赴台经商。现在共产党方面来主动和自己接触，这使得林厚周举棋不定，于是便和夫人商量。借此机会，阮冰劝说丈夫留下：“我是不愿去台湾的。现在党来找我们了，我心情万分激动！”她要林厚周相信党的政策，跟着共产党走才是真正的出路。夫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得林厚周毅然决定不再奔港或赴台，而是留下迎接解放，为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汉川斗埠头林家老屋是江汉区党委二地委城工部机关的驻地，而林厚周的老家也在汉川。考虑到在家乡熟人太多，若林亲自回乡，怕风声传出引起军警宪特注意，于是阮冰代表林厚周，以返乡探亲的名义到达汉川，受到邱肱良和林涯萍的热情接待。最开始城工部给林氏夫妇的任务是组织武汉工商界的反迁移斗争，大力宣传党的城市工商业政策，消除广大从业者的顾虑，各安其业迎接解放。但当阮冰汇报自己家与晏道刚熟识，并参



与了武汉民革的地下活动时，情况又有了变化。

作为一名富商，林厚周与武汉军政界的一些上层人士常年有往来，特别是与晏道刚、晏勋甫两人，同是汉川老乡，更是老相识和密友。晏道刚的夫人冯毅和阮冰是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并将阮冰介绍给林厚周结为夫妇，因此两家感情较深，无话不谈。晏道刚和晏勋甫是叔侄关系，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晏道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国民党西北“剿总”参谋长。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迁怒于晏道刚，认为其“严重失职”，罢了他的官不说，还表示“永不录用”，晏道刚于是一直对蒋心怀不满。早在1948年夏季，晏道刚就在着手组织武汉的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进行反蒋活动，工作重点就是要汉口市市长晏勋甫在解放军到来时能留守，不随蒋军南逃。由于晏道刚平日里和晏勋甫感情不太融洽，当时晏道刚就希望林厚周夫妇出面来做晏勋甫的工作。考虑到市长留守能对城市职能部门和各行各业保持正常运转，免遭破坏起到重要作用，林厚周和阮冰同意配合晏道刚。就这样，林氏夫妇实际上先承接了武汉民革的任务。

阮冰将这一情况向邱、林进行说明，引起了两位城工部长的高度重视。当时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解放军兵临武汉，对武汉解放做好“和”与“战”两手准备已是迫在眉睫的紧要工作。林厚周与晏道刚晏勋甫叔侄交



汉口特别市市长：晏勋甫

情深厚，非常有利于打入敌人在汉统治集团的核心。如果能够直接策反国民党汉口市首脑机关最高层，无疑可以极大地助力于瓦解敌人、安定人心、减少损失、防止混乱，把武汉这座大城市完整地保存下来交给党和人民。因此，邱、林两位部长指示，对晏勋甫的策反工作，不仅要搞，而且必须成为重中之重，应抓紧时间，集中力量进行突破。他们相继三次派交通员林方炜来汉，给林厚周、阮冰带来城工部对策反工作的最新指示，

要求将工作重点“由工商界转向军政界”。

晏勋甫时任汉口特别市市长，是国民党在汉统治集团中的头面人物，要策动他留汉不南逃，自然是颇具难度。但林厚周和阮冰根据城工部领导的指示精神和时局变化，进行了一番分析，发现还是有不少有利条件：

第一，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反动派败局已定，朝不保夕，凡是稍有头脑的人，都不愿意为蒋记政权殉葬。晏勋甫当汉口市市长，都是李宗仁、白崇禧权谋运作的结果，他并不是会为蒋、白卖命到底，死不回头的顽固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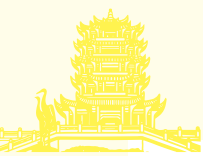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第二，党的地下工作者不断地在向国民党军政人员宣传政策，政治思想攻势非常凌厉。邱、林两位部长曾明确指出：“革命不是报复，也不能由共产党一手包办，而要争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就是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无论他过去地位多高，罪恶多大，只要他从现在起有了真诚悔悟和投向人民的决心和行动，我们也都一律欢迎，不算旧账。我们对这些人员的鲜明公开政策，就是‘不咎既往，立功受奖’。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动员一切力量，利用一切渠道，向国民党的武汉党政军负责人员进行说服工作，争取他们迷途知返，集体地或者个别地向解放军投诚起义，各自尽可能做些反逃亡、反搬迁和反破坏的工作，把武汉方面的一切人力物力资源都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保存下来还给人民。”迷茫于何去何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听闻党的宽大政策后，都会对自己的前途有所思考。

第三，林厚周与晏道刚、晏勋甫同为汉川老乡，很有交情。晏道刚与晏勋甫虽然平日感情不算融洽，但毕竟是叔侄关系，互相之间说上话是很容易的，这很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当然，最根本的是，策反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林厚周、阮冰随时能得到党组织的指示和帮助。

策反工作先由晏道刚出面进行试探，但晏勋甫城府很深，对叔叔的话无动于衷。第二次晏道刚直接对晏勋甫说，林厚周参与了民革的反蒋活动。晏勋甫听后却哈哈大笑：“林厚周是个商人，他懂得什么政治，莫开玩笑。”

晏道刚发现若不爆出些“猛料”来，自己这个侄子就不会动心，于是便摊牌说：“你不要以为林厚周不懂政治，他的夫人阮冰是一位有心人啊！”



阮冰现在已经同江汉军区域工部联系上了。武汉这边也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直接领导。你好好考虑一下，台湾地方那么小，跟蒋介石一道去的亲信也不少，你就是去了也难分到一口残羹，有什么意思呢？”

听了这番话，晏勋甫垂下了头，默然不语很久，最后长叹一声。

晏道刚向林、阮告知了第二次谈话的情况，夫妇二人一致认为，晏勋甫的表现说明他的内心是动摇的，这是一个有利契机，应该趁热打铁，抓紧对其攻心。

几天之后，林厚周和阮冰在家中设宴，做了几盘家乡菜，请晏勋甫来喝酒聊天。酒过三巡，晏勋甫在微醺中叹道：“蒋介石必败。我一生在官场中混到现在，还是两袖清风。前途茫茫，何处是葬身之地啊！”

林、阮见晏勋甫起了话头，马上趁机向其交代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政策是宽大的，既往不咎，立功受奖。你有立功受奖的条件，要是能把汉口市政府的档案和所属单位的财物完整保留下来，交给人民，就是立了一大功啊！这样做前途是光明的！”

晏勋甫听了这一番话，多日愁眉不展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在离开林家前，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性有良心的中国人，我也反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我年纪老了，为什么要同他祸国殃民到底呢？！”

实际上，解放军势如破竹，面对无可挽回的失败，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物无不在考虑后路。晏勋甫虽在之前故作镇静，但其实心中早就乱了方寸，他也非常想找到出路，只是怕在乱局中轻易暴露出自己的意图会招来祸端，所以谨小慎微。在这次家宴后，林氏夫妇更紧密地同晏勋甫保持联系，晏勋甫的态度也逐渐明朗。城工部对他提出了保存好档案、保护被捕地下党同志、防止国民党军撤退时破坏骚扰城市等三项要求，他都承诺尽力做到。

不过在另一方面，晏勋甫与白崇禧也有较深的个人交往和利害关系，白崇禧不断在拉拢和威逼晏勋甫，这对策反工作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城工部动员了多个城工关系共同战斗，除了林厚周、阮冰夫妇和晏道刚、冯毅夫妇，时任汉阳县参议长邬晓丹和国民党中将军长严敬也参与了对晏勋甫的工作。此外，已被江汉二地委城工部策反的汉口市政府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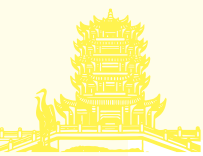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长杨锦昱充分发挥自身能量，督促和帮助晏勋甫下定留守决心，同时对付白崇禧的各种命令要求。杨锦昱以“守土有责”“安定人心”的名义，要晏勋甫在市政府全体职员面前明确表态，以身作则。

晏勋甫无可推辞，就在一次大的集会上，对市政府各单位负责人慷慨宣布自己决心与全市人民和全体职员同生死、共患难，直到最后一刻。会后，杨锦昱马上邀集工商业知名人士谈话，亲自传达晏勋甫在集会上的誓言，并要求他们转达给各行各业，要大家各安生计，各守门户，防范一切骚乱和破坏活动。后来，白崇禧见武汉必失，遂决定南逃，妄图当“广西王”。他当面命令晏勋甫准备紧急疏散汉口市政府，并将武汉各大工厂中的重要机器设备迁往桂林，同时还要市政府以各种名目征收钱财粮物，搜刮民脂民膏。晏勋甫受到白崇禧的逼迫，只得以乡土之情、守土有责、百姓呈情等为理由，尽量拖延。最后被逼得实在没法，就躲进汉口市立一医院，在医院院长、汉川老乡戴维天的掩护下“称病不出”。但白崇禧的疏散拆迁命令必须应付，否则无法交差，于是晏勋甫就把此事交给杨锦昱办理。

杨锦昱与地下工作人员商量后，在编制疏散预算上磨起了绣花针，审定时格外仔细甚至故意刁难，使得财政部门不得不再三改编，迟迟不能确定。预算不能确定，资金不能到位，疏散拆迁自然也就无从动手。靠这种公文旅行的把戏，晏勋甫和杨锦昱总算是拖到了1949年4、5月间，此时白崇禧只顾得上把他的军队和军事资产南撤，对民用物资则根本挤不出运力。如此一来，其掠夺武汉物资的计划便化为泡影。

黎明前夜总是格外黑暗。武汉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警宪特更加疯狂地搜捕“共党”“匪谍”“通共分子”，城市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林厚周也不幸上了黑名单。但由于特务们忙中出错，拿到的手写名单上，因为字迹潦草不清，“林”字被认成了“杜”字，“周”字被认成了“国”字，林厚周于是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杜厚国”。当时林氏夫妇家在黄兴路18号，位于岳飞街的转角处，而黑名单上提供的地址直接写成“岳飞街”，于是一帮特务到处寻找“杜厚国”，却怎么都找不到。

尽管敌人搜捕出了差错，但参与策反工作的同志却保持高度警惕。邬



晓丹是汉阳县参议长，能事先得到一些逮捕行动的消息。他得到消息后总是第一时间给阮冰打电话，报出暗号：“今夜要停电，请准备蜡烛。”阮冰再马上通知其他人，以做好应对意外的准备。出于安全考虑，林厚周每天都只能去亲戚朋友那里去过夜，留下阮冰在家中留守。林厚周总是对妻子放心不下，阮冰便鼓励丈夫：

“为了党的任务，你放心地去吧，我能照顾好自己。”

林厚周对妻子感慨道：

“我在旧社会过了半辈子，做生意几起几落，吃了多少苦头，受了多少敲诈勒索。为了拉关系，撑场面，又不得不攀高结贵，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今天为了投向光明，摆脱痛苦，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时间终于走到了1949年5月15日，最后一支驻汉的国民党军鲁道源部仓皇南撤，江城马上就能回到人民手中。这天早上，林厚周和阮冰兴高采烈地去找晏勋甫。谁知，晏勋甫竟然一反常态，独自一人闷坐在市长公馆的内厅里，不言不语。看到林氏夫妇来了，晏勋甫很痛苦地说：“白崇禧已经逼着我把家眷送到香港去了。他还逼我今天上午10点在武昌机场会面，一道飞往台湾。希望你们让我走吧！”

事后才得知，就在5月14日，白崇禧专门召见晏勋甫，要他次日和自己一起乘飞机逃台。召见结束后，晏勋甫还跟自己的一个亲信说不会走。可到了14日晚，晏勋甫和汉口市几位早已与党组织建立城工关系的重要官员见面时，他又说，明天就要走了，请大家“勉为其难”。当时在场的汉口警察局局长李经世非常不满，讽刺道：“寡妇要嫁人，还要人劝扶上轿？”晏勋甫则回答：“出处是大事，要慎重考虑。我当然不愿丢下朋友们，但大家也要设身处地为我想想。”他之所以出此言，原来是因为其家人已经被裹挟到了香港。

晏勋甫此刻的消极态度，对林厚周和阮冰来说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但想到几个月的工作不能白费，要对党和人民有一个交代，就绝不能让晏勋甫在最后关头在白崇禧的压力下出逃。于是阮冰很关切地对晏勋甫说：

“一念之差，将会遗恨千古。为了你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也是为了你

子孙后代的幸福，在这个关键时刻，你一定要慎重考虑，三思而后行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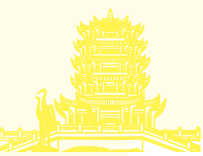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见晏勋甫一直默不作声，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林厚周和阮冰就把他扶到黄兴路七政里严敬的家里，并把晏道刚、邬晓丹等人叫来，一起做晏勋甫的工作。众人还未坐定，晏勋甫就扑倒在大家面前，痛哭流涕，讲述自己的困难和顾虑：“我历任国民党高官，罪恶深重。留下来，恐怕一个脑袋还不够……我送家眷去香港，已在国库里取款 5000 银元。以后移交时，这笔钱拿不出来怎么办？今后，我与家眷隔绝，妻儿生活困难，又如何接济？不让我走，我就只有自杀一条路……”

针对他的疑虑和不安，大家向其保证：“共产党‘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话是算数的。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将军的政治安排，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一点你务必放宽心。”

而至于经济问题，林厚周当众表示由自己负责解决。当天林厚周就发电给在台湾维持生意的大儿子林芳徽，将一批货款拨给香港鼎颐商号股东秦育之。与此同时，林厚周电告秦育之，请其付给晏勋甫的家眷 3000 银元作为生活费（晏勋甫动用国库的 5000 银元，也在解放后由林负责洽商，工商界同仁共同筹付了这笔钱）。

一番劝慰和安排下来，晏勋甫的情绪才略为平静。午饭后，大家劝晏勋甫冷静下来，尽最大努力承担起汉口市在真空时期的各项工作，以报答党和人民，将功抵过。然而晏勋甫的思想斗争还是很激烈。众人见此情景，无不焦急万分。林厚周当机立断，把电话机搬到床前，坐在晏勋甫身边，代替他发布各项命令，不停地给市政府所属各单位打电话进行指挥，特别是要求警察局和水电公司等关键部门严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并加强保卫，务必保全所有设备、财物和档案，严防敌人骚扰破坏。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工作，各个部门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汉口市区平安迎了解放。

1949 年 5 月 24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吴德峰同志任市长。在交接大会上，晏勋甫将国民党汉口市政府的全部档案和财务清册一一点交给人民政府。晏勋甫被安排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历任武汉市参事室主任、民革武汉市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政协常委、市政协副主席。



金口响起起义的枪声

——张轸兵团起义始末

◆ 孙 勤

1949年5月10日，位于湖北沔阳县（今仙桃市）彭家场的江汉军区部队驻地附近闯入了两名不速之客，被警惕性极高的解放军战士当场抓获。而这两名被解放军当成国民党“间谍”抓获的可疑人物，却口口声声说是来联系起义事宜的，要求面见江汉军区解放军“长官”。于是战士们将他们送到江汉军区联络科科长彭其光处进行审查甄别。

彭其光对外职务虽然称为江汉军区联络科长，而他的实际身份则是中原局社会部驻江汉地区情报工作组组长。他经过审查得知这两个不速之客确实是大有来头，其中一人就是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第19兵团司令张轸的女婿张尹人，另一人则是张轸的亲信、第19兵团政工处处长张了且的儿子张笑平，是一名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

经过详细交谈，彭其光得知张轸确实曾经与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有过密切联系，并且同解放军商议过要率部起义。但中原局社会部留在他部队中的地下工作者赵子平前往解放区联系起义事宜却没有回音，而他派张尹人到孝感去联系中原局城工人员，又因白崇禧封锁汉口岱家山交通未能成功。心急如焚的张轸只好冒险派张尹人、张笑平二人直接从第19兵团鲍汝澧师的防区金口镇秘密渡江北上，直接找解放军江汉军区联系起义事宜。

事关重大，刻不容缓！彭其光立刻将此事通过电台上报中共中央中原局社会部，当天中原局领导就回电指示：由彭其光代表中原局、中原军区，与张轸代表谈判该部队起义一切具体事项，商定后即时上报中原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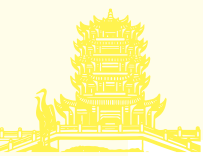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经过谈判，双方商定了部队起义的行动细节：白崇禧第7军撤退后即宣布起义；起义后部队临时代号为“55555部队”；起义时，摘掉国民党军帽徽；全体官兵左臂缠白毛巾以利辨识等。所有细节由江汉军区即时电告野战军前线部队。与此同时，张轸还派张了且留在汉口，与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络。

至此，张轸起义已经是箭在弦上，蓄势待发。

事实上，张轸起义之事早在1948年夏就已经开始酝酿。当时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开封第一次解放后，蒋介石即委任张轸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随即将省政府迁往信阳办公，以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第五绥靖区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身份总揽国民党在河南的军政大权。但实际上，由于解放军攻势迅猛，国民党政权此时能管辖的“河南省”不过是信阳附近的十几个县城而已。张轸不是蒋的嫡系，过去还反过蒋，此时蒋让自己当所谓“河南省主席”，不过是空头人情罢了，张轸对此看得很清楚。蒋家王朝江河日下，信阳已逐渐成为大别山北的一个孤立据点，自己手中的杂牌武装无论是数量还是训练、装备水平都无法与解放军精锐之师相提并论，随时都有可能被消灭。张轸思来想去，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若不想在反动派覆灭的历史洪流中成为殉葬品，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率部起义，弃暗投明。

张轸打算起义，也并非一时兴起。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受到过共产党的影响，特别是林伯渠给了张轸很大的帮助。抗战初期，张轸曾邀请八路军驻第一战区长官部的两位代表到新乡，教授游击战术和群众工作要领，后来在重庆又接触过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邓颖超等党的领导人。

因为张轸的历史表现和态度，中共中央认为其在国民党军政要员中属于较开明者，有争取的可能性，于是派出了工作人员在张轸部属中展开工作。其中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开封工委常委方敬之就化名“张自庸”，通过工作关系结识了张轸的大女婿、潢川中学校长张尹人。张尹人之前因黄泛区救灾工作与解放区干部共过事，思想倾向进步。方敬之1947年7月到信阳，在张尹人家住了十多天。他们一道在张轸的部属中积极宣传共产党、解放军的优良作风和各项政策，方敬之还接触了第五绥靖区保安旅长兼光山县



县长程晓沧、确山县县长涂建堂、第五绥靖区军需处长张鉴古（张轸侄孙）等对共产党无恶意的张轸亲信，都谈得很投机。于是张轸直接和方敬之进行了一次面谈。

但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张轸与方敬之会面后，看到这位“张自庸”先生十分年轻，便认为共产党没有派出高级别干部与其协商，于是态度发生了动摇，变得有些消极。

当然，张轸态度突然变得消极还有两点深层次的原因：一是作为一名旧军人，张轸十分信奉“兵多说话才硬”的道理。当前他手头部队并不多，而且没有一支是其基本队伍。张轸心中盘算，“光杆司令”起义只是脸上好看，如果部署不周密还很可能被武汉的白崇禧部击败消灭，即便投奔共产党成功，也没什么“地位”。他觉得至少要有5个师，最好能有10个师的部队抓在手里，才算是有“政治资本”。此时他的大部分精力正放在打着国民党旗号搜罗各种地方武装组建新部队上。二是张的核心幕僚——第五绥靖区参谋长朱其平和秘书长范效纯是死硬反共分子。朱其平跟随张十多年，平时深得张轸信任，而范效纯则是张轸的学生，是一名中统特务，曾当过开封反省院院长，迫害过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此二人对张轸起义百般牵制，让张轸迟迟不能下定起义决心。

方敬之为了排除起义阻力，便通过与朱其平素有矛盾的师长涂建堂出面，没法取得了朱其平“做生意”贪污的证据，动摇了张轸对朱其平的信任，随后巧妙地赶走了朱其平。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败局已定。在淮海战场上，张轸的两名老部下——85军军长吴绍周和110师师长廖运周从信阳调往前线，结果前者被俘，后者成功起义，这对张轸的触动很大。而且此时张轸收编地方武装的工作也较为顺利，新组建了10个旅，张的心腹将领辛少亭、鲍汝澧、涂建堂、程晓沧、张继烈、张玉龙等人都表明愿与张轸共进退，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等地方开明士绅也催促张轸早日行动。更重要的是，党中央通过李世璋从上海向张轸送信，表示了解张轸的思想和意图，由衷欢迎，已通知中原野战军直接派人与张轸联系，来人代号“陈协一”。起义的各项主客

观条件都接近成熟，张轸对方敬之的态度大为改善，他让张尹人给绥靖区汉口办事处处长打电话，要其尽快设法把方敬之从武汉请到信阳来。方敬之来到信阳后，张轸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并请他和张尹人一起动身去解放区，以接收解放军高层领导对起义的直接指示。

方敬之和张尹人抵达解放区后，中原军区副政委邓子恢同志接见了他们。邓子恢对二人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比预期快得多。原来预计1950年才能解放开封，实际提早了两年。今后发展肯定还要快。愿意依靠人民，共产党表示欢迎，希望早下决心。起义的地点和时机最好在解放武汉时，配合解放军南下，起的作用和影响都大些。希望保护好信阳以南的铁路设施。”同时，邓子恢宣布，中原军区政治部联络处处长丁一将赴信阳，这就是张轸一直在期盼的“陈协一”先生。

1949年1月下旬，丁一随张尹人来到信阳，并与张轸会面。张轸一开始很热情，殷勤接待。当讲到部队起义时，丁一十分坦率地说：“张司令官决心起义，我们热烈欢迎。部队起义后要彻底改造……”

一听到“彻底改造”四个字，张轸嘴上没说什么，但脸色却发生了变化。张尹人在旁边看到了他面部表情的变化，觉得很尴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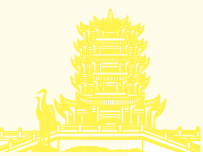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谈话结束后，张轸问张尹人：“陈先生说的‘彻底改造’，是什么意思？”

显然，他心里认为所谓“彻底改造”，就是直接收了他的兵权。

张尹人有点哭笑不得：“改造成解放军那样就叫彻底改造。解放军的战斗你是知道的，你这队伍不改造能打仗吗？”

过了两天，通过向程晓沧、张鉴古等人了解情况，张尹人和丁一才明白张轸心理出现微妙变化的原因。首先是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取而代之，“和平”空气弥漫一时，张轸觉得时局可能会有变化，所以转入观望；其次是1月中旬时，一个叫牛传钦的人来到信阳，自称是民革主席的代表，对张轸有借重之意。张轸觉得自己可以左右逢源。

丁一和方敬之一样，都是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他在这段时间依然坚持不断联系热心于起义的进步将领和亲属，对大家说出现一定的干扰和



动摇并不奇怪，方敬之离开前就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要求大家要加强团结，坚定信心，同时提防顽固分子的捣乱和煽动。

不久，所谓“民革主席代表”一事被证实纯属子虚乌有。但张轸依然幻想走“第三条路线”，于是他叫张尹人和绥靖区政工处处长张了且护送丁一去解放区，希望能直接到北京找到民革中央主席。

一行三人向北行至漯河，被公安人员扣住，然后送到了陈谢兵团敌工部。过了两天，陈谢兵团周希汉军长在漯河百货公司会见了张尹人和张了且，丁一陪同，方敬之也在座。张尹人和张了且按照出发前张轸的嘱咐，谈起了起义后的番号、辖区、官兵待遇等问题。周军长则对他们说：“中原局已有回电来，要我们转达你们二位，不必再往北去了，所带信件当妥为转交。解放军进军江南不会等很长时间，希望张司令早下决心，不要再犹豫了。决定以后，迅速派人来。”

张尹人和张了且很快返回了信阳，向张轸汇报了漯河之行的情况。他们带回了毛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和包括李济深在内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响应声明给张轸看，并且说自己亲眼见到解放军正在为向南进军作准备。张轸明白，不管是“第三条道路”也好，“和平”“划江而治”也罢，现在看来都是镜中花水中月。他终于抛弃了一切幻想，决心执行之前邓子恢的指示，在解放武汉时发动起义。

1949年3月底，张轸率部从河南撤到湖北，驻守在长江以南的武昌至嘉鱼一线以及粤汉铁路的咸宁、蒲圻沿线。为统一部队上下思想行动，张轸在贺胜桥举办干部训练班，轮训各级干部，实际上是在为起义作思想和组织准备。

为了动员更多部队起义，5月13日，张轸在武昌找到配属给他指挥的第58军军长鲁道源，劝说他随自己一同起义。他本以为鲁道源是滇军出身，既不是蒋的嫡系也不属于桂系，应该不难说动，于是张轸开诚布公地对他说：“你绝对逃不脱，不仅跑不到云南，就是贵州你也到不了。”谁知鲁道源竟然予以拒绝。更危险的是他不但不愿随张轸起义，还暗中向国民党的国防部长顾祝同告密，此举差点导致张轸和其部下全军覆没。

5月14日上午，张轸接到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电话，通知他去武昌开会。涂建堂等将领劝张轸说：“解放军大军压境，而白崇禧部主力第7军仍然滞留在贺胜桥以北迟迟不南撤，比原定撤退计划已经迟了两天，情况十分反常。”因此建议张轸不要去冒险。但张轸认为自己手中有几万军队，白崇禧不敢拿自己怎样。

中午，张轸乘车到达司令部，没想到一进门就碰上了鲁道源。做贼心虚的鲁道源脸色一下子变得通红，说话也不利索，勉强应付了几句就匆匆离去。张轸觉得情况有异，但为时已晚，只得径直走进了白崇禧的办公室。

白崇禧见到张轸进来，寒暄了几句后就切入主题，拿出了顾祝同发来的一份电报。张轸把电报纸拿来一看，上面赫然写着：“据密报，张轸勾结共匪，图谋叛变，请将其师长以上军官扣押送广，从严法办，所部就地解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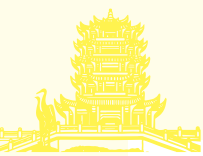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张轸一看，立刻明白是鲁道源告密了！虽然事发突然，但他很快镇静下来，对白崇禧说：“几个月来，我们谈了许多问题，一切情况你都知道，现在你说怎么办我就跟你怎么办，你还不相信我吗？”

白崇禧稍微考虑了一下，说：“你稍等一下，我去去就来。”然后就出了房间。

白崇禧是去找华中“剿总”副司令夏威商量如何应对，而张轸也没闲着，他找到自己在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白的副参谋长王和华说：“伙计，我恐怕要出事了，你要照护照护。”王和华说：“现在谣言是有的，好在你同总司令很好，你可以同他彻底谈谈。”

过了一会儿，白崇禧回到办公室，对张轸说：“明天上午10点开会，你立即打电话叫你部师长以上军官都来，你也不用回去了，就住在这个房子里，我们作彻夜长谈。”

一听这个话头，张轸就明白，对方是要按照顾祝同的电报来“解决”自己，此时必须要想办法脱身。于是他回答：“一切服从命令。部队一两天就要出发了，我部驻汉办事处的人都知道我今天上午来武昌，许多负责人等我解决一些重要问题，我一定要到办事处一趟。那里有直通电话线，打电话很方便。我叫军长和师长们明天都来开会，至多一个钟头就转回来。



我很想和你再作长夜之谈。”

白崇禧听了之后犹豫了好一阵，看样子是不想让张轸走，但最终还是说：“你快去快来吧。”

张轸立刻离开了“剿总”司令部。但他既没去办事处，也不回自己在贺胜桥的兵团司令部，而是直奔金口——此时尽快与自己的部队会合，防止白崇禧部队突然袭击才是关键！吉普车载着张轸和副官、卫士，从阅马场彭刘杨路向南疾驰。到达武泰闸时，为了避开汽车检查站的军警特务，张轸提前下车，让副官和卫士开车过桥，自己则只身一人，找了一位渔民雇其划船过河，上岸后步行三里多，找到吉普车，沿着长江大堤直奔金口鲍汝澧师部。

到金口后，张轸立即打电话通知辛少亭、张继烈、张玉龙等师长，要他们赶到金口共商大计。没过多久，下属报告，驻贺胜桥的兵团司令部和5个直属营都被第7军包围缴械，公私财物被抢掠一空。张轸得知后非常气愤，一个电话打到“剿总”司令部，与白崇禧对骂了一阵。此时128军驻地在山坡，副军长兼参谋长裴毓华打电话报告：“山坡驻地已遭第7军监视。”张轸马上命令裴毓华将军部撤到金口，并要张继烈师和张玉龙师星夜撤离原驻地，向金口集中，在马鞍山等处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如第7军发起进攻，坚决阻击。

等各师长到齐后，张轸就将顾祝同的电报和自己虎口脱险的经过向大家告知，各将领无不愤慨，所有人一致同意提前发动起义。涂建堂在粤汉铁路以东，未能到会，张轸指示通过电台将会议内容全部告知。至此，张轸部队1个军4个师25000余官兵正式脱离反动营垒，掉转枪口作好了战斗准备。

5月15日拂晓前，张继烈师和张玉龙师都抵达预定阵地。上午7点，第7军的两个团向贺胜桥西北马鞍山张继烈师阵地进攻。敌人的后续部队——第7军约1个师和省保安旅约两个团也在向金口方向急进。裴毓华、张继烈部对敌人奋勇阻击，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张轸向起义各部队布置之前与解放军约定的代号和标志，派人过江向江汉军区报告部队已提前起义的情况，并下达命令：如果敌人继续进犯金口，就同其决一死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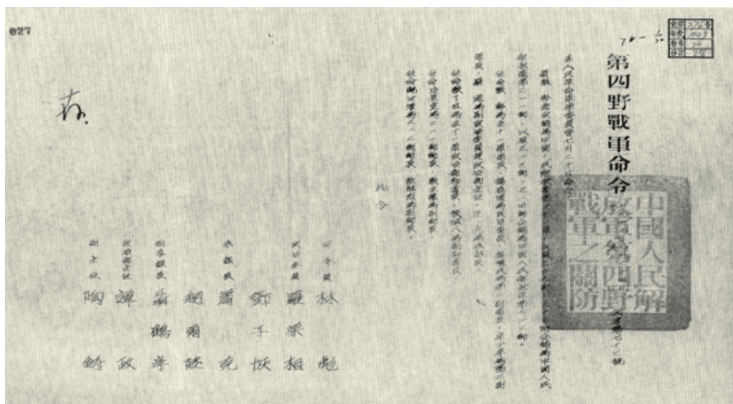
其实，就在白崇禧想扣留张轸的14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已在团

风渡江，直插贺胜桥。白崇禧见大势已去，在 15 日下午坐飞机南逃，他已经顾不上“镇压叛变”了。树倒猢猯散，到了傍晚，进攻起义部队的敌人纷纷向南窜逃。张继烈师和张玉龙师趁机进行截击，斩获颇丰。涂建堂师在铁路东侧湖泗桥一带截击由安徽逃往湖南的流窜之敌，也缴获不少人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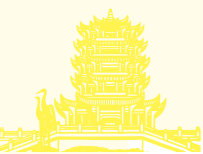
张尹人从江汉军区返回金口时，途经汉阳县山羊头，发现湖北省保安旅独立支队陈必祥率所部千余人在此驻扎，正无所适从。张尹人动员陈必祥一同参加张轸兵团起义，陈正为前途苦恼，听到起义的消息后欣然同意。张轸令鲍汝澧派人过江欢迎，将陈部接到金口，改编其为一个团，归鲍师建制。

5 月 16 日下午，四野 12 兵团 118 师进入汉口；17 日，武昌、汉阳解放。18 日，张轸亲赴汉口，受到四野 12 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唐天际的接见。张轸在抗战初期就和唐天际有过接触，此时熟人相见，格外亲切。两位首长对张轸兵团起义表示热烈欢迎。不久，四野副政委邓子恢来电慰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亦来电，对张轸率部起义表示欢迎。

1949 年 8 月 1 日建军节，中央军委决定，张轸兵团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51 军，张轸任军长，辛少亭任副军长，涂建堂、张玉龙、鲍汝澧、张继烈分别任 211 师和 212 师正、副师长，裴毓华任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张了且、张尹人任军政治部副秘书长。从此，在党的领导下，张轸部队重获新生，全体指战员在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光明大道上胜利前进。



1949 年 7 月 24 日第四野战军关于张轸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五十一军以及张轸任军长的命令



飞向光明

——策动王家墩机场部分国民党空军人员起义始末

◆ 孙 勤

位于汉口的王家墩机场是国民党空军的重要基地，也是国民党军控制极为严密的单位。1948年秋，中共京应县委城工部决定“虎口拔牙”，命令地下工作人员胡安涛以记者、教员的身份潜入武汉，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营，从事对国民党空军一大队王家墩机场空军人员的策反起义工作。在对机场人员进行策反的另一条“暗线”——中共鄂豫三地委城工部地下工作人员默契配合下，策动大量国民党空军人员拒绝飞往台湾，留在武汉等待解放军接收，并保护机场设施和大量武器、装备、物资，使其免遭敌人破坏，完好地交到人民手中。

机场起义的故事，要从胡安涛赴武汉“寻亲”说起……

在接到组织布置的任务后，胡安涛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自己爱人的堂



汉口王家墩机场停机坪

兄程德骥。程德骥是国民党空军一大队军士长，他的胞兄程德联早在抗战初期就参加革命，是位老同志。程德骥本人抗战时在西安航空飞行军士学校学习时就受到熟识的应城老乡、青年学生樊作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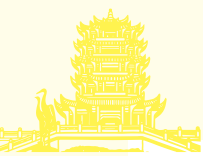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彭正模的影响，思想倾向进步，曾要求樊、彭带自己同去延安抗大。当时樊、彭两人劝学学好航空技术再来干革命也不迟。1946年中原突围时，程德联辗转来到武汉，也是程德骥安排在王家墩机场宿舍住下，提供隐蔽并安全护送去上海。由此可以看出，策动程德骥的主客观条件是比较好的。

不过，程德骥的具体表现以及他的职级、住处等，胡安涛在接到任务时都还没有详细了解，而且之前他和程德骥也未曾谋面。于是，胡安涛先找到了程德骥的堂叔程怡祥。程怡祥在国民党宪兵十二团当连指导员，同时也是城工部领导确定的争取对象。在程怡祥姐姐的家庭聚会上，胡安涛顺利结识了住在汉口的程德骥夫妇。亲戚相认彼此都很高兴，从此胡安涛就经常到程德骥家拜访谈心，联络感情，加深了解。

通过多次接触，胡安涛发现程德骥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痛恨至极。一谈到时局现状，程德骥就忍不住骂娘：“他妈的，这叫老百姓怎么活？上个月的薪饷这个月才能发下来，一百块钱顶不了十块钱用，钞票不如一张草纸！倒霉的都是我们这些老实靠薪饷吃饭的人！那帮有权有势的家伙把部下的薪水拿去换黄金白银肥自己的腰包，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我们当兵的愁米愁钱，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发动内战，程德骥也心怀厌恶。1948年冬，王家墩机场除轰炸机外的物资设备和其他空军人员都要撤向台湾，胡安涛试探着问起程德骥今后的打算，程愤然道：“抗战八年，老百姓受尽苦难，千万人的生命、鲜血才换来胜利，他们（指反动派）完全不顾百姓死活，又发动内战，残杀同胞。稍有一点良心的人，谁愿替他们卖命？我决定离开空军，做生意去……”

胡安涛将程德骥的现实表现和政治态度向城工部领导同志作了汇报。领导指示，可以抓紧时间向其交底，尽全力争取他留下做地下工作。

胡安涛找到机会，向程德骥告知了自己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身份，动员他走上哥哥程德联的路，拒绝赴台湾，并且要留在机场，参加地下斗争。程德骥听后大吃一惊，神色紧张地对胡安涛说：“你太胆大了！武汉到处是军警特务，你年轻冒失，又没有固定住处和安全保障，不怕被抓？”话



虽如此，但在内心深处，他又为党专门派人来做自己的工作而感到激动和高兴，因为自己很早之前就有投身革命的意愿，只是苦于无人引路。

经过一番考虑，程德骥郑重提出要到解放区看看。胡安涛按照城工部领导“欢迎一切愿意到解放区来的人观光、考察”的指示精神，很快安排好了有关事宜。1948年底，程德骥夫妇和胡安涛乘坐长途汽车来到应城城关镇，然后步行前往京应县委和城工部所在的应城南乡湖区。这段路有五六十里，沿途的几个集镇上均有被老百姓蔑称为“土狗子”的国民党地方民团设卡把守，盘查甚严。但程德骥早有准备，他身穿丝绵长袍，头戴礼帽，一副神气十足的阔佬派头。走到哨卡，“土狗子”把枪一横拦住路，刚想盘问，程德骥就跨步上前，眼一瞪，大喝：“我是空军，他（指胡安涛）是教员，我们从汉口回来探亲，怎么，不让过吗？”

“土狗子”见对方身材魁梧、穿戴阔绰、气宇轩昂、态度倨傲，口气就软了下来：“请您出示下证件。”

程德骥掏出国民党空军的证件，“土狗子”看后小心翼翼地问：“您怎么不穿军装？”

“到那边穿军装方便吗？！”程德骥斜了对方一眼，不客气地反问了一句。

“土狗子”只能满脸堆笑地说：“那边不安全，恐怕您会碰到共军！”

“我知道！能去就去，实在不能去就回。我十多年没回家，这次特地请假探亲，总不能走到这里就向后转！”程德骥不耐烦了。

话至此，“土狗子”只能乖乖让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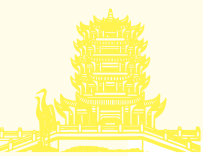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三人抓紧时间，穿过、绕过了几道封锁线，终于到达南乡湖区。在一间破旧的平房里，县委书记王家吉和城工部长王有学热情迎接了程德骥夫妇，这也是程德骥第一次亲眼见到“共产党的官儿”。只见这两位“共产党的官儿”穿的是灰土布棉解放服，戴的是灰土布八角帽，屋里只有用门板搭的两张床铺，晚上睡觉，白天办公，开会时就当会议桌。共产党干部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给程德骥留下了很深的第一印象。在接下来的参观和谈话活动中，两位领导同志言辞朴实恳切，态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这

种在国民党旧军队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领导作风不但让程德骥感到新鲜、动人，更产生了一股强大的感召力，他很快就主动提出留在解放区学习和工作的要求。领导同志对他的进步要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同时在交谈中详细地阐述了当前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城市地下工作的迫切性、重要性，希望他回到空军中争取更多同事留下，为人民解放事业发挥更大作用。于是，程德骥欣然接受任务回汉，积极开展对王家墩机场空军人员的策反工作。

回到机场后，程德骥在空军同事中秘密串连，发展关系，争取更多人不逃台。他首先找到自己的好友空军射击士陈绍祖、军士长白绍宗，最要好的老同事机械士李冠军和同乡军械班长王传炎，向他们交了底，告知他们自己已去过解放区，见到共产党的领导并受到热情接待，现在已经开始接受共产党交代的任务做地下工作。程还详细介绍了在解放区的见闻，说解放区官兵上下平等，军民和睦融洽，而国统区已经日落西山，蒋政权寿命将尽，全国解放的日子不远了。共产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是“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现在欢迎我们革命，以后建设更需要我们，等等。

程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众人，大家都表示愿意留下并一起参加地下工作。随后，通过这些城工关系，串连面不断扩大，如陈绍祖发展了陈志江和同在美国受训的射击士王登鳌；李冠军发展了射击士赵国斌和他的徒弟机械兵方斌；王传炎发展了机械士宋道儒、军士长王以德，王以德又发展了同事刘定文、李保良等。此外，中共鄂豫三地委城工部地下工作人员、“101”号运输专机机工长童治洲也与程德骥等人一起四处活动，串连了很多。至1949年春，通过层层串连，在空军人员中发展了城工关系20多人。

在串连时，大家秘密传阅毛主席著作和党的宣传文件，以此武装思想，并揭露敌人散布的各种谣言。程德骥从解放区带回了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文件，城工部的地下据点也刻印了《新民主主义论》和各种宣传党的政策的传单、小报等，这些宣传品在机场的串连骨干分子中秘密传阅。陈绍祖怕白天阅读被别人发现，晚上自己蒙在被子里打手电筒阅读。通过学习，进步士兵们感到心明



眼亮，信心大增。他们在自己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中也广为宣传，驳斥了敌人散布的诸如“共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等无耻谰言。平津战役中，空军一架 B-25 轰炸机因迷航降落在石家庄解放区，反动派趁机大肆造谣，说什么“机上的朱参谋被共党活剐了，飞行员被挖眼剁手……”，以此制造恐怖气氛，让官兵们继续卖命反共。谁知一个多月后，机上的六名空勤人员和朱参谋被解放军释放，安然无恙地返回北平南苑机场。其中一名瞄准员曾和王以德同在印度受训，两人是共事多年的好友。他私下里偷偷告诉王以德在解放区受优待的情况，说解放军给每人发了张条子，如果愿意的话凭条子可以直接投奔解放军。这下直接把敌人的谣言戳破了，他们狼狈不堪，悄悄用汽车把这几个人运走。程德骥等抓住这个典型事例，在串连人员中四处宣传，用活生生的事实揭穿了敌人造谣惑众的拙劣伎俩，消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疑惑恐惧心理。

程德骥等人还向很多空军人员投寄劝告信和警告信，以此分化瓦解敌人军心，减少敌机对解放区军民的伤害。他们给空军一大队的空勤人员写信，要他们把炸弹投进江河湖泊或空地上，机枪不要对解放军扫射，留条后路将功折罪去获得人民的宽恕；给地勤人员写劝告信，要他们不要逃台并消极怠工，拖延修复飞机和器械设备的时间；对物资器材管理人员则要他们设法不让物资器材被运走，防止破坏盗窃，等待解放军接管，立功受奖。这些信件都在离机场较远的汉阳、武昌的邮筒投寄。为了防止特务起疑盯梢，程德骥会带着爱人装作去武昌逛黄鹤楼，趁人不注意将信投入偏僻的街头邮筒。这些信件起到了作用：本来敌人想把所有飞机都撤走，没法修好的就地炸毁，但因为地勤人员有意拖延维修，几架本来能很快修复整備完毕的飞机直到武汉解放时都“没修好”，后来这些飞机成为人民空军的第一批战鹰。

到 1949 年 5 月时，空军人员中有 130 多人顶住各种压力，坚持留在王家墩机场不逃台湾。武汉临近解放，驻汉国民党军队将要南逃，空军一大队在将轰炸机队撤到广州后，准备彻底破坏机场。胡安涛、程德骥、童治洲等地下工作人员立即通过地下交通站向上级城工部汇报这一情况，并进

行分析研判。经过会商，大家一致认为执行爆破任务的驻机场工兵加强连连长李树柏是个关键人物：他是黄埔军校十七期毕业生，和童治洲是同窗；他的老家山东已经解放，据说其父亲是村干部，还是共产党员，这些条件说明争取李起义或投诚是完全有可能的。最后众人决定，由童治洲出面，劝说李树柏起义。

时间紧迫，童治洲直接去李树柏家，冒着风险开门便谈起正题：“李连长，目前形势如此紧张，你怎么打算的？”

不想对方也非常干脆：“我决不去台湾，你呢？”

“我跟着你，留下来。”

李听后，话说得更无顾忌：“你留下来，有关系吗？”

“有！”童治洲也顶着“通匪”的“风险”把话挑明了，“我今天登门就是专门为此事拜访的。”

李树柏一下子把眼睛瞪大了，好像在说：“哎呀童治洲，你这个‘101’专机的机工长，长官之前一直信赖的红人，原来早就‘通共’了啊。”他面露兴奋地说：“痛快！那咱们谈谈吧，共产党派你来找我，需要我干什么？”

“你也痛快！一下子就要接受任务了。我问你，机场是不是要炸？”

李犹豫了一下，说：“上头下了死命令，撤退前炸毁全部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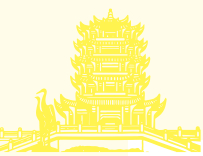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命令是你们工兵连来执行吧，你打算怎么办？”

“现在还有人在监督，不执行是要掉脑壳的啊！”

“没关系！只要下定决心保护机场就能有办法。现在解放军兵临城下，同我们在一起的人也不少了，来想个应付的法子吧。”

童治洲和李树柏谋划了一夜。

第二天，工兵连在机场“大动干戈”，四处理地雷、放炸药，好像真要把王家墩机场炸个底朝天似的。一切布置就绪后，李树柏就带着执行爆破任务的人搭乘运输机去广州“请示报告”了。在武汉告急时，他们就“迅速赶回”武汉“执行任务”——但在他们往回“赶”时，机场所有埋雷设炸药的地方都被画上了标记，所有重要设施都有地下党暗中派人进行监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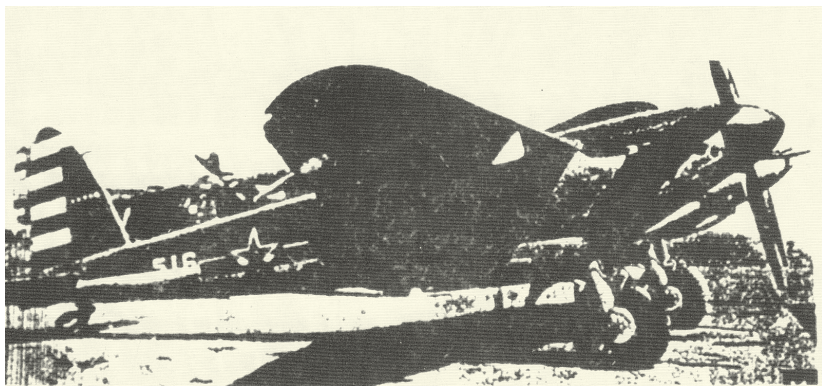


看守，而“监督爆破”的国民党宪兵队左等右等，却等不到工兵连长回来，唯恐被解放军包围歼灭，就跟着白崇禧的主力向南逃跑了。

李树柏在武汉解放的当天终于“赶”了回来，不过他故意在去机场的路上“迟到”了。等他第二天到达机场时，机场办公大楼已经换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航空处”的新牌子——李树柏其实是专门回来向解放军报到的。而广州的国民党空军一大队听说汉口王家墩机场居然安然无恙，大为震惊，立刻要求通缉“违抗军令，贻误战机的少校连长李树柏”——但他们发出“通缉令”的时候，李树柏早已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成为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一员。

1949年5月17日上午，中南航空处接管组指导员宋瑛带着接管队伍来到王家墩，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座完好无损，很快就能投入使用的军用机场。程德骥、李冠军等主动迎接接管组的同志，并详细介绍了机场的情况。第二天，宋瑛派车到唐家巷空军仓库把留下的空军人员接到机场报到，办理登记手续。程德骥在现场向大家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就正式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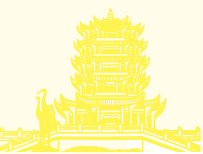
起义官兵的心情无比激动，立刻就投入到接管机场清理装备的工作中。经过清理，共接收英制蚊式轻型轰炸机一架，美制 B-25 中型轰炸机一架，美制 AT-6 中级教练机两架，美制 PT-17 教练机两架，美制大中型军用卡车、



人民解放军在王家墩机场缴获的英制蚊式飞机

吉普数十辆，以及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在接管工作中，起义官兵还联名起草了告台湾空军人员书，中南航空处接管组则在本地报纸上登出通告，号召离散的空军人员来机场报到登记，响应通告前来登记的有一千余人。

对王家墩机场国民党空军人员的起义，宋瑛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机场是原有的，人员也是原有的，但性质却完全变了：由美帝国主义一手装备起来的、国民党用来屠杀人民、反对革命的空中武装，变成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代人民空军。”这是党的白区工作方针和政策的伟大胜利，是人民革命战争的必然结果。



洞庭举义 游龙归汉

——国民党海军汉口巡防处舰艇水兵暴动

◆ 孙 勤

1949年5月24日凌晨，岳阳楼下洞庭湖边，从国民党海军汉口巡防处炮64号艇上突然传出密集的枪声。拂晓时分，巡防处的5艘炮艇被暴动水兵完全控制，炮艇冲过封锁线后扯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全速驶向武汉，宣布起义，光荣地加入了人民海军的行列！



停泊在长江上的起义炮艇

这个精彩的故事，要从半年前的1948年冬开始说起。

这年冬天，中共沔东县城工部城工人员黄少华受命来汉开展城市地下工作。不久，黄少华在友人家中认识了熊志伟（又名熊涛）。熊志伟曾在国民党海军中服役，后来不堪忍受上级虐待压迫，从台湾基隆开小差回汉。他在与黄少华的交谈中，多次表露出对国民党黑暗统治和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愤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考察，黄少华认为熊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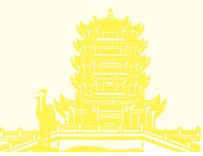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份可靠，并具备一定政治觉悟，遂将其发展为地下城工人员，并交给其一项重要任务：利用自身条件，对武汉国民党军政人员进行策反。

熊志伟接受任务后，找到了自己的好友、曾在汉口巡防处炮 68 号上担任艇副的好友吴毓龙（又名吴诗孝、吴净秋）。吴毓龙在海军士官中的熟人和同事很多，他本人则在 1948 年秋因与上级发生冲突而受迫害，开小差回汉，对国民党当局怀有一肚子怨气。熊志伟向黄少华介绍了吴毓龙后，考虑到策反舰艇官兵事关重大，同时为了使熊、吴二人提高认识、坚定信心，黄少华请示城工部领导同意后，决定将两人护送至解放区，向上级领导汇报情况听取指示，同时也能让他们在解放区参观学习。

年底，熊志伟和弟弟熊耀华以及吴毓龙在交通员护送下到达襄南解放区沔阳县彭家场，受到沔东城工部领导的热情欢迎。三名国统区的青年在十天时间里，听城工部领导亲自授课，学习形势、时事、革命道理和党的有关文件等。通过这次参观学习，三名青年不仅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还亲身体会到了解放区的新气象：虽然条件艰苦，但城工部对青年们待若上宾，每餐都是四菜一汤，睡的是厚稻草铺上铺着的厚棉絮褥子再盖一床厚土布棉被，城工部领导同志还经常来问寒问暖，让大家十分感动。除了物质生活上的照顾体贴，共产党领导干部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与国民党中上层军官中奢靡享乐、骄横跋扈的丑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让曾在国民党军中受过欺压的熊志伟和吴毓龙感慨万分，更加坚定投身革命的决心信心。

1949 年初熊、吴返汉后，黄少华在请示上级同意后，正式启用受地下党控制的“精诚新闻社”地下联络站，作为与熊、吴进行联系并研究布置相关工作的联络点，对水兵的串连和策反工作就此展开。

吴毓龙首先联络了自己知心知底的好友、炮 64 号艇上的轮机兵徐甫庭。和吴毓龙一样，徐甫庭也是深受欺压的普通水兵。一次在汉口海军码头值岗，因为临时去上了次厕所，徐被江防舰队司令部一倪姓参谋主任猛扇十几个耳光，到第二天该参谋主任还命令值日军士拿粗绳把徐打得皮开肉绽，最后押到军牢里关禁闭。吴毓龙以前曾听徐甫庭非常愤恨地说起此事，由



此认为争取他参加革命活动是比较有把握的。在与徐甫庭聊天时，吴毓龙谈了自己解放区之行的见闻和亲身感受，如共产党官兵平等、禁止体罚、讲民主等，并趁机宣传学习到的革命道理。经过几次深入谈话，徐甫庭下定决心参加地下活动，由自己在驻防汉口的海军舰艇中秘密串连一些志同道合的士兵兄弟，为组织起义做准备。

根据徐甫庭平日里的接触和了解，在汉口巡防处所辖的舰艇上，有一批正直的年轻水手、士兵，受尽海军上层派系斗争折磨和反动军官的侮辱压迫，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极为痛恨。这种尖锐的对立，对串连策反工作大大有利。吴、徐二人决定由徐出面，首先串连徐的好友、70号艇上的枪炮军士张慎平。张慎平年轻刚直，在士兵中人缘好，有威信，且爱打抱不平，因看不惯当官的克扣军饷和伙食费去放高利贷以及吃空额等贪赃枉法行为，曾数次联名向上级告发，甚至组织水兵向来汉视察的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当面告状，由此触怒上司，被陷害报复坐过军牢。徐甫庭经常找张慎平聊天谈心，话题都是从彼此受当官的气说起，因为是好友又处境相同，所以两个人都谈得很投机。有一次，徐试探性地说：“听说共产党那边官兵平等，讲民主，如果能到‘那边’去，该有几好啊。”张说：“你尽说些小伢话，怎么能过得去呀！”话虽如此，但语气中已流露出向往。徐看到火候已到，就直接挑明说：“吴诗孝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然后把吴去解放区参观学习并准备策动舰艇人员起义，投奔襄南解放区的打算都全盘告知。

张慎平听完徐甫庭的介绍后，马上说：“投奔共产党，我愿意。但怎么搞法呢？我们是兵不是官，指挥不了舰艇。要搞，只有组织水兵暴动。但要和吴诗孝好好商量，慎重行事。”

很快，吴、徐、张三人会面，把事情谈开后，张表示有决心干革命，把起义搞成。接下来，由张慎平出面，串连曾因不服上级无理压制而被罚关禁闭的炮65号艇轮机兵顾杰、轮机中士胡营、水兵陈燕明和炮64号艇水兵曹学海。大家公推张慎平为联络人，由徐、张、曹、胡、顾、陈组成核心小组，分头在各舰艇上秘密串连进步士兵。为了武装大家的思想，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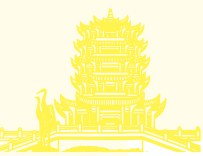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毓龙还多次从熊志伟手上领取沔东城工部翻印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华电讯》《江汉日报》等解放区宣传品交给徐甫庭，在核心小组中秘密传阅学习。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宣布起义。3月上旬，黄少华就将《江汉日报》刊发的重庆号起义特大号外交给熊志伟，经吴毓龙传到核心小组水兵们的手中。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让大家感到振奋不已，私下开会时，核心小组一致认为：“重庆号是从英国购买（实为移交，编者注）的巡洋舰，也是国民党的王牌战舰。既然重庆号都能起义，我们也瞅机会动手吧！”

在重庆号巡洋舰成功起义消息的鼓舞下，核心小组抓紧串连发动工作，发展了炮64号艇水兵欧龙林、轮机中士芮俊卿、电讯上士朱世鑫、轮机兵江振厚，巡70号艇代艇长贾元芳、轮机中士黄如青、轮机兵章延龄、水兵王三连和随艇工作的上尉译电官刘国华，以及炮65号艇、巡50号艇、巡66号艇上的多名水兵，加上核心小组成员共二十余人。这样，在五艘舰艇特别是主力艇炮64号艇和航速最快的巡70号艇上都有了组织起义的骨干力量。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串联工作的深入，进步水兵们又争取到了一批同情者，艇上少数顽固分子、反动军官则被孤立，他们对各艇上水兵的串连全然不知情。

到4月下旬的一天，徐甫庭向吴毓龙、熊志伟紧急报告：汉口海军码头上的各艇都接到紧急命令加满油料弹药；汉口巡防处机关文件也往炮艇上搬，指挥部则设在炮64号艇上，看样子巡防处上校处长陈文惠极可能驻该艇指挥艇队向西撤退。吴、熊马上根据城工部领导同志之前对起义组织工作的指示精神，连夜研究起义方案，向黄少华等作汇报并获得同意。次日，吴、熊召来徐甫庭传达起义方案，决定由张慎平负责指挥暴动，并让徐甫庭告诉张慎平相机行事。

5月上旬，人民解放军进逼武汉外围。陈文惠奉命率巡防处十一艘舰艇由武汉窜至岳阳，停泊在洞庭湖上待命。5月22日，陈文惠命令少校参谋柳家声率领武备较差的五艘舰艇继续西窜，而武备较强、航速较快的炮



64、65号艇和巡66、50、70号艇驶至离铁路线较近的岳阳楼旁停泊。此时，徐甫庭和张慎平暗中了解到陈文惠曾对同僚傲慢地说：“你们怕什么？撤不出去，就毁船，把船上武器拆下来，大家带着武器跟我走，打游击也行嘛！”徐、张一致认为，陈文惠死硬反共到底，在情况紧急时会命令剩余舰艇继续逃跑甚至炸毁船只，然后率队乘火车南逃。时间紧迫不容拖延，必须马上准备起义。

5月23日晚饭后，徐甫庭和张慎平以“组织踢球”的名义，召集核心小组和进步水兵十余人，到舰艇泊地附近一所学校的草坪上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5月24日凌晨4点发动起义，以枪声为信号，各艇即时发难，紧急发动轮机，举事后马上起航驶向解放区；所有起义者均全副武装，配足弹药，做好战斗准备；夜间岗哨由起义者轮值，不再往下交班，并向争取过来的同情者传达任务；控制好艇上主要火器和弹药舱，并指定专人封锁艇上台和电讯机；起义人员联络暗号为“你还睡不睡？”，回答为“不睡了”，并报自己姓名；张慎平全权指挥暴动，主攻目标为陈文惠所驻的炮64号艇。鉴于陈文惠是艇队最高指挥官又是死硬反共分子，且传闻他曾习武，功夫过硬，很难逼其投诚或生擒，张慎平命令胡营执行击毙陈文惠的任务，陈燕明协助，徐甫庭和其他人员分别监视控制其他各艇上的顽固分子，防止他们顽抗或破坏。

凌晨4点，胡营紧握上满子弹的手枪急步来到炮64号艇官舱右舷窗口（陈文惠睡处），准备将陈击毙在睡梦中。谁料，不知是因为思想过于紧张还是枪械故障，手枪竟突然走火了！陈文惠被枪声惊醒，大声喝问：“什么人？”胡营来不及多想，在窗外向陈的人影连续射击数枪。在舵尾官舱口警戒的陈燕明听到枪声，手持冲锋枪立马赶到，朝陈文惠一梭子弹扫去；紧接着，胡营身后的曹学海也打了几枪，张慎平也从巡70号艇上跑过来，端着冲锋枪向官舱内扫射。几轮猛烈射击后，陈文惠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也难以抵挡，当场被击毙。陈被打死后，震慑了其他的反动军官，暴动水兵完全控制了炮64号艇。陈的亲信、一个胖子副官跪在地上连连磕头作揖求饶命，当即被水兵们关押起来；其他军官也吓得噤若

寒蝉，不敢吱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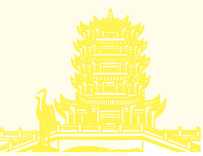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炮 64 号艇发难后，各艇立即响应，一时间枪声大作，舰艇升火机器声隆隆。当官的纷纷惊醒，还以为是解放军发起突袭。当他们发现是艇上士兵在进行武装暴动后，无不惊恐万状。很快，暴动水兵把军官都押进船舱里看管。还有极个别顽固分子妄图持枪反抗，立即被监视他们的水兵用枪口抵住脑门，只得乖乖缴械。

24 日拂晓前，5 艘舰艇已被暴动水兵完全控制，起义取得了初步胜利！为了防止沿岸敌军得到消息后阻击，张慎平下令舰艇立即起航，以最大航速向武汉方向急驶，在冲过国民党封锁线后，立即扯下国民党旗帜，通过艇载电台正式宣布起义！

25 日，艇队驶抵武汉近郊长江南岸的白沙洲和鲇鱼套之间，当地解放军部队由于没有得到起义的情况通报，向艇队开枪示警。徐甫庭和张慎平上岸与驻军负责同志联系，说明情况并取得同意后，奔赴汉口找到了吴毓龙，告知舰艇起义胜利，已成功抵汉。当时，沔东县委城工部还未入汉，于是吴、徐、张一起找到熊志伟，同去“精诚新闻社”，找到了地下联络站的负责同志，然后一起去江汉路武汉警备司令部汉口纠察处。纠察处与武汉警备司令部联系后，吴、徐、张、熊立即受到解放军第 12 兵团肖劲光司令员的亲切接见。随后，肖司令员派员和吴、徐等人乘船过江，会见 118 师邓岳师长。在邓师长的安排下，艇队开进汉口港。此时，岸上的解放军战士和艇上水兵相互频频招手致意，共同欢呼起义胜利归来，港口上气氛热烈动人，水兵们心情激动，都感到自己终于摆脱了黑暗，走向光明了！

26 日，肖劲光司令员乘炮 64 号艇巡视武汉大江两岸。首长视察完毕登岸时，与艇上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告别，并亲切地说：“同志们，辛苦了，人民欢迎你们！”听了首长这般亲切的话语，不少水兵都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1949 年 6 月，五艘舰艇编入解放军部队后不久，炮 64、65 号艇和巡 50 号艇升起“八一”军旗，奉命执行护送军粮到沙市的任务。途经石首县



藕池口时，遭遇国民党军残部袭扰，艇队当即配合地方人民武装对这伙顽匪发动歼击，以猛烈的火力打得敌人狼狈溃逃。战斗胜利后，有两艘舰艇进驻藕池，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群众代表还送来“解放藕池，人民海军功劳第一”的锦旗一面。艇上指战员面对这面锦旗，心中热流奔涌，都深深感到为人民立功的无上光荣！

血泪洒染雨花红

——记武汉地下斗争牺牲的三位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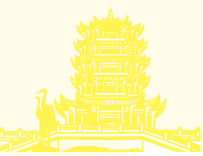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 何利平

黎明前的时刻，往往是最黑暗时刻。1949年5月15日凌晨，中共湘鄂特委书记兼武汉中心支部书记张冰、中共武汉市委统战小组成员王延曾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杀害，牺牲在武汉黎明前的黑暗中。1948年6月在武汉被捕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武汉中心小组书记顾剑萍，也在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际，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黎明前，走进黑暗；挺起胸，面对刀剑。心中渴望光明一片，忍听那亲人的声声呼唤。”这首地下工作者为迎接解放不惜牺牲的战斗歌曲，就是这些先烈事迹的真实写照，至今听来依然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临危不惧 担当重任

1947年，为了组织敌后武装斗争，中共华中局、华中军区决定，组建中共湘鄂特委，派遣具有斗争经验的干部深入湘鄂两省，秘密进行军事策反。徐楚光受组织派遣，于1947年2月以特派员身份，与张冰等数十名党员来往湖北武汉、湖南长沙之间，准备发动军事策反与经济干扰，组织发动武装暴动，以牵制敌军在正面战场对人民解放军的进攻。1947年9月，中共湘鄂特委在湖南策反了国民党4个团兵力，筹建湘鄂民主联军，在湖北建立通往大别山解放区的秘密交通线，掩护和输送包括中原突围干部在



内的大量人员和电台、西药等紧缺物资。正当两地策反工作进展顺利，徐楚光回解放区汇报请示工作，路经武汉时，由于内奸告密而不幸被捕。敌人把徐楚光押送南京，施以酷刑，又以封官伎俩诱逼，徐楚光始终坚贞不屈，1948年10月9日被敌人杀害，壮烈牺牲，时年仅39岁。

徐楚光被捕后，湘鄂特委的工作重任落到张冰肩上。特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议营救办法，决定张冰替补徐楚光为特委委员。会后，另一位特委委员谢威去大别山汇报工作，特委后期领导成员只剩张冰1人苦苦支撑。张冰不顾个人安危，奔走在湘鄂地区。他因长期劳累而疾病缠身，婉拒同志们劝他治病的好意，他对徐又新说：“老徐被捕，我们受了这样大的损失，我哪有时间休息和治病呢？……”

1948年4月，湘鄂特委交通员叶少卿从武汉回长沙后不久，便出卖了特委和武汉中心小组。敌人在武汉和长沙两地立即实施疯狂大搜捕，查抄了武昌积玉桥特委联络站，抓捕了汪乐挺、罗纳、许远超等特委工作人员。

早在徐楚光被关押在武汉期间，就从狱中带出密信，要张冰立即转移撤回解放区。张冰把生的机会留给了别人，自己仍坚守岗位，沉着应战，1948年5月当他到长沙执行任务时，被叛徒叶少卿指认，遭国民党特务逮捕，被押送到武汉。

狱中斗争 意志如钢

在武汉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张冰以囚牢为战场，继续与敌人斗争。他团结难友首先抗议剃光头的做法，提出留头发是个人习惯和自由，强迫剃光头是对人格的侮辱。张冰宁可不要脑袋，也要有留头发自由的抗议，鼓舞了狱中难友斗争的勇气，大家一致行动，誓死不剃光头。最后迫使特务取消对政治犯剃光头的规定。

首战告捷后，张冰又带领大家提出读书看报、改善政治犯待遇的要求。特务不敢发给报纸，害怕狱中共产党了解到解放战争的消息，就塞给一些《曾文正公家书》《三民主义》等，张冰不答应，特务又给些《唐·吉珂德》

之类的外国小说，还组织几次特务讲故事、变魔术、猜谜语等活动，借以宣传反动统治有理的谬论。张冰与特务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讲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故事，唱《大路歌》等进步歌曲，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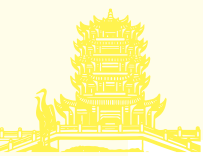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特务对张冰既恨又怕，想方设法整他，假借优待他，把他搬到单人牢房，企图隔断张冰与大家的联系。

阴险狠毒的特务其实笨拙愚蠢之极。既然是优待单人牢房，自然不能上锁，形式上把张冰与大家分开了，实际上张冰仍在继续领导难友斗争。在单人牢房，张冰教大家唱《国际歌》《你是灯塔》《我们在太行山上》等革命歌曲，激励大家勇敢地与特务斗争。

张冰把狱中同志团结起来，组成牢内对敌斗争的领导小组。他通过分析同牢人员情况，了解到狱中既有我们的同志和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的副师长和科长（因卖汽油给解放军而入狱），还有土匪、商人。他认为经过工作，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反动派的反动行为，同牢的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联合起来同特务作斗争的。经过他秘密地做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连国民党的军官、一般商人都对他格外尊敬、亲近了。那三个卖汽油和军用物资给解放军的科长主动向张冰说他们已经用几根金条买通看守，由看守帮他们一块逃跑，如果张冰愿意和他们一起走的话，他们可以帮忙。张冰认为自己是负责人，个人先走掉，必然使同志们受牵连；只管自己、不顾同志的安危，这不是共产党人的品德，因而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张冰善于掌握斗争的火候，他联合大家采取全体绝食行动，以争取改善伙食。全牢一百多人，包括国民党副师长和一些刑事犯在内，都愿意坚持绝食，誓不妥协。敌人害怕绝食坚持下去引起社会舆论谴责，只好答应以后不会贪污囚粮，保证按实数来改善伙食。这次斗争使敌特在精神上感到震惊。

绝食斗争胜利后，张冰抓住敌人心有余悸的时机，乘胜前进，又提出延长放风时间、政治犯可以接见亲属、不准打人、在押人员可以吸烟等要求，看守所所长慑于张冰的凛然正气，不敢不接受张冰的要求。狱中斗争又胜利了！



笑对死亡 气贯长虹

1949年5月初，解放军已逼近武汉近郊。敌特十分惊慌，都想趁机捞点钱逃跑。一个自称国防部专员的特务到看守所对四个牢房的室长说：你们的案子都由我来处理，只要请个保人，每人交200光洋手续费，就可以马上释放出狱。又要大家向外面写信，他马上就派人代送。

大家建议先把张冰搞出去，他是特务最注意的人，只要他出去了，其余的同志就更容易出去了。张冰坚决不同意这个主张，他说：“我不能丢下同志们不管，要走同志们先走。”

当时，监外党组织得到特务要钱放人的消息，已准备3000银元，积极营救张冰和其他同志出狱。但由于时间太紧迫，敌特急于逃跑，无法实现营救的计划。

5月14日晚，张冰得到好消息：解放军即将进入市内，特务们正在慌张收拾东西，准备逃跑。他告诉狱中同志们：“我们盼望的武汉解放的好日子就要到来了。”他停了一下说：“特务在逃跑前准备杀害我们7个已经列进敌人的黑名单的同志，如果能用我们的死去换取武汉千百万人民的解放，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时刻。”他鼓励难友：“你们光明的日子就要到来了，我是肯定要牺牲的。希望你们出去后努力建设新中国！”

午夜以后，牢门突然打开，敌人将张冰叫到看守所办公室，将他的口蒙住，然后用刺刀乱捅，最后将他的遗体装入麻袋抛入长江。

滚滚江涛在泣诉，在怒吼！

宁死不屈 碧血丹心

1948年初冬的一个雨夜，一个青年来到位于市中心区的汉口孤儿院门口，轻轻地敲门，但因夜深人静，大门已经上锁。这个青年只得沿着墙根找到一个易攀缘的地方翻墙进去。当他翻身跳下后，一看糟了！他发现自己误跳到了隔壁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部政工处的院子里。国民党军哨兵发现了他，他立刻取下呢帽，将一张纸条放入口中嚼碎吞下。哨兵想要

从他口中抠出纸条，他咬伤了哨兵的手指。几名敌兵围住这位青年，将他逮捕扣押。这名青年究竟是什么人，他吞下的纸条中又有什么秘密呢？

这位青年名叫林允中，原名王延曾，苏北人，上海圣约翰大学高才生，林允中是他调来武汉从事地下工作后的化名。在上海，他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经过长时间革命斗争的磨炼，1948年2月光荣加入了党组织。他响应党组织加强武汉地下党工作力量，派遣党员到武汉工作的号召，自愿来到武汉。在这里，他没什么社会关系，人生地不熟，语言又有困难，但他仍服从组织安排，以汉口孤儿院老师身份为掩护，在中共武汉市委领导下秘密从事统战工作。

这天晚上，王延曾和他的上级领导找硃口汉昌化工厂老板陈元直，一起研究如何推动陈元直的父亲陈经畬等进步民主人士在工商界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他誓死保护吞下的纸条，就是写有党内机密的名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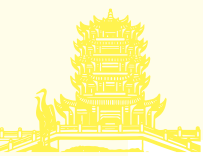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王延曾被捕后，武汉党组织曾多次设法营救，但国民党当局认定王延曾是“共党要犯”，拒不释放。在狱中，他同张冰等人关押在一起，他拒绝承认自己有罪，在法庭上，一再抗议国民党非法逮捕，表现得很顽强。他协助张冰在难友中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组织犯人同监狱看守进行斗争，受到大家的敬佩。

5月15日凌晨，在黎明前夕，王延曾也同张冰一样，被国民党反动派用刺刀活活刺杀，装入麻袋，丢入长江，为党为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剑影萍踪 转战江汉

在张冰、王延曾牺牲前几个月，武汉地下党的一位重要负责人顾剑萍也在南京英勇就义。顾剑萍原名邹本瑶，1905年生于安徽寿县，受到社会、家庭的影响，早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他曾担任江汉军区独立旅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共鄂西北第四地委委员兼第四专员公署副专员。

1948年1月，上海局批准正式成立武汉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武汉中心小组”，并设武汉地下交通站，在汉口、武昌、上海等地设立多个联络



点，顾剑萍任组长兼站长。顾剑萍在汉口花楼街小江家院 12 号开办“泰昌山货行”，以经营牛羊皮货作掩护进行护送工作，建立上海至汉口和汉口至黄陂蔡梅店，汉口至黄陂长轩岭，汉口至汉川、沔阳等多条地下交通线，打通了上海局与中原局及江汉区党委的交通联系。在短短几个月里，顾剑萍将新四军第五师突围隐蔽在上海的 30 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安全送进解放区。他们还冲破国民党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千方百计地为解放区输送了一批急需的电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军需物资，其中输送电台一部给鄂豫军区三分区罗厚福部，有效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叛徒出卖 组织破坏

由于中共湘鄂特委交通员叶少卿叛变，武汉国民党特务获悉了特委在武昌的秘密机关和武汉中心小组部分人员情况，加紧对地下党组织的侦破。1948 年 4 月 23 日前后，敌特机关抓捕了汪乐挺、罗纳等特委人员，搜查特委设在武昌积玉桥 35 号的秘密机关，逮捕了到此发送活动经费的武汉中心小组成员李琢章。顾剑萍非常警觉，机智脱险。

李琢章遭捕，秘密机关暴露。4 月 24 日，顾剑萍立即开会布置在汉人员紧急转移，他回上海汇报工作。顾剑萍走后，叛徒叶少卿带领敌特分子进行全城大搜捕行动。武汉中心小组交通员胡作元被捕，导致武汉中心小组设在武昌民教馆的交通站被破获，段守文被指捕，供出武汉中心小组的组织活动情况，当晚又指捕了约定交接工作的骆近丘和潘兢欧。武汉中心小组和地下交通站几乎同时遭到敌人的全面破坏，敌人还严密搜查泰昌山货行和武昌、汉口的多处交通联络站，对所有被捕人员日夜轮番审讯，随后投入监狱残酷折磨。

遗书诀别 血洒雨花

顾剑萍从武汉脱险到达上海后，时时挂念武汉的工作，他多次写信给骆近丘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意见，因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通信均被敌人截获。当顾剑萍 1948 年 6 月乘申汉班轮抵达汉口，刚一上岸就被等候在船码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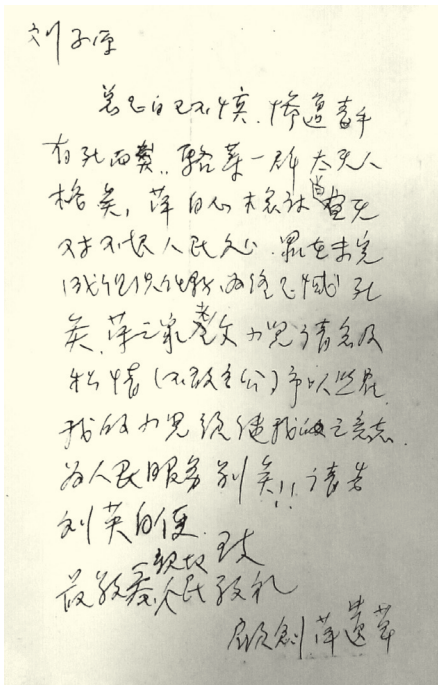
叛徒、特务发现，立即将他逮捕。

敌人抓到顾剑萍如获至宝，急忙用飞机将他押解南京邀功请赏。敌人妄图从他口中获得武汉与上海党组织的线索，对他实施严刑拷打，又以高官利诱，顾剑萍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党的机密，并且绝食抗议敌人的野蛮行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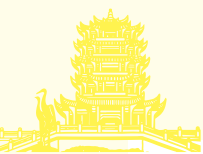
1948年12月22日，面对视死如归的顾剑萍，无计可施的敌人下了毒手。临刑前，敌人拿来笔、纸，让他写下要说的话。顾剑萍早已抱定以身殉党的决心，他提起笔，想到家中的老父、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更想到未竟的革命事业，他饱含深情向自己的老领导和亲密战友李先念、刘子厚和陈少敏写下了最后的遗言：

“萍自心检讨尚无对不起人民处，罪在未完成组织任务，为终是憾死矣。萍之家老父小儿，请念及私情（不敢言公）予以照顾。我的小儿须继我之意志，为人民服务。别矣！”当天，顾剑萍在南京雨花台从容就义。

张冰牺牲时年仅35岁，王延曾牺牲时还不满23岁，顾剑萍牺牲时年仅43岁。他们用壮丽年华诠释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追求，用赤诚丹心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他们的生命化作了武汉解放的第一缕曙光。



顾剑萍遗书



江汉关升起第一面红旗

◆ 刘桂芳

1949年5月16日清晨，武汉迎来了曙光，江城人民欣喜地看到，江汉关钟楼上的一面崭新的红旗在高高飘扬。这面象征江城新生的红旗，是由刘虹等几名女地下党员秘密绣成的，它表达了武汉人民对解放的渴望和对解放军的欢迎。

同兴里红色刘家

位于汉口的同兴里21号，住着一家刘姓富商。武汉沦陷时，刘家为了避免儿女们接受日式教育，让他们全部退学，请私人教师在家里教学。抗战胜利后，在刘家表亲赵寻（共产党员，著名诗人张光年的妹夫）的影响下，以刘虹为首的刘家的儿女们陆续成为追随共产党的进步青年。

刘虹在赵寻的指导下，和大嫂桑岱久、三妹刘寿年一起于1948年春季办了一所“彭年补习夜校”，地点就在自家一楼的两间空房内，设有语文、数学、英文、打字、职教等课程，对外公开招生。夜校除由刘虹、桑岱久主持教务并参加授课外，先后在校任教的还有张孟林（兼总务工作）和张敏、汪德昭、姜一林、汤佩佑等地下党员。他们平时各自在外从事地下工作，晚间则以教员身份按课程安排来校讲课，一直没出什么意外。

1948年4月，张孟林向当时的领导人杜子才（中共地下市工委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书记）全面汇报了刘虹及其家庭情况，杜同刘虹随即建立了直接联系。同年6月，刘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了党的指引，苦闷多年的她心中豁然开朗，感觉人生有了希望。地下党根据刘虹的条件，确定由她从事秘密机关工作。彭年夜校实际上成为地下党的一个工作据点，也是

一个职业掩护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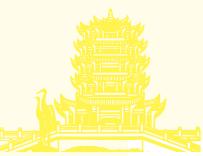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率先成长为地下工作者的刘虹，用行动影响带动了她的家人。大嫂桑岱久随后也成为地下党员，大哥刘连庆、四弟刘连寿、四妹刘寿营是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二哥刘连善、三妹刘寿年去解放区参加革命，母亲桑淑芳成为同情革命的人。父亲和三弟虽然不问政治，但也不过问和干预他们日常生活以外的活动。

自制收音机听广播

入党后，刘虹迫切要求党分配工作。党交给她的第一项任务是设法弄一台收音机，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把内容整理出来交给党组织。当时的武汉，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防止人民收听解放区广播，不许无线商家出售带短波的收音机。市场上买不到怎么办？恰好刘虹的大哥刘连庆在钻研数理科学，平时爱摆弄收音机。为了听到延安的声音，她请大哥帮忙制作一台带短波的收音机。大哥并不问用途，找来电子元器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帮她组装好了。这台收音机虽小，但音质很好，加上外壳是用一个精装书的硬纸壳做的，十分便于隐藏。当刘虹第一次用这台自制的小收音机听到新华社的声音时，内心万分激动。

刘家四楼的阁楼有个小杂物间，刘虹把杂物间收拾出来，搬进去住，除了吃饭下楼外，日夜守在收音机旁，唯恐漏掉一条新闻报道。每天凌晨，新华社第一次播音一响，她立即开始记录，待重播时再校对一两次，中午就可以将这一天的主要新闻报道送给组织。她在阁楼里废寝忘食地工作，有时一天仅睡几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小阁楼冬冷夏热，她浑然不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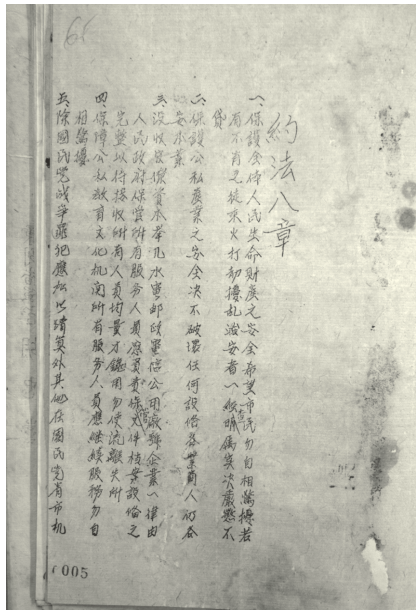
为了安全，取资料的同志教给她一种伪装方法：将广播内容用蝇头小楷写在薄纸上，卷成一个比香烟还小的纸卷，把香烟中的烟丝抽掉，薄纸卷塞入香烟内，两头塞满烟丝，再装回烟盒，还原封口，外人完全看不出这样普通的一盒香烟竟然暗藏玄机。刘虹收录的材料快速传递到负责印刷的同志手中，他们夜以继日地用油印机赶印成千上万份宣传资料，很快又通过各种形式散发出去。



时隔不久，刘连庆又应刘虹的要求组装了一台稍大的收音机，后来还从旧货行购回并修复一台更好的收音机，从而避免了临时故障，保证了收录工作进行。她收录的内容很广泛，有新闻、评论，有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和解放区的各种信息，还有党中央重要文件和毛主席著作等。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杜子才又布置刘虹油印有关文件。在购买油印机容易暴露，她就用一块玻璃板、一把刷子代替油印机。

每次工作完毕后，都要把油印工具分别藏好。张孟林和刘连寿有时也



地下党印制的解放军入城纪律《约法八章》

给她帮忙。利用这套简陋的工具，他们印了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的部分章节；刘少奇的《论党的严肃性与活泼性》；七大通过的《党章》，刘宁一的《解放区的工业政策》以及地下党组织为迎接解放起草的文件、指示及有关宣传材料，如《武汉接管工作中的调查研究》《关于审查新党员问题》。印得最多的是《约法八章》布告。

这些油印文件和宣传品，党组织用多种途径传送到地下党员、外围组织成员和进步人士手中，传递了党中央的声音，宣传了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传播了人民

解放军的胜利消息，粉碎了敌人的谎言，鼓舞和坚定了革命斗志和胜利信心。

“偷”取金条交党费

刘虹的父亲长年经营房地产生意，盈利颇多，除却日常开支，都换成金条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刘父每次换回金条，并不亲自掌管，而是交给刘虹和刘连寿收藏，平时也不过问数目。刘虹和刘连寿把金条分开存放，有的藏在四楼供佛龛房间的天花板上，有的塞进墙缝里，有的放进陶罐里，

总共有 40 多根。

1948 年夏初，武汉地下组织经济十分困难，刘虹让刘连寿从天花板上取下来 2 根金条，亲自交给了党组织。同年盛夏，刘虹自己不方便攀爬，就让借住在自己家的张孟林帮忙，爬到藏有金条房间的天花板上，从杂物堆的陶罐里拿出 2 根金条，将其中一根交给了党组织。有次在研究工作中，武汉地下市委书记曾惇说组织上缺少经费，让刘虹拿根金条给他，刘即照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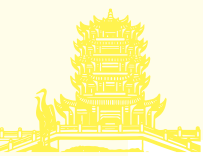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刘虹从家中拿出的金条，偷偷交给了党组织，用于开展活动之用，为地下党组织缓解了一部分经济困难。

假借结婚绣红旗

1949 年 5 月初，武汉即将解放，天就要亮了！组织上指示刘虹、汤佩佑、桑岱久等同志赶做红旗迎接解放军进城。接到任务后，刘虹立即找大哥刘连庆商议，刘连庆此时已是文教界秘密外围组织成员，慨然允诺并共同策划。大哥陪刘虹一起上街采购布料，他穿着一身绸缎长袍，装作一个大老板，跟布庄的人说自己要办婚礼，买了两匹红布和一匹黄布。

布匹买回后，刘虹、汤佩佑、汤静雯、桑岱久、余漱芬等人就躲进阁楼做红旗。由于国民党实行高压政策，一些红色的布带包括镰刀、锤头图案等与共产党相关的内容全部都被列入“禁品”，不准老百姓使用。大家都没见过印有镰刀锤头的党旗，这旗子上的镰刀锤头图样去哪儿找呢？刘虹思虑一番，突然灵光一闪，跑到文具店买回了一套万国旗，将其中的苏联旗帜取下，照那上面镰刀、锤头的样子放大。连续几个晚上，刘家四楼那间供着佛龕的房间里缝纫机不停运转。在刘母桑淑芳的指导下，刘虹等人通宵达旦赶制出一面特大红旗和几面大红旗。

5 月 15 日清晨，一位抱着婴儿的妇人悄悄来到刘家，此人正是武汉市委书记曾惇的夫人王一南，她将红旗放在婴儿的襁褓里，悄悄地带走了。当日夜晚，国民党部队撤出武汉。随后，地下党组织指派专人爬上武汉地标建筑江汉关钟楼，将特大红旗挂了上去。这面红旗告诉人们：天亮了，武汉解放了，这座英雄的城市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武汉上演“空城记” 江城黎明静悄悄

——武汉“真空”期迎接解放的斗争

◆ 何利平

1949年5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完成解放武汉的部署，开始向武汉市区挺进。5月15日下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匆匆钻进“追云号”飞机南逃。这位自诩为“小诸葛”的“名将”，盘踞武汉翻云覆雨，纵横捭阖。然而，狂澜既倒，力挽何易！任他诸葛复生，也只落了个仰天嘘叹、仓皇出逃的下场！

下午7时，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在汉口发出书面谈话：“现本部奉令作战略转进，放弃武汉。”所部于当日午夜撤往武昌，汉口、汉阳率先进入“真空”时期。16日，驻守武昌的国民党军随即撤出，武汉三镇完全进入“真空”时期。武汉地下党组织和数百万武汉市民期待已久的最紧张、最严重、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黎明前夜

中共武汉地下党组织早已预计到武汉将进入“真空”时期。为了保护武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免遭敌人破坏，不仅要有勇气，而且要有智慧，不仅要有决心，还要有周密的组织和部署。

4月19日，中共武汉市委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在武汉秘密召开，决定分设江南、江北两个指挥部，由曾惇、张文澄、陈克东、刘实等人坐镇汉口；由江浩然、罗明、孙运仁等人组成武昌分委留守武昌，负责指挥江南方面的斗争。如遇敌我隔江对峙或国民党封锁长江等紧急情况，武昌

分委可代行市委职权，独立作战。市委下设的各个工作小组和外围组织也按这个需要加以分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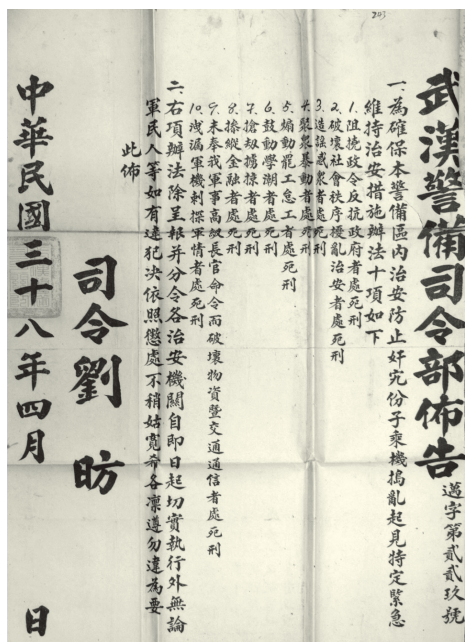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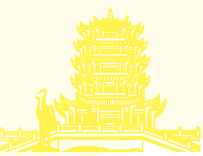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市委进一步分析讨论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应对措施：如敌人仓皇逃走而我军还未入城，出现一个青黄不接的“真空”阶段，很可能造成谣言四起，秩序混乱，坏人纷纷出动，抢劫破坏，无所不为。这个阶段虽然时间不会很长，但如果不采取严厉措施，对城市的破坏也会很大。因此，需要有一个公开的组织 and 有一定权威的力量来维持这段“真空”时期的社会秩序。

市委决定派和成银行的老板赵忍安负责筹组“治安委员会”，维持社会秩序。赵忍安是中共武汉市委金融工作小组组长，在武汉金融界上层人士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赵忍安立即行动，秘密刻制印章，印刷布告，要求全市人民在解放军未入城之前，工人、学生要出来维持社会秩序，商店要开门，工厂不停产，交通运输不得中断，要严防坏人破坏。赵忍安还邀请武汉社会知名人士在布告上签名，一旦“真空”到来，立即张贴布告以安民心。

根据武汉电信局已基本为我掌握控制的有利条件，地下市委设计利用自动电话建立秘密指挥系统的方案：将汉口地区党员和进步群众可以控制的电话统计起来进行精心编排，分析哪些电话是属于指挥所里的，哪些属于指挥所之下各委员会的，哪些属于基层的，统一由市委全盘掌握。指挥所的电话号码，由武汉电信局里的党组织通过自动电话总机控制起来，事先不下传，遇紧急情况由指挥部电话通知，然后在电话上取得联系，既保证电话畅通，又保证不被敌人发觉，非常安全可靠。

全市指挥系统方案确定之后，通过电话方式，各个点上的情况随时可向上一级指挥系统汇报，必要时经上级指挥部同意，各个点之间可以按约定信号互相联系，协同动作。

为加强城市治安维护管理，武汉市委划定汉口地区以中山大道天津路口武汉电信局为中心，分为上、中、下三段进行联防，武昌地区以鄂南电厂为中心，分为八区联防。联防工作以工人、学生为骨干，组织工人纠察



武汉警备司令部颁布的“十杀令”

护社会治安的民间组织。

队和商民自卫大队,建立单位联防、重点联防和地区联防相结合的严密网络,一旦发现敌人破坏,有权立即镇压。

武汉市委和驻武汉的解放区各级党委城工人员联合行动,紧密配合,由中共江汉区委城工部的余杰联络张难先、李书城、艾毓英等知名人士出面,组织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由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和中共襄南地委城工部指导民革成员及一些民主人士分别成立“汉口市临时治安委员会”和“汉口市人民治安委员会”,作为真空时期维

激战无声

5月15日下午3时许,曾惇和张文澄按预定计划来到童式一家,此处就是设在汉口保元里9号的市委指挥中心。它是市委文教工作组副组长童式一的家,童式一利用其父亲童璋时任国民党湖北省银行总行经济研究室主任的关系,在家办起了华中经济通讯社,并以通讯社编辑部的名义作为掩护,外界都以为这个通讯社是国民党湖北省银行办的。童家周围环境比较安静,交通方便,逐渐成为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

与此同时,在武昌的江浩然进入设在鄂南电力公司的武昌指挥中心,在汉口的刘实坐镇武汉电信局,陈克东、余杰进入汉润里郭治澄家中,共同指挥迎接武汉解放的战斗。

全市总指挥联络点设在林逸圣的公寓。林逸圣原是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后叛变革命,出卖同志,武汉解放前夕,为了逃避罪责他早就逃走。

这栋公寓地处汉口市中心，结构严实，而且前后都驻有国民党的军事和特务机关，在敌人眼皮底下最不引人注目。各系统立即进入战斗岗位，大家守在各自指挥部的电话机旁，通宵达旦指挥战斗。

敌人对汉口的破坏，主要目标是电信局和江岸各工厂。不出市委所料，15日当晚，曾惇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电信局报告敌人派一个工兵排，携带炸药，包围了电信局，准备进入电信局爆破电话总机。市委事先派了刘实住进电信局，亲自领导保护电话总机的战斗。曾惇接到电话，果断下达了“不让敌人进入大楼，誓与机器共存亡”的指示。

15日午夜时分，曾惇接到负责四唯路江边、青岛路江边、宗关襄河边和花桥郊区4个观察点的华煜卿电话，得知敌军全部撤退。曾惇立即派在《新湖北日报》工作的地下党员秦敢以记者身份骑车到江边沿江视察，秦敢了解到汉口确无敌军之后，曾惇通知秦敢赶印《武汉解放了》的号外，通知赵忍安正式成立治安委员会，广为张贴安民布告，命令各系统各据点立即把纠察队开到街上，配合已经争取过来的消防、警察人员维持社会秩序。

江城各系统人员正式进入维持武汉“真空”时段社会秩序的战斗。

迎接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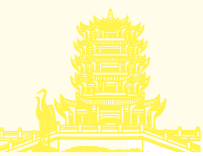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遵照江汉区委城工部蔡书彬部长的指示精神，5月15日凌晨，江汉区委城工部汉口小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的名义起草和颁发《紧急命令》。

15日上午，城工人员立即把《紧急命令》传达到各战斗点执行。余杰派专人到汉口市警察局，向局长李经世、副局长胡武以及众警察分局警官宣读《紧急命令》。

听完《紧急命令》，李经世当即表态坚决拥护。李经世经过余杰深入细致的策



汉口市警察局局长李经世



反，终于走上光明道路。胡武以及在场的众警官也经过城工人员串连发动和“结盟”“拜把”，已经弃暗投明，这时紧随其后，纷纷表示坚决拥护，争取立功。

16日，李经世、胡武共同签署发布《汉口警察局布告（安字第二号）》，向全体警察宣布“四不准”纪律，严令：一、不准抢劫公私财物；二、不准纠众暴动报复；三、不准乘机恐吓敲诈；四、不准破坏任何设备。并设立戒严指挥部，出动保警部队拦截溃退到汉口郊区的国民党游杂部队，收缴礄口等地区散兵游勇的枪支，及时平息了汉口市区的几起骚乱，各警察分局的警员亦积极投入反对南逃和维持社会治安的斗争。

各分局所有警员停止休假，按《紧急命令》要求，加强各交通要道的岗哨，一律带枪，上双岗，组织机动警察力量，进行武装巡逻。16日凌晨3时，礄口方面来电报告，有流氓地痞组织“吃光队”，手持刀棍挨户抢劫。曾惇立即指挥调动工人武装纠察队前去包围缴械。

李经世进一步强调了有关分局的具体任务：三分局加强对电厂的保护；五分局派人化装成码头工人，插入装卸队，保护江边趸船、码头，十分局派人保护水塔；十一分局保护省公路局汉口车站；十三分局到江岸桥梁厂，与铁路工人配合开展护厂斗争。



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汉口穗丰打包厂宣传车

一切安排妥当，汉口市局全体警察抖擞精神，奔赴各自岗位迎接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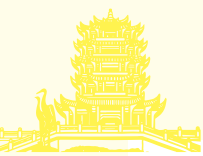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从5月15日夜至16日凌晨，城工人员林厚周等人通宵达旦地陪伴在汉口市市长晏勋甫的身旁，用电话代晏市长命令汉口市政府所属机关及水电厂等重要单位的人员坚守岗位，保护档案和国家财产，听候接管。同日，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发布《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通告》，宣布“武汉已成真空地带，自应加强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一切生命财产”，号召全市人民“发挥互助精神，竭诚合作，力持镇静，各守岗位，各安生业，以期安堵如常”，并组织30余人沿街张贴和散发。得知敌人要炸平湖门江边三艘小火轮，临救会武昌执行处负责人周杰出面与敌谈判，花了800块银元买通敌兵，使火轮免遭破坏。

武昌方面，中共武汉市委武昌分委指示武昌商民自卫大队配合工人纠察队上街维护武昌社会治安，不仅平息了平湖门抢粮事件和复兴路的骚乱，而且还处置了这夜最紧张的事件。国民党散兵游勇1000多人打着66军的旗号，企图由青山方向窜入武昌市区抢劫，商民自卫大队第三中队在沙湖嘴一带与敌人遭遇，双方对阵半小时左右，在地下党员、中队长陈波涛的率领下，自卫大队奋起战斗，击溃了这支“吃光队”，俘获敌军26人，缴获步枪115支及其他武器弹药。

清晨，中共地下市委通过统战关系，以市商会的名义组织各界代表乘车到滂口前线迎接解放军进城。曾惇和张文澄相约留下一人在电话机旁指挥，轮流去街头看看欢迎解放军的队伍。

当他们挤在夹道欢迎的人群里，看见解放军一队队走过时，不禁热泪盈眶。想到十多年的地下斗争，终于盼到与自己的武装部队会合的一天，怎不令人激动万分！曾惇、张文澄回到赵忍安家，痛痛快快地为庆祝武汉的解放干了一杯。

当晚八时左右，解放军先头部队师部进城，住在江汉路一个银行的底楼。曾惇同赵忍安一道去会见了师长和政委，本想把保卫城市的责任移交给部队，但是，师长表示，刚进城，情况不熟，要市委继续配合战斗两天，要市委的各据点与部队的各团、各营的指挥部密切联系，共同工作。于是，



曾惇他们又坚持了30多个小时，直到18日晨才休息。连续三个日夜的紧张战斗，是疲劳的，又是十分愉快的。撤下岗位后，大家整整睡了18个小时才醒来。

换了人间

1949年5月16日清晨，一个青年学生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湖北国立师范学院宿舍出发，一溜烟地向着岱家山方向驶去。这位名叫杨瑛的青年，是武汉地下党青年工作组领导的外围学生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成员，也是汉口学联的联络员。他是受湖北国立师范学院学生自治会委派，专程前往汉口市郊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的。

与此同时，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也分别派出市民、商会代表乘坐汽车赶往岱家山，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

杨瑛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穿过已经空无一人的国民党军防线，迎着朝霞沿张公堤飞奔。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有人喊道：“站住！什么人？”

杨瑛这才注意到路边树下站着一位持枪战士。他下车仔细一看：这不正是他要找的人民解放军吗？

杨瑛急忙递上自己的名片，主动介绍说：“同志，我是汉口的学生代表，党派我来接解放军进城的。”

战士把杨瑛带到一座平房前，由另一位同志带着杨瑛去见部队首长。不久，杨瑛终于见到了解放军第40军118师邓岳师长。杨瑛上前紧紧握住邓师长的手，激动地说：“可盼到你们了！邓师长，昨天晚上，蒋军已经全部撤出汉口，现在汉口已经成为‘真空’。我代表汉口学生、百万市民请解放军尽快入城保护人民，维持治安。”

邓岳师长当即表示：“从各方面情况看，汉口确实已成‘真空’！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保护人民、维持治安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先头营马上向市内进军。”

汉口市区的黎明到来之际，显得格外宁静。大街小巷，商店照常营业，水电照常供应，交通正常运转，只是多了些警察全副武装巡逻，一

切井然有序，与平时不同的是街头贴出了《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通告》《汉口市临时治安委员会通告》和汉口市警察局的《紧急布告》，还有一些地下党组织贴出的传单和布告。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内线人员不仅在汉口大孚银行设立了指挥机关，还打出了“中共中央中原局武汉工作委员会”的标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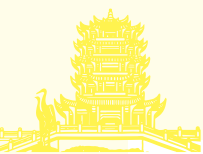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武汉工人也非常热情地迎接解放军入城。16日凌晨，江岸机务段和车辆厂的“武汉人民解放先锋队”队员们由江岸步行到谌家矶，迎接引导解放军进城。工人们还从循礼门车站把隐藏好的机车开出来，在车头水箱上写上“石吉祥”（武汉工委与鄂豫三地委城工部联络的代号）标志，开往江岸迎接解放军部队进城。

下午2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第118师先头营进入了汉口市区战略要地布防，6时许，118师主力在师长邓岳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列队开进汉口市区，汉口正式宣告解放。5月17日中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独立第一旅在司令员李人林的率领下从蔡甸进入汉阳县城，汉阳宣告解放。17日下午5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第153师从葛店进入武昌市区，武昌宣告解放。至此，武汉三镇全部得到解放。

在解放军入城之时，武汉市民几乎是倾城出动，热烈欢迎这些来自远方的亲人。汉口电信大楼前，挂起了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江汉关钟



武汉人民庆祝解放



楼上，升起了几位女地下党员日夜赶制的鲜艳的党旗。三镇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响起欢庆的锣鼓，到处都洋溢着革命的歌声。人们高举着红旗、彩旗、锦旗，拿着五颜六色的标语，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整个武汉都沸腾了，沉浸在庆祝解放的欢乐之中。

《大刚报》发出了《大武汉重见天日，解放军胜利进城》的报道，生动地记载了当时的盛况：

“此时万民夹道，欢呼雷动，鞭炮大放，‘欢迎人民解放军’‘毛主席万岁’等口号传呼不绝于耳……宽阔如中山大道拥挤竞至于水泄不通。父母子女，合家出动，友朋相伴，成群结队，均以先睹解放军风采为荣。而数十卡车隆隆前导，红绿彩纸，满空翩翩，加以‘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山那边呀，好地方！’歌声如潮涌起，‘打倒战犯蒋介石’‘活捉武汉人民的敌人白崇禧！’吼声直冲云霄，令人恍以现实为梦境。”



大刚报关于武汉解放的报道

解放军入城后，中共武汉市委和各级城工部组织立即配合人民解放军和南下干部开展接管城市的工作。5月22日，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谭政任主任，陶铸任副主任。军管会下设物资、交通、军政、文教等接管

部和警备司令部，是军管时期武汉地区的最高权力机关。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吴德峰任市长。25日，新的中共武汉市委宣告成立，张平化出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兼市职工委员会书记。随后，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和第四野战军指挥机关也陆续进驻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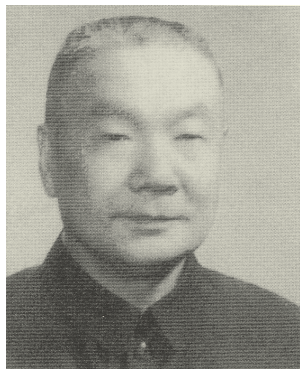
武汉市军管会办公楼（今江汉饭店）



武汉市军管会主任谭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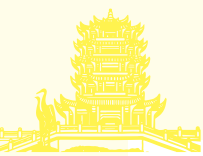


武汉市人民政府第一任
市长吴德峰



解放后，第一任中共武
汉市委书记张平化

武汉这座拥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名城，在经历了漫漫长夜后，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从此获得了新生，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后记

70年前的5月，江城武汉送走了黑暗，迎来了光明。武汉解放，是党中央、毛主席运筹帷幄，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地下党组织团结武汉人民在第二条战线英勇斗争共同奋斗取得的胜利，也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时，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推出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第一辑《日出江城》，用真实可信的史料、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形式讲述武汉解放历史故事，通过回顾武汉解放的峥嵘岁月和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片断，让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武汉红色历史，了解当年共产党人用鲜血捍卫信仰、用牺牲坚守初心、用生命担当使命的艰苦历程，从而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为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武汉地下斗争回忆录》《中原突围》《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长岛黎明——解放战争时期长沙地下党斗争纪实》《徐楚光传》《武汉城工史料》《武汉风云》《湖北文史资料》《武汉文史资料》《武汉春秋》《湘潮》《湖南文史》等书刊，得到了参加武汉解放地下斗争的彭其光、水世閏等老同志的支持和地下工作者的后代蔡七七、刘士明等同志的大力协助，特此谨表谢意。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不全，加上编写时间紧张、编者水平局限，书中内容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武汉解放亲历者、研究武汉解放的专家学者、掌握武汉解放史料的知情人士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编写组

2019年7月